目录

[前 言 1](#_Toc73973038)

[變遷的時代與不滿的心理 2](#_Toc73973039)

[西方文化的影響 5](#_Toc73973040)

[大時代的小故事 8](#_Toc73973041)

[美國文化帶來的迷惘 10](#_Toc73973042)

[望子成龍 14](#_Toc73973043)

[孝 和 愛 17](#_Toc73973044)

[舊八股與新八股 19](#_Toc73973045)

[從處變自強說起 22](#_Toc73973046)

[六十年來教育的變和惑 26](#_Toc73973047)

[七十年前八股文的思想與教育 29](#_Toc73973048)

[新舊教育的變革 33](#_Toc73973049)

[值得反省的代差與教育 37](#_Toc73973050)

[教育與文化的中空 40](#_Toc73973051)

[尊 師 重 道 44](#_Toc73973052)

[武俠小說與社會心理教育 51](#_Toc73973053)

[老文學和新文藝 55](#_Toc73973054)

[人性與人慾 58](#_Toc73973055)

# 前 言

---亦新亦舊的一代

三版獻言

《新舊的一代》原名《二十世紀青少年的思想與心理問題》，一九七六年間陸續在《人文世界》雜誌連載過，出書以來一直受到社會各界廣大讀者的共鳴和推崇，譽爲當前社會問題之解剖書、青少年思想教育之診斷書、及中西文化交流之過濾書等等。由於作者南懷瑾老師經歷過舊社會的種種禮教，也接觸到新時代的般般改革，因此，每一件社會問題的來龍去脈，在他口中委婉道來，就彷彿一齣劇本中的歷史詩篇，但見諸方英雄豪傑、歷史人物蜂然而起，在多重變動的大時代中，輪班上演，轉眼又默然消逝，了無蹤跡。上下古今多少事，盡在笑談中，從講演中的啓示，使我們這些年輕學子，發現了問題的癥結。從歷史人物的典範，使我們確立自己安身立命的中心思想，找到了「中華文化的根」，不再「失落」，也不再「迷失」……。

今天打開各種報章、雜誌，所有政論家對世界動亂根源的分析，都以「經濟的不平衡」、「政治的對立」爲引發一切社會問題的主因，而忽略了在政治、經濟等表面問題背後的思想文化與心理問題。政治是人對事的安排，主體在人；經濟是人對物的處理，主體也在人。而指導人的行爲是主觀的思想和客觀的文化背景，換句話說，有良好的教育基礎及文化素養的人，才能提升到更高的政治層次和經濟境界。沒有精神文化做基礎的物質文明，能爲人類帶來真正的幸福嗎？

「神祕的西方，現實的東方。」這是近幾年流行美國的口頭禪，乍看之下似乎是顛倒了，其實說的是現在中、西文化相互衝擊的現況。在印象中，產業革命以來的西方是崇拜唯物的、科學的、功利的，但到二十世紀的末期，卻因科技文明的過度發展，人的精神生活反而造成空前的緊張和壓迫，轉而追求心靈的自由和解放，存在主義、達達主義、託普藝術、嬉皮生活乃應運而行，終因沒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爲其背景，只如一陣狂風吹過，便無影無蹤了！現在呢？這些西方的先進們，抬頭仰視東方古奧的文明，從《易經》、太極拳、瑜伽術，乃至禪宗棒喝到道家養生祕訣，愈來愈神祕，愈神祕愈吸引人，昔日爲西風吹亂的黃花落葉，夾雜着飄零不盡的餘果殘核，並隨東風緩緩倒吹，這些文化的雜碎，點點滴滴又輸入了西方。

東方世界呢？在飽受西方物質文明的衝擊及侵略之後，痛定思痛，早已盡棄其固有精神文化，決心全盤西化了，日本的模仿成功了，其他各國都在跟進直追，換句話說，只有科技的、實利的，纔是目前東方人追求的目標，這就是所謂「現實的東方」的語意。對於這兩種歷史主流的反動，到底是兩種極端現象的反動呢？還是中西文化確已開始在融通、調和呢？

清末迄今，中國曆經百餘年的苦難，中華文化的命脈已到存亡絕續的關頭，昔賢有言：「中國文化存，則中國興；中國文化絕，則中國亡。」秉此精誠，我們決定將《新舊的一代》一書擴充、再版，也希望藉此文字因緣，能夠把中華文化的種子，傳播到世界各地，生根，發芽，茁長。這是我們的希望，也是我們的信心。因爲只有中華文化，才能真正地統一中國。也只有中華文化，才能真正帶給這個世界和平和安樂！

老古文化事業公司 陳世志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

前　　言

有人稱我們這一代爲「失落的一代」、「迷失的一代」，或是「沒有根的一代」。

我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正逢南懷瑾老師講述「二十世紀青少年的思想與心理問題」。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當時南老師講得很起勁，句句發人深省，而且層層剖析問題的前因後果，從目前的現實問題，追溯到幾千年前的歷史文化。青年同學們聽得極有興趣，每堂座無虛席，因爲有太多太多的啓發，解答了我們許多的疑惑。

南老師的本意，想把心理問題、生理問題、現實問題，甚之，對本世紀的政治、哲學思想問題等等，作一系列有系統的講述。這些問題也正是我們這一代青年感到迷惘、懷疑、徬徨的癥結所在。

誰知剛剛講個序幕，正要進入高潮的時候，他忽然停住不講了。我們屢次要求他繼續講下去，南老師答應我們稍過一陣子，繼續再講，也好作個交代。不過，南老師課務繁，雜事多，倒是事實。

我們一直期待着，一年復一年。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已經畢業好幾年了。可是，仍然沒有機會見他舊話重提。現在，懷師又掩室閉關，與外界謝絕往來，不知道哪一天他纔出關，爲我們後一輩的青年繼續研究這個切身的問題，想來不禁令人悵然。

二十世紀是一個動盪的時代；二十世紀的中國，更是在內憂外患中顛沛困頓，力圖自強。辛亥革命，中國的專制政體被打倒了；新文化運動，中國的古老文化被破壞了。生長在這新舊文化夾縫中的青年，整個思想便陷於古今中外的矛盾混亂之中。

如今，再翻開前幾年南老師的講稿一讀。雖然只是對問題中許多序幕的話，但是，它仍然具有震憾性的啓發作用。這些講稿曾在《人文世界》雜誌發表過，頗受各界人士的重視，有許多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出版單行本。所以把它合編成冊，另外再附加南老師的其他幾篇講稿，命名爲《新舊的一代》，出版貢獻給青年朋友們，以及關心青少年的各界人士作爲參考。

古國治 謹志

一九七七年六月

# 變遷的時代與不滿的心理

---亦新亦舊的一代

變遷的時代與不滿的心理

生爲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激，思想的彷徨與矛盾，情緒的鬱悶與煩躁，充分顯示出這時代的衝突與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們的病態心理。代表上一代的老輩子人物，悲嘆窮廬，傷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窮、不可一日的憂慮；正在茁壯中的少年，既無高瞻遠矚，更不知道如何去後顧深思，前路茫茫，一片空白，在無所適從的情態中，陷於煩悶。這是老一輩子的人應該擔替的罪過？或是這一代青年們的錯誤呢？其實，誰也沒有罪過；不能把這個責任，推諉給誰來單獨承當。這是歷史趨勢中自然的現象，文化思想在變動的時代中必起的波瀾，也是人類歷史分段生命中當然的病態。

如要講究責任誰屬的問題，在兩千多年前的東方，當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遭逢歷史的鉅變，我們公認的聖人——孔子，著述《春秋》大義，是把這種過錯，責之於當時身在其位，力足以謀國的「賢者」，孔子這種論斷的是與否，那是歷史哲學上的一個問題，姑且不論。但至少要知道在《春秋》時代，教育和知識並不普及，因此所謂「賢者」的士大夫們，的確是義不容辭，難逃其咎的。而當時印度的聖人——釋迦牟尼，創立佛教，敷揚佛法，卻認爲歷史變亂的罪過，是人類與一切衆生的共同「業力」所造成。當共同「業力」構成大勢所趨的時期，猶如轉動速度極快的火輪，當它正在旋轉的時候，誰也無法插手使其停止；阻撓或堵塞，只是增加旋力發生鉅變而已。孔子的道理是「因人論世」，所以《春秋》責備賢者。釋迦的道理是「因世論人」，所以佛法的觀點，便深深悲嘆衆生的「定業」難移。此外，老子的「無爲」、「因應」觀點，也正同此理而立論。我們如從「因世論人」的觀點來說，釋迦歷史哲學的觀念，自有其充分理由的論據。如果根據此理，大有可能會袖手旁觀，喟然嘆息芸芸衆生，至可憐憫而已！如果從「因人論世」的觀點來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爲了承先而啓後，繼往而開來，那麼生逢歷史時代劇變中的任務，對於現代青少年的思想與心理問題，必須要檢討疏通，求其開展新運。但要檢查現代青年思想的病根所在，與心理病態形成的原因，又必須要從歷史文化演變的過程中，追溯前因與後果，再來尋求治療的藥方。

不滿現實的歷史心理

在五、六十年前的前輩時代，也正是我們出生成長的階段，我們也正如現代青年一樣，具有勇敢、決心、幻想、行動的情緒，同時更有不可一世的氣概。但也正和現在青少年相似，懷有無比的彷徨、鬱悶、煩躁，和敵視現實、否認一切的心理。這是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新舊文化思想開始交替，東西方文化邁向交流融匯，激起中國文化新思潮的巨浪階段。由裹成三寸金蓮的小足，解放爲大足；終身不出閨房一步的女子，爭取男女平權。男子們由終日背誦「之乎者也」，提考籃、穿長袍馬褂上京求名，而變爲寫作的呢嗎啊，死啃ABCD，割須剃髮，穿上西裝革履，大談洋務與西學，誇爲識時務的俊傑。總之，事無鉅細，學無古今，人無老少，一切都在求變、待變、必變的鉅變過程中。我們所接觸的中年以上的老前輩們，他們面對此情此景，滿腔憂患，無限感傷，隨時隨地都在搖頭嘆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而進入暮年晚景的低潮，含悲抱憤而去。但在無情歲月的推排之下，曾幾何時，我們這些青少年們，不滿當時的現實，和輕視否認當時老前輩們搖頭嘆息的情景，也漸漸地進入我們的心境，成爲生活習慣的一種自然姿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不知不覺，自己也進入中年，昔日老前輩們不滿現實的嘆息感言，又漸漸地出自我們之口。這種循環性的歷史悲劇，猶如新舊交響的樂章，具有時代性旋律的哀怨，永遠存在於歷史的陰影裏。這也正是說明：歷史時代的途程在不斷地向前推進，而人類在時代的輪轉中，卻永遠不滿現實。不論任何時代，青少年們固然如此，老年人們又何嘗不如此。由於這個憬悟，我常警醒自己，不必憂傷，不必感嘆，假如我過去了，太陽照樣會從東方升起，歷史依舊會演變下去，後一代的人們，也許比我們活得更有趣，更快樂，也可能更瘋狂。

時代演變中的思想與感情

由於身歷其境，而瞭解人們歷史循環性不滿現實的通病，進而探尋這種隨時代年齡而發生差異的思想與心理原因，便可知道人類的感情作用，經常會左右理智慧思的極限。人的感情，不但對個人私心事物有佔有把握的牢固性，同時對於具有歷史性的生活形態和精神思考的習慣、文化背景、時間和空間的慣適，都有濃厚的感情作用。每當歷史隨時代的推進而演變的時候，由於人們舊有歷史的牢固習慣，只能接受漸變的推排，極難適應突變的打擊。尤其對於眼前現實的精神生活，與耳目感官日常周遭事物引發的感想，例如與社會秩序、家庭環境有關的道德規範，行爲的善惡標準等觀念，在歷史文化變更的過程中，最容易引起青少年的心理反應和老輩子的傷感。尤其在二十世紀末期的劇變中，更爲顯著。站在我們這一代的立場，看到下一代的墮落和瘋狂，真有不勝扼腕嘆息之感。如果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檢討歷史文化演變的得失、前因後果，便可比較客觀地瞭解青少年們思想與心理趨向的矛盾。在這個時代中，舊的過去了，新的還未產生，隨着物質文明的發展，如朽索之馭怒馬，他們失去了可循的準繩，找不到控馭自己的鞍轡，盲目自恣，陷於一片迷惘的境地。不但東方的青少年如此，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青少年，都已染上這種時代性的傳染病症。其實，在這個時代的階段中，真失去了道德的標準嗎？完全沒有善惡的意識嗎？不然。道德和善惡，它永遠存在於人心之中，它是人性中自然具有的一種功能，它只有隨着時間和空間的作用，轉變形態。在人類的文化史上，過去的道德觀念，是基於宗教的因果觀念而定；教育的規範由此而教育，思想的習慣由此而思想，穩定社會秩序兩、三千年。現代的道德觀念，由於物質文明的發達，工商業快速發展中的刺激反應，它逐漸接近以經濟的價值觀念而定，下意識的只有價值與無價值的辨別。過去的善惡觀念，是以人性本應善良，對於心理和行爲的善惡，具有宗教性的報應而定論。現代的善惡觀念，由於科學促使物質文明的重要，同時曲解自由而又極度偏向個人的自私，幾乎走向以需要與不需要來決定善惡的標準。這樣的道德觀念、善惡觀念，雖然還未真正構成爲現代人思想心理的定型，它的對與不對，是與否，實在是非常急切地等待着我們這一代去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既不能憑歷史文化的感情而一切陷於悲觀，更不能徒憑時代的感染而盲從衝動，以致於忽略了隨時偕進的理性思想。

尚未成熟的歷史與文化

生當這個世紀末期的青少年們，傳統的宗教、哲學、教育等道德理性的準繩，已經命如懸絲，失去了它固有的信賴的力量，我們所要的，是有特立獨行和「確然而不可拔」的精神，融合古今中外的所長，建立新的文化機運，使後來的一代，走上安定的道路。

同時更需要認識人類歷史文化的成果，它永遠還很年輕，需要新知的灌溉而求其成熟。宇宙的生命，無論過去與未來，它永遠是常新不古，所以曾子在《大學》上，強調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經》也常提到「隨時偕進」、「與時偕極」的道理，這都是提醒人們不要滿足過去，留戀過去，要展望明天，開啓未來。青春的活力，它永遠是推進歷史文明的動能。道家素來認爲「天地是一大宇宙，人身是一小天地。」爲了說明人類的歷史文化永遠還很年輕的理由，引申道家這個觀念，可以說「歷史是一部大人生，人生是一部小歷史。」

因爲任何一個人，天賦的本能，都有不同的個性和幻想，尤其在少年和青年的階段，幻想經常佔有青春活力大部分的時間。幻想不是過錯，幻想加上學識，在思想和行爲上，便成爲有守有爲的學問素養。幻想不加力學，它可能會變成無羈的劣馬，自誤也會誤人。累積人類的個性、幻想、學識，構成爲思想、行爲與經驗的成果，便綜合成爲人類的歷史與文化。然而任何一個人，由青少年階段，富於幻想的時期開始，其間加以力學，或者不學，便早已奠定一生成敗的基礎。到了中年，便是實現他的幻想，而付諸實際行動的時期；無論是事功的成就，或是學術的著作，甚至於宗教家們修道與傳道的生活，都不外於此例。到了晚年，大概都是留戀欣賞過去的成果，或者感嘆過去的哀樂變爲回憶，而隨時消逝。所以孔子也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如果以現代醫學的觀點來說，當每個人由青少年的時期，腦力開始成長，一直到了五十多歲以後，纔是腦力成長到鼎盛的時期。但上天註定人類可悲的命運，正當他腦力和智慧剛好成熟，經驗的累積又正是到達高峯的時候，便像蘋果一樣，紅透熟爛，又悠然地悄悄落地，還歸虛無。除了天賦特別，老當益壯而成爲瑰寶的，那是普遍中的例外，爲歷史點綴了壯麗的場面。此外，無論是從事出世事業的千秋人物，如宗教的教主和大哲學家們，或是從事入世事功的偉人，誰也無法逃出這個自然的規律。

人生的生命既然跳不出這個規律以外，他在智慧上的成就，可以創造歷史文化的期限，又如此的短暫而渺小，所以古今中外，累積幾千年來的歷史與文化，可以說都是青年人扮演主角的成果，中年或老年人擔任編輯而寫成；它永遠都很年輕，並且尚未完全成熟。雖然由原始的宗教而發展爲哲學，從哲學的範圍而擴充到今天科學的成就；但擺在人類面前幾千年的老問題，所有人生生命的奧祕、宇宙生命的奧祕等等懸案，始終還沒有得到確切的解答，使人確信不疑而安心於定論。並且顯而易見的，集中古今中外人類幾千年的思想與學術，仍然不能使這個人類社會得到永恆的平安，享受幸福而快樂。雖然在這個時代，大家震驚於科學的成就，普遍高唱科學文明相號召，但大多數人都被科學文明衝昏了頭，忘記科學的發展，只是整個文化的一部分而已。況且人們又迷失了科學的方向，只把自然科學的發展，當作文化全部的需要，忘記精神科學，於是愈來愈空虛，幾乎快要成爲思想白癡的時代了。尤其科學的分類雖多，到目前爲止，卻沒有一個綜合科學的創立，更不能與精神文明的哲學會師，這是一種非常盲目的危機。佛說：「菩薩畏因，凡夫畏果。」凡是現代有志有識的青少年們，應該在科學文明的時代中，創立新的歷史文化。如此纔是現代青年新的出路，徒然的彷徨和鬱悶，於人於己，絲毫無補。但既不要爲了科學的待遇而求科學，更不要忘記精神科學的急需建設；否則，這個世紀末期的一部人類歷史文化，必然要走到「瘋狂與鎮定劑齊飛，頹喪與麻醉品並駕」的境界，那是毫無疑義，迫在眼前的社會病態。

# 西方文化的影響

---亦新亦舊的一代

現實與反現實

上文講過人類的心理，是永遠不滿現實的，但生存在現實的世間，又必須要面對現實，而且想要把握現實。可是當現實擺在面前的時候，卻又不滿現實，想要跳出現實、擺脫現實。人，就在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中，反覆忙碌地度過他的一生。而人類的歷史和文化，也就在這種矛盾的現象中，構成了它巍巍壯觀的冊頁。如果從另一觀點來看，正因爲人類有了這種心理，才促成歷史文明的進步；但從歷史生命的過程，和現實人生的經驗來說，這種面對現實而又反現實的矛盾心理，便是造成人生悲劇和歷史悲慘局面的主要原因。那麼，除了這種尖銳對立的現象以外，只要安於現實，便是常理嗎？而且自古至今，人類如果一向安於現實，歷史和文明哪裏會有進步呢？這當然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並且也是現實與反現實問題的關鍵所在，有待逐步分析以尋找它的答案。但把這個問題，牽扯到歷史文明的進步和退化來講，便又引出對歷史哲學的認識問題，須得首先解決：歷史文化到底是進步或是退化？

如果依照東方文化中有關歷史哲學的觀念，無論是中國的儒家或道家，以及印度的佛家思想，對於歷史文化的發展，大體都認爲「今不如古」、「新不如舊」、「動不如靜」。所以人類的歷史文明，經歷愈久，退化愈甚。即如西方文化中宗教哲學的觀念，也和東方一樣，同有這種基本的看法。但是，根據歷史的現象和人類現實生活的需要來講，歷史的文明不斷地向前推進，不但日新月異，而且必然需要在進步中更求進步。那麼，歷史與文化到底是進步或是退化呢？這就要從兩個基本不同的角度來瞭解它的答案了。

從東西雙方古代文化的歷史哲學來說，認爲人類歷史的發展是退化和墮落的，那是從宗教性道德觀唸的立場，看到精神文化的褪色，因此而使人類社會迷失方向，拚命追求物質慾望所生的過患而言。如果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來說，因爲物質文明的日新月異，促進社會的發達，使人類在生存方面，社會的秩序，有了日新的進步，因此而有多方面的繁榮。在生活方面，人類更多更大的需要得到滿足，因此而享受物質文明的便利。所以便認爲歷史文明是進步的。由此可知，所謂歷史是進步的，是指物質文明與人類的現實生活而言。認爲歷史是退化的，是指人類的精神生活，距離自然的境界愈來愈遠的結論。

近世西方文化的三股潮流

對於歷史文明的進步或退化的觀念，有了如上的瞭解，便知人類對於現實和反現實的問題，是從精神意境和物質文明的矛盾衝突而來，歷古至今固然如此，往後也未必能夠安穩。現在試舉近世和現代西方文化，影響了二十世紀青少年思想和心理的趨勢，便可知道這種演變的前因和後果。

近世和現代的青少年們和過去的人們一樣，最喜歡憧憬已往歷史的口號。在西方文化中，動輒提到歐洲的「文藝復興」；在中國則經常提出「五四運動」。其實，歷史的往事過去以後，剩餘的陳跡殘留在人們的腦子裏，便形成一個籠統的觀念。除了真正的歷史學家，肯用心分析歷史上的前因後果以外，大多數的人，都是模糊不清，隨便引用它似是而非的觀念，借題發揮而已。

（一）西方歐洲的文化，經過中古長期的沉悶以後，自然就引發出反現實的歷史行爲，於是形成了十五、六世紀之間的「文藝復興運動」。由「文藝復興運動」所帶來的歐洲歷史的新境界，從此掀起了西方固有文化思想的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潮，因而促成了法國等地的政治革命，形成了近世西方文化思想中民主和自由的新觀念。但由此一變再變，民主思想和崇拜英雄的心理，互相矛盾。自由主義和自私心理，夾纏不清。於是便又形成歷史性反現實的行爲，而產生西方歷史文化的第一股逆流：如英、德、法、意等新型國家「外用強權，內唱公理」之軍國主義的出現。同時又變更民主的專製爲獨裁，假借公理的正義爲侵略。當此之時，受西方文化籠罩的歐洲各國的青年們，其思想大體上除傾向於「富國強兵」的光榮以外，縱然有不滿現實的地方，也只限於反古求新，以及對少數社會和個人際遇的不滿。

（二）但從十七世紀以後，工業革命和科學的創造，帶來高度的物質文明，促使工業的發達和國家經濟思想的勃興；一方面顯示出科學文明繁榮了新時代的社會，一方面卻暴露了工商業發達以後資本主義的弊病，而呈現出貧富之間過度的懸殊，於是促使新的不滿現實的西方文化思想，形成第二股反叛的潮流。如馬克思、恩格斯等針對當時歐洲社會的病態，提出資本論和共產主義，擴充古希臘哲學的唯物思想，構成一系列的理論，影響了繼起的二十世紀。

（三）另一路反現實的思想，便是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由丹麥醫生契爾伽德Kier Kegard，研究神學及哲學的結果。他認爲機械文明桎梏了人性，爲了要拯救世人跳出機械文明的瘋狂病態之中，便倡言存在主義的思想。不幸的是，他的學說，不但救不了人類，而且也不能自救，結果未及中年，便憂鬱而死。可是尚未成熟的存在主義，卻同弗洛伊德 Freud的性心理學一樣，不久即風靡歐洲，又普及於全世界，影響青年們的思想和心理，外不足以救世，內不足以自救。它所產生的反作用，使有些人們把自我陶醉和自私、狹隘的心理思想，號稱哲學。

這些西方文化的思想，跟着科學文明和工商業機械的發達，以及軍國主義武器的擴張，真有如蒲松齡所說的「元夜西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很快地吹到了東方，同時又錯綜複雜地引起了世界第一次的大戰。

人類的心理思想總是那樣可憐和可笑，始終是自編、自導、自演的喜劇開場，而後卻自造成悲劇閉幕。初由不滿現實而反現實開始，最後再把它投向凶神惡煞的懷抱中而自悲自嘆。

二十世紀開始的青年與中國

正當西方歐洲的文化思想，尚未從繁華的噩夢中，步入燈火闌珊的時候，一陣陣的西風，吹醒了有五千年保守文化的古老中國；自十九世紀的末期，清朝鹹、同年間開始，十分勉強地向西方文化低頭，試着學習他們的輪船、大炮、洋槍、火器等。先由機械文明的輸入，進而至於宗教、哲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以及西餐、大菜、咖啡、牛奶、跳舞、歌唱、奶罩、三角褲等，無一不來。把白米飯換換胃口，喫些牛奶、黑麪包還不要緊，最慘的便是由人文思想而到現實的政治，不管是自由、民主、專制、獨裁、無政府主義等思想，一套一套地都搬上中國的舞臺，大吹，盲目地實驗一番。結果弄得慘不忍睹，無法收拾。雖然有國父孫中山先生堅強地建立起三民主義的防線，卻仍然堵不住這股狂飈的滾滾來勢，其實有些思想是西方文化的殘餘產品，並非東方或中國文化的玩意兒。

五四運動以後的重重難關

但距今五、六十年前的中國青年們，一方面痛心於國家民族的懦弱，而急欲救亡圖強。一方面又受外來新穎的西方文化之影響，於是整個思想陷於古今中外的矛盾衝突，而呈一片混亂。因此形成心理上的羣情激憤。「革命」「打倒」的呼聲到處嚷嚷。認爲必須學習西方歷史文化的先例，來個「文藝復興運動」才能救中國，因此，自然而然地便有中國「五四運動」的發生。有些人把「五四運動」的功罪，歸之於某一人或少數人身上。這是昧於歷史文化大勢的看法，有待沉靜研討。但當此之時，尤其是知識分子們，在文學的領域裏，大肆口誅筆伐，極力挑出舊社會的毒刺，加上私人的恩怨心理和憤世嫉俗的情緒，對於中國文化流弊所生的陰暗面和醜陋面，力加詆譭。因此大受當時青年們的讚賞和崇拜。文學所反映出的不滿現實和反現實的心理，在每個時代裏，往往勝過哲學、宗教、教育等的影響力量。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青少年的思想與心理，就在這種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心理狀態中，而陷入一團混茫。

但我們這一代不幸的命運，坎坷不已。正當國內的心波未平，東方的日本，又掀起侵略的浪潮，促使我們倉卒抗戰，百學皆廢。經過八年長期抗戰的結果，正在茁壯中的青少年們，身受國破家亡的打擊，除了憤怒與沉哀的心情以外，對於文化思想的重整與開建，已無能爲力。

總之，自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青少年們，也就是現在大家所聽到看到的中老年人，有如一羣拆除舊式違章建築的拆除大隊，又像一批收拾垃圾的清潔人員；當他們年輕力壯的時候，大家拿着鋤頭板斧，想爲後代開闢一條康莊大道，建築一個新的文化樂園。誰知正當開工的時候，忽然有人放了一把野火，最後只剩下一片荒涼，百無一就。後來跟着來了一批小孩子，看到這幅圖景，便不知所云的大罵這些前輩的老少年們，「無能」、「不負責」。他們愈看愈有氣，於是就光着屁股、跳着腳，亂跑、亂罵，胡來一起。哭着、叫着、罵着，一無結果。大夥鬧倦了，茫然一片，只好橫七豎八，躺在地上耍懶，自稱樂天知命而不憂了！這樣一幅畫面，足以代表了二十世紀的東方和中國歷史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冊頁，也就是形成現代青少年們的思想和心理上的一片空白的成因之一。

# 大時代的小故事

---亦新亦舊的一代

開始沒落的西方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東方的一幕悲劇，但也同時裁判了西方歐洲的命運。意大利、德國、法國，乃至在十九世紀中號稱無落日的英國，都相繼沒落了。殘餘的歐洲文化，除了一些歷史的陳跡供人憑弔以外，過去號稱列強的歐洲「諸侯」之邦，如德、法等國，只留下「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女多男少景象，使人感慨唏噓而已。

「十年風水輪流轉」，目前震驚世界的西方文化，只有美國的金元與科學、它建國將近兩百年的年輕歷史、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運用着這些本錢，美國小開們後來居上，用毫無領導世界歷史的經驗，加上「信道不篤，爲德不果」的作風，來搖盪乾坤，捭闔樽俎。然而不論美國的文化是如何的幼稚和淺薄，在二十世紀的最近三十年來，它對於中國和東方，以及其他的科學文明和工商業落後的地區而言，卻實在有左右影響的足夠力量。

有關中美文化的不同看法

現在要講現代青少年的思想與心理問題，而它與西來的「飄」風，卻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首先要向大家述說我親自經歷的二、三個小故事，以便從側面來透視它的正題。

美國青年觀念中的現代文明

第一個故事：五、六年前，有一位美國來華留學的學生，跟我聽課將近六、七個月。有一天晚飯後，我們開始閒談。他問我：「你常說我們要先發起救世救人的志願，才能作學問，那是爲了什麼？」我當時很驚奇地說：「你聽了這樣久中國文化的課，對於這種基本的精神，還沒有弄清楚嗎？」他說：「我只問你爲什麼要濟世救人？」我說：「你沒有覺得這個世界，有太多的慘痛嗎？」他說：「這個世界在現世紀中科學文明如此發達，人們多麼幸福，那裏有太多的痛苦呢？」我說：「你沒有看到因爲科學文明的發達，促使世界第一次、第二次的大戰，多少人受害受苦？而且戰爭的悲劇還未就此終場？」他說：「這兩次世界大戰也只是局部性的。如果以整個世界來說，到底很有限。大多數地區的人，都很幸福。這個時代真是最光輝最美麗的時代。」我聽得呆了。同時，也明白了美國現代青年們的思想與心理。我接着問他：「美國青年們和大多數的美國人，都和你這種觀念一樣嗎？」他說：「大概如此。」我便說：「假如你是澳洲或瑞士的青年，一定早就認爲我是瘋子，拂袖而去了！可惜你不是東方人，更可惜你不是東方的中國人，所以對於現世紀的文化思想所造成歷史的慘痛事實，以及有關的災禍，並沒有親自經歷那麼多的教訓。一時和你也說不清楚，慢慢地再交換意見吧。不過，我也因此瞭解你們國務院裏的『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錯誤心理。更明白你們所謂的中國通，根本上便患有先天性不通的偏見。」

他最後又說：「你們常常說我們患有民族優越感的心理病，其實，我在東方一年多，住過日本、印度，又路過東南亞等地。現在跟你們住了六、七個月，我發覺最富於民族優越感的是東方人，尤其是東方的中國人。」我笑說：「你已經沾有中國文化師生之誼的禮貌，你不好意思說民族優越感最強的是我，對吧？」說完了，有許多未盡之意，便在彼此哈哈一笑中結束了這一次的談話。

美國教授觀念中的中國文化思想

第二個故事：四年前，一位美國某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在暑假期間訪問東方。因爲他讀過我所著《中國特殊社會問題》的英文譯本，特別安排與我碰面，又提出好多問題。其中，他問到「中國經過幾次等於亡國的時代，但是這個國家、民族、文化，不但沒有亡掉，而且每經過一次歷史的災難，反而更加光輝而強大，這在西方歷史上，幾乎是絕無此例，這是什麼力量？」我當時簡單明瞭地答覆他：「這是文化統一的力量。」他聽了，雖然手裏不停地在作筆記，但是他的態度充滿了懷疑。我不等他再問，就說：「當我們在春秋戰國時期，和歐洲一樣，諸侯之國大小數百，言語、文字、經濟、交通等都各自爲政。自從秦，漢統一以來，『書同文，車同軌』，因此不僅是政治上的統一，實在也是中國文化的大統一。後世二千年來，中國各地的方言、習慣與風俗，雖然還保持各自成文的慣例，甚之，相隔數裏，便有言語完全不同的情形。但是，中國的文字和文化思想，卻完全一致，而且遠及亞洲的日本、韓國、越南等地，也同樣地普遍。因此，後來中國的歷史，雖經歷代政治上的變革，更改了歷史的面貌，但是民族文化的大統一，始終是一貫不變的。假如西方古代的歐洲，文字和文化的統一，也和中國一樣，那麼，西方的歷史便不是現在的情形了。不過，話說回來，正因爲西方的歷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同異互見，所以纔有十七、八世紀以後的進步，和今天西方文化在美國表現的情況。我們傳統文化的精神，儒家、道家的思想，都是要求統一的。」

最後，他提出儒家孔子的大同思想，《禮運》大同篇裏所述說的情形。於是我便說：「《禮運》大同篇所敘述社會政治的理想，它的主要中心，在於每個人人性的自覺，人人要求自己道德人格的昇華，進而達到社會羣體道德的完美。《春秋》的王道、《公羊傳》所謂三世中的太平盛世、道家取法於自然的『無爲』之治，都由此傳統的文化思想而出發。」

美國式的自由和民主

第三個故事：四年以前，一個留華修碩士的美國學生，和我討論許多有關中西文化的問題，他曾經想把它翻成英文，已經積了好多稿子。有一次，他和我討論自由和民主的問題。我說：「在現代史上，美國人打着西方文化唯一光榮的旗幟，便是自由和民主的呼聲。其實美國人所說的自由民主，只能說是『美國式的自由和民主』，並不適合於其他民族、其他地區。尤其對於有五千年以上歷史文化的中國，更不適宜。但你們自己不明白，更不肯反省，因此美援與美式自由民主思想，對所到的地區所發生的作用，正好與美援成爲對等的反感。」

他問：「你所謂美國式的自由和民主，這是什麼意思？」我說：「這要從你們立國到現在，二百年來的歷史成因說起，相當複雜。總之，由十八世紀到現在，美國的祖先們，雖然帶着歐洲工業革命後的文化，闖進這塊新大陸。但來自英、法、德、奧等國的，各自有一套祖國文化背景的觀念。加上利益共同均沾的思想，因此，而形成你們『民有、民治、民享』的立國精神。但無論如何講究的自由和民主，在先天性的骨子裏，都潛在有工商業化的利益和價值的成分。立國之初是如此，到兩百年後的今天還是如此。說句老實話，你們現在的民主政治，幕後的操持者，仍然不能離開工商業資本威力的背景。誠然！美國到目前爲止，對其他地區，還並無太大的領土野心，但不能說沒有佔有市場的要求啊！一有如此潛在的存心，加上國內的人們，對外界世局認識不清，受到民主政治牽制的弊害，於是在國際政治上，便舉棋不定，依違兩可。你們想要領導世界局勢，必須要熟讀中國的《春秋》，多學些國際政治的經驗，然後才能瞭解《春秋》中『興滅國，繼絕世』的大義。」到現在，這位美國同學，已經回國在哈佛大學任教，開始教授《春秋》、《左傳》了！

我們爲了要討論近三十年來，中國青少年們受到美國文化風氣影響的關係，所以首先要講述以上我所經歷的小故事，然後再來探討「彼美人兮自西來」以後的得失利害。

# 美國文化帶來的迷惘

---亦新亦舊的一代

美國文化帶來的迷惘

講到二十世紀的歷史與文化，和現代人的思想與心理問題，無論東方和西方的任何國家、任何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或多或少，總要受到美國的影響。尤其是東方的中國和日本，關係更大，更爲密切。

全世界所有的國度裏，除了少數真正的落後民族，以及某些因爲地理環境的關係，還在將變未變的國家，目前正坐享其成地接受現代物質文明，而仍能固守傳統，苟安待變以外，歐洲的國家，如英、法、德等國，雖然抱着傳統的自尊，始終存有看不起美國的心理，但在歷史演變的時代趨勢中，也仍然脫離不了美國風氣的迴旋波盪。至於東方的中國，在最近的三十餘年中，確有美人鬧亂朝市，形成「親者痛而仇者快」以及「恩裏生害」的情況。

現代的中國青少年們，急需認識和反省的是：造成世界局勢至於現在的局面，除了美國立國經驗太過幼稚以外，同時也是我們自己處在新舊文化夾縫潮流的趨勢中必有的矛盾。現在，我們要想在極度的艱難困苦中，力求自強而復興，就必須先對此歷史時代的前因後果，加以尋思探討，才能「溫故知新」，才知如何自立而立人。

西風吹醒日本登上列強的席次

距今百年以前，東方的古國——中國和日本，在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後，西方新興國家的眼光裏，幾乎也被視爲第二個或第三個印度。其時，日本和中國，都同時警覺到關門拒盜的迷夢並非良策。於是，先後派遣留學生到外國學習西方文明。但是，那個時代所謂西方文明的重心，是在歐洲的英、法、德、奧等國家；美國，僅屬其次而已，並不像現在一樣有舉足輕重之勢。

日本的留學生回國以後，便出現了日本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明治維新。由此，促使日本躍登列強的地位。中國的青年呢？在清朝的腐敗殘局中，許多回國的人才，除了少數在洋務衙門行走以外，別外還有的，只有在洋行買辦這一行中，自展抱負而已。當然，這不是當年中國青年們的過錯，這是中國歷史悲劇的一面。由此悲憤而化爲國民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的力量。

日本之所以如此，自然歸功到它的歷史背景，促成明治維新的幸運。當時的日本，在政治方面，因有天皇萬世一系的觀念，別無民族或其他大問題的存在。所以君明臣賢，而建立了伊藤博文等不世的殊勳。在學術思想上，因有中國宋、明儒家以後王陽明理學的普及影響，化成日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除了以西方的科學文明爲用，仍以日本大和魂的民族文化精神爲主。在國家的士氣方面，因有強橫霸道武士道的傳統，特別容易與軍國主義結合，於是一變就成爲「大日如來」的帝國主義侵略思想。

西風吹亂黃華

而當時的中國呢？恰與日本相反。在政治方面，始終存在着將近三百年來的民族問題，以及清廷末代萬難收拾的腐敗政局。在學術思想上，五千年來的文化，遠有儒、墨、道與諸子百家的汪洋浩瀚，各宗所是，互爭長短。近有儒、釋、道與東西方新舊文化的交流比較，莫衷一是。尤其正當三百年來民族革命改變歷史的關節上，盲目地直接承受法國式的革命思想，捨己之所長而取其糟粕。甚之，唯恐革之不盡，致使在學術思想上，缺乏重心而呈一片混亂。至於國家士氣方面，由明末清初三、四百年來，無論朝野上下，都對一本小說——《三國演義》，深植了濃厚的感情和興趣。由桃園三結義而到單槍匹馬，縱橫天下，割據城池，自我英雄的崇拜，配上拿破崙式的戲劇性思想，便造成保皇、復闢、稱王稱帝以及一連串北洋軍閥的歷史悲劇。由此而有國父遺囑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由此而有德、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的抗日戰爭。只因日本一念之差，毀了中國，也毀了整個東方的文化。我們瞭解了這些歷史事實，拿我們國家的現代史，與日本、蘇聯的現代史來比，你說，誰應該負這個責任呢？「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第二次大戰中的暴發戶——美國

姑且不論我們過去有多久遠的歷史，但在人類歷史的無盡過程中，卻只佔了極短的一節。然而在這幾十年來的經歷，如果比起美國立國二百年來的歷史，我們的國家，便如佛家所說，已經經歷好多次的危亡劫運而不堪回首。我們這些「半老兒郎」或「老乃國之寶」的老少年們所遭逢的苦痛和傷感，絕不是現在中國青少年們，由中學和大學的課本上所得到的歷史常識中能體會得到的。然而美國和現在青少年們心目中的美國文化，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轟然爆發，一躍而居於西方文化的首席代表地位。

在我們現代青少年的心目中，說到西方文化，就好像只有美國似的。而十九世紀，西方文化系統的英、法、德、奧的光榮，就只在白紙上佔據了數十頁面，供人觀靡研究而已。殊不知五、六十年前，當英國稱雄世界的時期，英國文化便佔據了一切。留學的目標，與回國的標榜，唯英國的馬首是瞻。後來德國和日本興盛，德、日派的思想和德、日派的權威，又成爲一時的風尚。英、德、法、日過去了，現在便輪到美國最喫香。但是，我們盲目追隨這個歷史太過年輕、有衝勁、有幹勁而文化太過幼稚的朋友，崇拜它的裸體美，傾心它的紙醉金迷，實在和玩弄火山上美人一樣的可怕。

我們必須警覺，對於國家、對於人類歷史和文化，萬萬不可以「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否則，這個求證的代價，所需付出的生命血汗實在難以計算。青少年們，一聽到這些中老年的朋友們在批評或譏笑英、美的「嬉皮」，看不起「嬉皮」，就非常反感。反而對於「嬉皮」有無限的偏好和同情，而對於這些批評和奚落，卻有着無限的不滿。其實，英、美式「嬉皮」風氣的出現，正是表示歐、美的青少年們，對於西方文化一股反抗的浪潮。他們爲了反對前輩的傳統文化，揚棄宗教的信抑，擺脫舊哲學的傳統，討厭物質機械文明而生出種種的反動心理。「嬉皮」！「嬉皮」！並非偶然的「頑皮」！但時至今日，美式的「嬉皮」，又要很快地成爲過去，他們現在正在盲目地探尋東方印度文化的「超越冥想」，和中國文化的「口頭禪」，以及中國道家的「旁門左道」，作爲趨向於「超心理學」的路線。

平天下不能寄望於牛仔式的紈袴

其次，我也常常聽到我們自己的朋友，很得意地引用英國前任香港總督葛亮洪在美國的演講，他認爲「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可惜我沒有親自聽到，同時很難百分之百證實這句話，即使真有其事，別人信口開河一說，也許是別有用心，我們自己不自強，行嗎？?且，且看今日的美國，對內對外的舉措失當，都是使人唏噓的事。如果沒有前年的送人登陸月球，藉此一手遮閉天下人的耳目，恐怕它的聲望與國際地位，早已隨着美鈔的無形貶值，喪失在歐洲共同市場的坫壇了。在當前世界史上，美國最叫座、最成功的便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但是今天美國在國際上喪失聲威的致命傷，無論在國內或國外，也便是害在「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的作爲上。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國際政治上，無論在歐洲或東方，凡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所到達的地方，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別人的國家瓜分爲二。而且美國始終不知如何纔是真能安邦定國平天下的上策。內政上，在「美式」的民主和自由的旗幟下，弄得全國充滿了黃（色情氾濫）、藍（工人問題）、白（吸毒與服用麻醉品流行）、黑（種族問題）等各色危機。外加學生鬧事、婦女運動、逃避兵役和漏稅等問題，無一不是領導世界青少年走上墮落的歪風。

當然囉！這些問題在美國人的思想中看來，並不重要。他們沒有歷史文化的包袱觀念，隨時可以改變，隨時可以通過民主的議會而改正它的缺點。他們有足夠的自由，也有足夠的勇氣，能夠做到「知過必改」的程度。然而其他受到美國風氣影響的青少年，學壞容易，變好卻難，這又怎麼辦？

前些日子，有一位半洋化的中國青年，和一位美國少年對我說：「你們政府下令不準青少年留長髮、變『嬉皮』相，可以。爲什麼對我們外國人也要干涉？」我說：「你到中國來做什麼？」他說：「讀書。」我說：「既然到中國來學中國文化，對不起！中國文化素來講究『整其衣冠，肅其瞻視』，這是我們的『國風』，『入境隨俗』，不容馬虎。如果我到天體會去，一定也照他們那麼做。這是要適合國際間社會的禮貌，你不能認爲這是干涉你的自由。我在街上看到你們同學們赤着腳走路，我們從來沒有人干涉過，對嗎？」

千金之子與賈母

此外，有人認爲美國花了那麼多的軍費在歐洲、在東方的幾處戰場上，又死了那麼多的人，爲什麼不徹底地訴之於武力，求得國際間永恆的和平。其實，這便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的必然結果。他們的政治人物，即使有才如管仲、樂毅，也無法一展其志向。他們的軍事人才，即使有智如孫武、吳起，也無能一展其懷抱。只許在國外打不準勝利的戰爭，限制軍事戰略的發揮，這是「美國式民主」的主意。可以瓜分別人的國土，畫地自守，要求別人實施「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好讓自己閉門揖讓，熙熙融融地享受物質之樂，這是「美國式民主」的一貫政策。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數十年如一日都如此，實在不足爲奇。

所謂「美國式民主和自由」的特徵，正如他們一位從工商業起家的名言：「世界上最大的學問，便是如何讓別人把口袋裏的錢，很高興地送到我的口袋裏。」「學而優則商，商而優則仕。」民選仕途幕後的牽線主力，始終離不開擁有工商業，而需要隨時爭取國際市場的資本家的手心。爲實行國際道義，幫助別人「興滅國，繼絕世」去打仗，在工商業的成本觀念上，萬萬劃不來。所以不能打，也不準打。此外，民選的票源，是廣大的民衆，美國一般民衆與老太婆們，真不懂他們自己的政治家和軍人們，何以對現成的福不會享？硬要出兵遠涉重洋爲別人去打仗？「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誰家的老太太們，願意把自己的富家紈袴弟子，送上戰場？

民主的選票是權威，在美國的大觀園中，如《紅樓夢》中賈母和王熙鳳之流的人物，佔有全國半數的選票。她們和他們的資本家，雖然是同牀異夢，然而對此卻是殊途同歸。她們和他們，聯手投票送一個有政治理想的人上了臺，起初二三年中剛好摸熟了國內外政治的行情，還未能有所作爲，便要忙着爲下次選票，爭取同情。縱有掀天揭地之才，其奈天下蒼生何？又奈全民選票何？況且以下駟之才，處於民主選票的悠悠之口，「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誰又敢冒糾正積非成是的危險，甘爲正義而自毀其政治前途呢！

美國文化不是人文文化的指標

由於這些粗枝大葉的認識，我們的青少年同學們，就可認清「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以及它的文化思想的是非得失。同時應當知道自己沒有特立獨行的文化思想，而盲目傾心愛美，於國於家，後果均不堪設想。

如果從科學的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工商業的發展去認識美國，而立志要向今天美國的這一面學習，這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思想。至於從整個的人文文化而言，僅有立國二百年曆史文化的國家，就拿它代表了西方文化，認爲它是蓋過一切，那是莫大的錯誤。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累積全國人心上下數千年經驗和思想，方能構成一個文化的大系。今天的美國，僅是西方文化零落中的一顆經天彗星，它是科學文明的實驗場，並非就是整個人文文化的指標。

# 望子成龍

---亦新亦舊的一代

反身而誠論遺傳

目前提起青少年的問題，從各方面的見聞所及，不是涉及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就牽連到社會教育有關的社會風氣方面。同時，社會演變隨着時代的變化，日益加速，不但青少年的問題有與日俱增的嚴重趨勢，跟着而來的，兒童問題與問題兒童等也同時併發。於是，一聽到這些問題的表面，便像一個很嚴重的危機，就在人們的心裏，將要隨時爆發似的。束手無策地憂慮和嘆息，便替代瞭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其實，一個人或社會羣體的思想和心理的成因，是由許多因素而組成，並非只是單純或少數的幾個原因所造成。一個人的思想，從意識活動而來。意識的活動，隨着身體生理的成長和變化，以及家庭、教育、社會環境等各種影響而形成。由於意識活動構成各種思想的變化而造成心理的狀態。復由心理的狀態，反覆接觸外界的刺激和反應，而產生一般思想或某種特殊思想的範疇。依中國文化的習慣觀念來講，綜合起來，由嬰兒、孩童，到達少年、青年，每一階段暫定以五歲作爲界限，節節形成一個人的思想與心理的作用，必須憑藉身心兩方面互相影響而成長。

暫時擱置形而上的生命本體論的秉賦問題不談。遺傳、家庭、歷史文化、時代潮流、社會環境與學校教育等六個因素，便是形成青少年們思想與心理的主要成因。其中忽略了任何一個問題，都可能會造成偏見與錯誤的論斷。因此研究青少年問題，隨便籠統地涉及家庭教育或學校教育等問題，未必盡是確論。

關於遺傳的問題，現在不想牽扯太遠。冒然鑽進遺傳學的範圍，難免變成坐談學理而不切於實際。如果嚴格討論到遺傳的關係，便會牽涉到人類學、民族血統學，乃至天文、星象、地理環境、生理學、性心理與性生理學，以及中國古代文化重典中《禮記》的胎教等等許多學理。因此，暫時只討論到遺傳的實際關係。

任何一個兒童或成人，他的心理狀況，除了主要原因——得自先天形而上生命本體的秉賦，略而不談以外。他的意識潛能的成長，實由於父母遺傳的秉受，有大多數的因素。只是一般人忽略了這個問題的重心，或者根本沒有發現這個人父母本身潛在意識的重點而已。而且遺傳的作用，大約有兩種形態：（1）直接遺傳：這便是說某一個人的遺傳作用，是由父母兩人的直接秉賦而來。（2）間接遺傳：這便是說某一個人的遺傳作用，是由祖父、祖母，或外祖父、外祖母的血緣關係而來。無論爲直接遺傳或間接遺傳的關係，一個人的個性和心理的形成，屬於遺傳的關係，幾乎佔有一半的成分。但是遺傳的關係，又有更代變化的作用，並非是父母或祖宗是白癡，所生的子女必定就是白癡。在遺傳的成因中，他還有自我的秉賦，加上受胎時的時間、空間的物理環境，以及父母在性行爲時的心理與思想等等主要正反的遺傳原因，因此而起變化成爲更代性的成因。

望子成龍豈如人意

此外，遺傳的作用，最爲明顯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它有承受傳統遺傳與反承受傳統遺傳的兩種作用。（1）所謂承受傳統遺傳：這便是說某一個人，他的父母是純良老實或者刁鑽古怪的人，而所生的子女，也是純良老實，或者刁鑽古怪。（2）所謂反承受傳統的遺傳：這便是說某一個人，他的父母是純良老實，但所生的子女，卻很刁鑽古怪。他的父母是慷慨好義，而所生的子女，卻是慳吝自私。或者介乎兩者之間，具有雙重性格的個性。相對地，某一個人的父母是刁鑽古怪，所生的子女，卻很老成持重。這種現象便是反承受傳統遺傳的作用。他的父母是滿腹經綸，所生的子女，可能是冥頑不靈。因此中國古史上的有名的唐堯是聖人，但是他所生的兒子丹朱，卻是一個不肖之子；瞽叟不是好人，他的妻子也很壞，但是他們所生的兒子虞舜，卻是聖人。有些忠厚老實之家，反出敗子。有些不善良的父母，反而生出大好人的兒子。這就是說，在某一父母的心理潛能裏，他有善良的一面，也有很不好的一面。例如一個老實人，處處肯喫虧，可是這種肯喫虧老實的行爲，是壓制內心的反抗，無可奈何而變成的老實表現。實際上，他的內心並不寧謐，雖然壓制心理思想而表示爲老實喫虧的外表行爲，但仍不能平靜內心，含蓄有極端的憤怒和慍怨的嗔恨。因此，便形成更代遺傳的相反個性。或者，在受胎的性行爲時，男女雙方的思想心理因某種事實，或天然氣候，或某種環境的影響，而構成當時心理的極大抗拒和鬱抑，也就變成更代遺傳的相反作用了。所以望子成龍而未必盡然，並非偶然的事。

由於這個道理，所以大學問家的子女，也許是天生不通文墨，不愛好讀書的種子。大英雄的子女，也許是過分懦弱的人物。文學家的子女，可能不愛好文學而喜歡玩耍。藝術家的子女，可能是鄙視藝術而喜愛做工或經商。軍人的子女，可能愛好文學而反對軍事。工商業鉅子的子女，可能是遊手好閒，貪戀遊蕩的角色。其中原因，錯綜複雜，要由諸位有心研究者，以科學的方法去搜集資料，統計結果，加上哲學的推理，便可求出結論。那時，方知我言不謬也。在此只是指出原理、原則的所在，要同學們去深入研究。我沒有時間也沒有作這些精細統計的工作。我現在所講最主要的重點，是希望家長們，或者注意家庭教育的人們，應當先了解這個原理，自己加以反省，或進而作更深入的研究，然後纔對兒童教育與家庭教育實施正確的方針。如果一味望子成龍，好像有些父母一樣，把自己一生的失敗和沒有達成的願望統統加在子女身上，要他們努力向上，去替自己爭口氣而光耀門楣，榮宗顯祖，這不但是很大的過錯，實在也是作父母心理道德上的罪過。結果一味如此妄求，他的結果會適得其反，反而造成子女在心理上潛在的抗拒，結果便變成不容於家庭和親友鄉裏，而社會上，又隨隨便便加以一頂太保或太妹的帽子。不但使自家無後，而且也使國家社會，無故喪失了一個有用的人才。同時，希望一般盲目跟着升學主義走的人，能夠寧靜自思，好好爲家庭、爲國家、爲社會着想，而努力地教育子女成爲有用的人才。

什麼是家庭教育

講到家庭教育，聽起來是很普通的名辭。任何一對父母，有了子女，由嬰兒至孩提，由兒童到青年，誰又不施管教？古今中外，哪個孩子又沒有受過家庭教育呢？除非少數的例外，屬於不幸者的遭遇，那就另當別論。因此，所講家庭教育，豈非極普通而不成問題的問題嗎？然而，如何是家庭教育的標準？家庭教育應該要怎樣做？哪些父母纔有資格擔任家庭教育的主角？這等於說：凡是學校，都有老師，可是哪種人纔有爲人師表的資格？誰又是真正的好老師呢？所以當父母或家長的人，他自己本身的家庭教育，和他所受的其他教育，是否都夠水準而無差錯呢？這些都是決定家庭教育的先決條件。倘使講家庭教育而忽略了這些問題，或者把問題青少年的過錯隨隨便便，一概歸咎於家庭教育，這就真成爲家庭教育思想的問題了。

中國文化中家庭教育的論著

依照中國人一般通俗的觀念來講，大體上都認爲我國的家庭教育，是最完善、最悠久的倫理教育。歷史悠久，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否最完善，那是多方面的問題，不能泛泛而論。在中國文化中，對於家庭教育，列有明訓的，最早莫過於《禮記》。我總希望自己的國人、自己的民族，都能先行深切瞭解自己的文化。至少，也須人人一讀《禮記》的重要部分，所以在此不再詳引。但是依照古禮——也可以說是古代的文化制度，童子六歲入小學，先從「灑掃應對」開始學習。以現代語來講，便是先從生活的勞動教育入手，以養成清潔整齊的習慣；然後施以待人接物的禮貌教育，這便是所講「應對」的內涵。換言之，古禮的六歲入小學，先從「灑掃應對」開始。它的教育精神，是注重在人格的培養，和禮儀的規範，並非先以知識的灌輸爲教育的前提。所以在《論語》中記載孔子的教育，也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透過這個主要的中心思想，便可想而知中國古代，對於「灑掃應對」的兒童教育，也是在入學後開始。難道六歲以前，在家庭方面，便沒有教過「灑掃應對」的事嗎？事實不然，所謂「灑掃應對」的教育，當一個兒童在家庭中受到父母家人身教的薰陶，早已「耳濡目染」，所謂不教而教，教在其中已矣。六歲開始入學，除了注重兒童的生活教育，和禮儀教育的基礎以外，便以知識和技能的養成爲前提，那便是：禮、樂、射、御、書、數等有關文事武功的「六藝」。到了十八歲入大學，才實施立身處世的成人教育。所謂「學而優則仕」，便是指這個青年階段前後的教育而言。總之，中國古代的家庭教育，讓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除了《禮記》上所列舉有關的記載以外，並無別的專書。

漢、魏以後，對於家庭教育，逐漸出現了專書。但是嚴格地說一句，那些有關家庭教育的皇皇大著，並不見得是爲教育的理想而立論，而且更不是由教育哲學的基礎而出發。那些著作大體上還是受到秦、漢以後門第觀唸的影響而作。例如漢、魏之間班昭的《女誡》、隋朝顏之推的《顏氏家訓》等。而且它是成人的倫理思想教育，並非絕對可作爲兒童家庭教育的範本。宋、元以後，理學家的儒者們，滲入佛、道二教因果報應的觀念，散見於個人學案中有關家庭教育的思想，更爲普遍。自元代儒者郭居敬選定了《二十四孝圖說》以後，到了明代理學家朱柏廬所作《治家格言》，便更普遍地被認爲是兒童教育的讀物。而原屬於道教教義的《太上感應篇》，以及亦儒亦道亦佛的《陰騭文》、《功過格》，也普遍流行爲家喻戶曉的家庭教育指南。清儒陳榕門所著《五種遺規》中的「教女」、「訓俗」兩種遺規，都可以說是儒、佛、道三家的有關家庭教育思想的匯流。實際上，這些著作，大體都是倫理思想和人格養成的成人教育的範圍。所以說在中國文化中，對於家庭教育的思想、理論、實施，是否真能稱爲最完善的，就須重新磋切商量，不能空泛而驟下定論。

# 孝 和 愛

---亦新亦舊的一代

以孝道治天下的家庭教育

從中國歷史文化來講，自漢文帝、景帝以後，「以孝道治天下」的教育精神，便已逐漸奠定基礎。而漢武帝時代選舉制度興起以後，社會風氣更加註重品德。所謂「賢、良、方、正」之士的選拔，促使政府與民間社會，自然而然注重家庭教育，以人格培養爲其重心。到了魏文帝以後，竭力提倡孝道，由此使得歷代帝王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形成了「聖朝以孝治天下」的名訓和準繩。然而「孝道」是宗法社會氏族中心的家庭教育的標準，它有時與國家觀念或忠君思想，不能兩全其美。唐代以後，爲求「忠孝」思想的統一，便將《孝經》和「大孝於天下」的精神調和貫串，而產生過去中國文化思想上的名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的定訓。

「以孝道治天下」絕對沒有錯，而且「孝道」是中國文化的特徵。但是在近代三百年來，中國文化的「孝道」卻在歷史政治上出現了正反兩次的鉅變。這正如莊子所說：「一般人爲了提防扒手與偷竊，一定把東西封鎖起來，這是世俗人共通的知識。但是大盜們來了，便挑起箱子，抬走櫃子，而唯恐你封鎖得不牢固，以致有所散失。」天下事有如此難料的變化，人心思想的邪正，有如此不定的反覆，如果不好學深思地深入文化哲學的堂奧，豈能深切瞭解一種文化思想的利弊。

所謂「以孝道治天下」的正變，便是清兵入關以後，康熙運用「以孝道治天下」的政策。誰能相信清兵入關，只以三部書就統治了四萬萬人口的中國呢！相傳愛新覺羅氏入關前後，要滿族子弟，只要熟讀一部《三國演義》，便知兵法。到了康熙登位以後，在政治思想上，就採用「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的祕訣。他要滿族的王公大臣，必須熟讀《老子》。後來又提倡《孝經》，極力揭示「聖朝以孝治天下」的古訓。把《孝經》配合他的「聖諭廣訓」，規定在鄉的秀才或族長們，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必須講解誦讀以規訓子弟。老實說，康熙把中國文化「孝道」的特徵，深入到民間社會和家庭方面去，這是他的一大德政，也是他奠定大清政權的一項最有效的措施。但相反地講，他利用了「孝道」做爲統治的權術，他用「孝道治天下」的辦法，對付了關西大儒李二曲的不合作主義；同時又採用漢代地方選舉「賢、良、方、正」的辦法，而開了「博學鴻詞」的特科，網羅了反清的遺臣和志士，因此而使顧亭林等無所能爲。試想：人人都須作孝子順孫，家家都要孫賢子孝，還有誰家的父母肯叫自己的子女去爲反清復明而造反殺頭呢？然而無論康熙「聖朝以孝治天下」的措施是德政，或是權術的運用，此舉可說是「孝道」思想在近三百年來的正變。

東西文化的「愛」和「孝」

正變也罷，反變也罷，歷史文化的演變，終歸要成爲過去的陳跡。但處在歷史夾縫時代中的我們，內遭古今未有的鉅變，外受西方思想風氣的壓力，仍然想要講究「孝道」而談家庭教育，恐怕未必能夠盡遂人意。

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思想，並不須要過分急於全盤西化或半西化。事實上，一般的思想大體都已洋化。單從教育方面來講，無論是家庭教育或學校教育，乃至社會人心的觀念，都以西方文化教育思想中「愛」的教育爲重心。儘管有人作調和論者，獨如運用八卦的「納甲」方式，解釋「愛」與孔子所說的「仁」是同樣的意義。但言「仁」者自論其「仁」，主張「愛」者還自講其「愛」。「上帝愛世人」和「我愛你」、「父母愛子女」、「師長愛學生」，一片模糊，統統進入混淆不清、「一以貫之」的籠統觀念。其實，這許多「愛」的概念，各有各的範疇，各有各的內涵，各有各的心理作用。唯有真能知「仁」的智者，纔可「知其方」矣。無論在美國、在歐洲，父母對子女的「愛」的教育，自有他的文化思想的習慣和範圍，並非一味的「溺愛」。他以「愛」爲中心，培養後一代各自獨立奮鬥的精神。並不像我們「拿到雞毛當令箭」，因此而產生新式家庭教育，一味地變成「溺愛」和「亂愛」爲能事。這是作爲現代中國家庭主體的父母們，必須重新檢討的地方。

與此相對的，作爲現代子女的中國青少年們，對於固有傳統的「孝道」，必須瞭解它便是「愛」的延伸，和「愛」的反應。因爲大家只從表面去看西方的文化，只看見他們做父母的對子女盡心盡力地付出「愛」，並沒有像中國人一樣抱着「養兒防老，積穀防饑」的心理和目的。所以他們的老年父母，老無所歸，「不亡以待盡」地伶仃彳亍以等死的情景，觸目皆是。其實，這是西方文化制度和社會習慣上的最大漏洞，並非是西方人在根本的人性上就缺乏「孝」心、缺乏「愛」父母之心。據我所知以及所接觸到的歐、美人士，當然包括青年人，他們思念父母之情，絕不亞於東方的「孝」心。他們在談話中，也時常流露出思歸與惦念父母家人的情懷。最近有一位法國學生，回國以後來信向我訴說，因爲老年父母有意見，鬧離婚，使他內心有無比的痛苦，他因此而生了嚴重的腸胃病。誰說在西方文化的教育之下，便缺乏了「孝心」？只能說他們缺乏了「孝道」的具體精神和制度而已。

由此可知「孝」便是「愛」的延伸，也便是「愛」的反應。誠然，過去有些孔家店的店員——後世的儒者們，錯解「孝道」，強調「孝道」的理論，將「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認爲是千古不移的定律。其實，早在周、秦以前的思想，在《易經》的「蠱卦」中，便已隱約指出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所以「蠱卦」的「爻辭」上，便有「幹父之蠱」、「幹母之蠱」的觀念。但做父母的，雖然被蠱惑而有不是的事，但在子女的立場來說，仍然需要以最大的「愛」心而爲父母斡旋過錯。所以孔子也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但是後世以訛傳訛，或語焉不詳，便把「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觀念，變成了鐵定如律令的誡條。

同時做父母的，更要了解中國文化的「孝道」思想，並非只是單面的要求，它是相互的情愛。「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是必然的因果律。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每句下面那個重複字，都是假借作爲動詞來讀。用現代觀念來說，就是：倘使父母不成其爲父母，或父母沒有盡到做父母之「愛」的責任，只是單方面要求子女來盡「孝」，那也是不合理的。其餘各句的觀念，依此類推，同一道理，當然不必重複細說。

現在我們不厭其煩地反覆討論了傳統觀念中家庭教育思想的概略，既不是否定以「孝道」作中心的家庭教育的價值，也不是接受從「愛」的教育出發的便是真理。現在我們所講的目的，只是說明我們這一代對於家庭思想，與家庭教育方式，大多數都處在東西文化交流撞激的夾縫裏，正在新舊觀念混淆不清的矛盾現象中發生偏差。尤其是一般新式家庭的父母，外受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皮毛影響，對歐、美家庭教育方式一知半解的崇洋心理的作祟，於是將錯就錯地仿照那些外國電影，而將不中不西的洋盤思想，奉爲金科玉律。但在骨子裏，又潛伏着傳統文化思想的血液，「望子成龍」與「光耀門楣」的觀念，並未完全拋卻。於是便造成此時此地，在家庭教育方面，產生了問題兒童和問題青少年的事件。結果，不是怨天，便是尤人。再不然，便埋怨到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錯誤，自己好像置身事外，一無過錯似的。其實，要講我們青少年的思想與心理問題，就必須正本清源地從家庭教育的檢討開始，而不能將一切過錯，都由我們後代的子女去負擔。

# 舊八股與新八股

---亦新亦舊的一代

自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以後，我們從他所修訂的「六經」，和他的遺著中，仰窺三代，俯瞰現在，綜羅上下三千年來教育之目的和精神，一言以蔽之，純粹爲注重人格養成的教育。《禮記》遺篇中的《大學》、《中庸》、《儒行》等，雖然敷陳衍義，但自東周以來，仍然不外如《大學》所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所謂「修身」，用現代語來說，便是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勢必先從心理和思想的基本修正着手，因此《大學》便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一系列程序的述說了。

我們從這個觀念反觀「六經」，歸納它的主旨便可強調地說：

《書經》的精神，是後世政治哲學和政治人格教育的典範。由此再配合孔子所著《春秋》的精神，便成爲政治思想和政治行爲的是非、得失、進退、舉措等有關歷史哲學，與政治人格和政治行爲的成敗事例。

《易經》的精神，從科學（中國古代的科學觀念）的觀察而進入哲學的精微，純粹是潔淨心理、昇華思想的文化教育。由此再配合孔子手編的《詩經》與《樂記》（因《樂經》已失，故只以《樂記》來說），便成爲適用於一般人陶冶性情、調劑身心的教育。

《禮記》所包括《三禮》——《禮記》、《周禮》、《儀禮》的精神，則是彙集中國上古傳統文化的大成，包含教育、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學、藝術、人生等思想的體系。強調地說，它是後世奉爲個人人格教育、政治人格教育等的典範。

但是這些觀念，是從兩漢以迄近代的儒家傳統思想而立論。在歷史的事實上，自春秋、戰國迄於秦、漢之際，五百年間「六經」並未受到重視。尤其在春秋、戰國時代，「智、力、勇、辯」之士，競相以「縱橫捭闔」、兵謀、雜說、陰陽等學術，取悅人主而自求爵祿功名榮顯於當世，並即以此爲天經地義的要務。少數宗奉孔子彙集的經書思想者，只有魯、衛之間的儒生們，如曾子、子思、孟子等人。但是他們仍然需要依附於人君的喜悅而得其苟安的生活，否則，依然不能榮顯當世而暢懷於當時。因此，淒涼寂寞一生，自所難免。

秦漢以後讀書與教育之目的

大家都知道中國歷史上，記載漢高祖平定天下以後的一句最有趣的名言：「乃公（天下）居馬上而得之。」後世都把他引爲笑談，認爲漢高祖沒有受過讀書的教育，因此而輕視知識分子，罵儒生們爲「豎儒」。事實上這個觀念，早已種因於秦並六國以後，自秦始皇、李斯與儒生們（當時的儒生，是包括道家等各種知識分子的統稱）彼此不能合作，即造成學術思想的真空現象，因此我們大可不必如此恥笑漢高祖的不學無術。同時，自漢初接受叔孫通等的制體（定製度）開始，所謂當時的儒生如叔孫通等人，雖然依附漢高祖而攀龍附鳳，等待引用，但對於中國上古傳統文化的經義，並無高深造詣。大家只要研究《史記》、《漢書》中叔孫通等有關傳記，便可明白他們的思想和目的，也止於取悅人主，謀一身爵祿的榮顯，並無什麼傳道授業的大志。他們與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教育精神，以及孔子的學術思想，早已大相逕庭了。

漢初重視儒術，尊崇孔子，事實上是從漢武帝欣賞司馬相如的文章詞賦、重視董仲舒的儒學思想（董學並非純粹的承接孔孟之學）、信任公孫弘的形似儒家之學開始的。於是纔有西漢的重儒尊孔，由此再演繹漸變，就形成東漢儒家「經學」思想的大成。漢儒之學，上面頂着孔子的帽子，內在借題發揮，糅集道、墨、陰陽諸家之所長，外飾儒家爲標榜，從此曲學阿世，大得其勢，後世歷經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間屢有變質，雖然或有以「詞章、義理、記聞」等爲儒林學者的內涵；以「君道、師道、臣道」爲儒家學問的本質。但不管如何說法，總之，必須要以功名爵祿，入仕用世爲目的。孟子說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外，其餘兩種不孝之一，據漢儒趙岐的註解，便是「家貧親老，不爲祿仕。」換言之，讀書除了作官以外，就不能謀生，既不能謀生養親，當然就罪莫大焉。這與現在「教育即生活」，生活以賺大錢爲最有出息的新觀念，除了形式與方法有不同以外，它的本質，究竟又有什麼兩樣？

漢唐的「選舉」、「考試」制度

自周、秦以後，讀書受教育之目的，概略已如上述。而朝廷量才任用的方法，除了上古時代，因爲教育尚未發達，以學問德行爲選士入仕的成規以外，到了戰國時期，因爲學術思想的勃興，而諸侯各國，稱王稱霸，又需要起用有學術思想的人才，因此便造成戰國末期六國「義士」儲備人才的風氣，自漢初統一天下以後，國家安定，政治上了軌道，「義士」的風氣沒有了，但是有思想、有學識的人並不因爲政治社會的安定便沒有了，因此纔開創出以品行德學爲標準的「選舉」制度，推薦地方上「賢良方正」之土，進爲國家用人取士的體制。漢初的「選舉」制度，的確是法良意美，但是世界上一切良法美政，實行久了，流弊就出來了，所謂「法久弊深」與「法嚴弊深」，都是中外千古不易的名言。所以到了漢代末期，便有世家門第等把持「選舉」，徇私薦賢，於是這就成爲知識分子掀起社會亂源的重要原因。由此在中國的歷史上，相繼紊亂了三百年左右，歷魏、晉、南北朝之間，讀書有學問的知識分子又需靠類似「義士」薦賢等方式而顯揚功名於當世。一直到了隋、唐之際，唐太宗承襲隋朝取士方式，創立了考試製度以後，才得意地說出：「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豪語。從此，考試取士的方法，便演變而成爲宋、元、明、清的科舉考試製度。於是「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知」等功成名遂的顛倒夢想，便深植人心，永爲世法了。到了清代末期，以八股制義的「考試」取士制度，流弊叢生，而教育思想也陳腐朽敗，因此才引起清末有學問、有思想知識分子的不滿，配合民族革命的主張，就結束了三百年來的滿清王朝，也由此而推翻了二千多年來舊傳統的教育方式。

順手附錄近日看到《金史》的資料，以便窺見過去歷史中，教育思想由《考試》取士所產生弊病的一斑。明、清後期的情形，大致也與此相同，尤其清末以「八股文」取士的毛病，「考場」陋習與笑料，見於近代史者，隨處皆是，不必多說。《歸潛志》雲：

金取士以詞賦爲重，故士人往往不暇習爲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故學者止工於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間有登第後始讀書爲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爲古學，以著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爲科舉之學者，疾之爲仇讎。若分爲兩途，互相詆譏。其作詩文者，目舉子爲科舉之學；爲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爲任子弟，笑其不工科舉。殊不知國家勒設科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史鑑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爲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狃於習俗，止力爲律賦，至於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於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雲：「泰和間，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但數字數與塗注之寡多。」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爲有司，文風始振，然而謗議紛起矣。

新舊教育亟待修正的八股學風

大致瞭解了上下三千年來教育的概況，和「考試」取士的情形，無論我們的先聖先賢、諸子百家的名言，關於教育與學問的教誡，作過如何莊嚴神聖的定論，但教育的理想與一般社會對教育的「暗盤」思想，畢竟存在一段很大的距離。如果我們真肯深切地反省檢討，那麼，就可以明白地說，我們的一般教育思想，歷經二千多年來，始終還陷落在一個一貫錯誤的「暗盤」裏打轉。這個「暗盤」思想錯誤觀唸的由來，首先便是自古以來中外一例的「重男輕女」思想。爲什麼要「重男輕女」呢？因爲男主外，女主內。男兒志在四方，「有子克家」，便可以「光耀門楣」、「光宗耀祖」。而光耀門楣和光宗耀祖的方法，就只有讀書是最好的出路。尤其在古代輕視工商業的觀念之下，當然就會產生「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看法了！讀書爲什麼有這些好處呢？因爲讀了書，可以考取功名，登科及第而作官。因此「讀書作官」自然而然就成爲一般社會天經地義的思想。作官又有什麼好呢？因爲作了官，就能得到坐食國家俸祿的利益。由此「升官發財」便順理成章地被民間視爲當然的道理。由於這一系列錯誤觀唸的養成，讀書讀到後來，所有經、史、子、集，也成剩餘的物質，只有「八股」的制義文章，纔是生活的寶典，這都是很自然而形成的思想，無足爲怪。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之初，西方的文化思想東來，慢慢地把舊有「家塾」、「寒窗」、「書院」和「國子監」等中國傳統教育的方式變了，變成了西方式的學府制度。由「洋學堂」的稱呼開始，一直到了現在三級制的學校制度而至於研究院等爲止。教育是真的普及了，一般國民的知識水準是真的提高了。但是知識的普及，使得一切學問的真正精神垮了，尤其是中國文化和東西文化的精義所在，幾乎是完全陷入貧病不堪救藥的境地。不但如此，我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雖然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而換舊更新，可是我們教育的「暗盤」思想，依然落在二千多年來的一貫觀念之中，只不過把以往「讀書作官」、「光耀門楣」的思想，稍微變了一點方向，轉向於求學就可以賺錢發財的觀念而已。然後引用一句門面話來自我遮蓋這個觀念，而以「教育即生活」，作爲正面堂皇的文章，幾家父母潛意識中，對子女的升學大事不受這個觀唸的作祟？又有幾家子弟選讀學校、選修科系的心理，不爲這個觀念所左右？於是，新的「科學八股」的考試方法，但憑「死記」、「背誦」爲學問的作風，依然猶如以往歷史的陳跡，只是過去的風氣，但須記誦八股文章，作爲考試的本錢；現在的風氣，但須記誦問答和猜題，便能贏得好學校以及聯考的光榮。過去的讀書爲考功名、爲作官；現在的讀書和考試，爲求出路、爲求職業、爲賺大錢。過去讀書的，「志在聖賢」；作官的，一心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如此立志，也大有人在。否則，就抱着「君子乘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蘽以行。」歸到農村社會，以耕讀終生的也不少。現在則受了教育以後，不能謀得一個出洋、賺大錢的機會，至少也要作個公教人員，纔算是不負平生一片讀書求學的苦心。尤其是工商業時代都市生活的誘惑，小市民思想的深入人心，如果不能如此，只好優遊等待機會，或者自己封個「馬路巡閱使」來怠蕩怠蕩也可以。至於其他的事，只有付之於命運的安排了。

我們只要息心反省教育的現狀，就可明白現代青少年陷落在一片迷惘境地的前因和後果。因此，我們爲了後一代，對於家庭教育思想、社會教育思想，以及學校教育的思想制度，必須要多作檢討，以建立一番復興文化的新氣象。雖然說問題並不簡單，但問題終須尋求出答案和調整的方法。這不但是我們老一輩的責任，也正是落在現代青年身上的重要責任，極須淵博通達的學問，才能挽救亟待復興圖強的中國文化。

# 從處變自強說起

---亦新亦舊的一代

這一代的後起之秀，缺乏歷史文化精神的學養，更沒有遭逢歷史變故的經驗，因此而沒有定力和遠見。可喜的是，他們已經從時代環境的驕寵和頹唐中振奮起來，走上自覺更新的道路。但是慷慨赴義易，從容適變難。因爲激於一時的氣憤，慷慨赴義，猶如莊子所說的「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至於從容適變，必須厚積風力，然後「培風」而起飛，才能轉危爲安，措天下於衽席之上，救亡圖強，在於才智，而才智的養成，需要深厚的學術與精微思想的「風力」。我們基於「溫故而知新」、「鑑往而知來」的觀念，需要將近代和現在有關救亡圖強等學術思想的演變史，作一溯往的啓導，使大家由此而窺見它錯綜複雜的前因與後果，知道應當如何去振興奮發。

救亡圖強的思想與歷史

從歷史哲學的立場來看，人類真是可憐的一羣，雖然累積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多少人的才智與能力，如何如何地爲某一地、某一國，甚之全世界的和平康樂，竭盡心力去努力。但是人類的歷史，始終還是在擾攘和變亂之中，好像除了擾攘變亂以外，便無歷史的內容似的。可是，也正因爲如此，纔不斷地產生了東方的聖人、西方的哲人，隨時隨地，在種種艱困的環境中，爲人類、爲國家、爲民族而尋求學術思想的方案。地不分南北，人不論東西，大致都不外於此例。

我們現在從明末清初近三百年來的學術思想，舉其犖犖大者來講，便可知道我們近代和現代的學術思想，一直沒有離開爲救亡圖強與國計民生的大計之關係。在明代末期，作爲中國文化主流之一的儒家理學的學術思想，隨着歷史的演變，和滿清的入關，就強烈地促發爲國家民族救亡圖強而產生的革新思潮。再由十九世紀末期而到現階段，時移世易，雖然是處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撞激的時期，但無論新的思想和舊的學術，仍然都是爲救亡圖強而努力。即如現代青年思想的矛盾，與情緒煩悶的情況，從大的方向來說，也都與此有關，並不例外。

明清之間的諸大儒

自明末清初來講，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大儒，便有黃梨洲、顧亭林、顏習齋、李二曲、王船山等人。他們都身受國破家亡的痛苦，鑑於明末學術思想的頹喪，和朝野社會風氣的腐敗，深切地體會到救亡圖強與國計民生等根本大計，必須以重振學術思想、敦正人心，爲第一要務。因此他們的學術思想，似乎都是一循舊貫，爲辨別發明宋、明儒家理學某些思想的觀念。但在實質上，都爲鼓吹民族正義、反清復明而努力，以爲經世之學的闡揚。可是清初的帝王，如康熙、雍正、乾隆父子三代，都是不世的英才，他們也深知這個道理，因此極力注重文事與武功的作爲上，竭盡所能地吸收清初諸儒學術思想的精華，作爲勵精圖治的張本。孟子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明、清之際諸大儒的千秋事業，恰恰遭逢康熙三代父子的時勢，就被他們所吸收利用而成爲一代的事功。其中顧亭林與王船山二人的學術思想，卻一直籠罩了三百年而影響到六十年代的現世。此中的前因後果，牽涉太廣，所以暫略而不談。

乾嘉以後與龔定盦思想的關係

到了乾（隆）、嘉（慶）以後，清廷統治的事功，已非康熙父子三代的全盛情形，時代刺激了青年，便有龔自珍（定盦）的學術思想，應時而起。龔定盦與金聖嘆、王仲瞿，都是清代的怪人。但龔的才智，又遠非金聖嘆、王仲瞿可比。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影響道（光）、鹹（豐）以後而到民國初年。同（治）、光（緒）以來，康有爲、譚嗣同、梁啓超等的學術思想，大致說來，雖有時代觀唸的不同，但都是承受龔定盦的影響而啓發其新知。龔定盦著作的《平均篇》與《乙丙之際塾議》等，關於救亡圖強思想的影響，更爲有力。至於鹹（豐）、同（治）之間曾國藩的學術，是靠他的事功陪襯出理學的思想，又另當別論。

有關現代的學術思想

到了清末民初之際，我們的歷史時代，又遭遇一個新的鉅變，而西方文化的東來，是激起歷史鉅變最爲有力的因素。因此，融合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爲救亡圖強而努力的風氣，也隨世變而波瀾壯闊。其中影響最大而見之於締造中華民國的事功者，當然是首推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但是追溯學術思想的演變史實，和到達現在情況的前因後果，那麼，便須對於有關這一時代的多方關係，稍加列述，可使青年同學們，略知梗概。

（一）距今三十年前的

甲：有關救亡圖強的學術思想，影響三十年前的朝野社會最爲有力的，便有：康有爲（《大同書》、《禮運注敘》、《上清帝第二書》等）、梁啓超（《飲冰室文集》等）、譚嗣同（《仁學》等篇）、張之洞（《勸學》等篇）、嚴復（譯《天演論》及其自序、《原強》、《闢韓》等篇）等人。

乙：有關純粹思想，影響學術思想界最有力量的，便有：楊仁山（佛學）、歐陽竟無（佛學）、馬一浮（儒學、佛學）、熊十力（佛學、儒學）等人。

丙：介乎經世實用與學術之間，亦足影響的，便有：章太炎、劉師培、梁漱溟等人。

丁：有關文學藝術，影響三十年前新舊社會之間，而風靡一時的，便有：樊樊山、陳三立、易順鼎、蘇曼殊、弘一上人（李叔同）、林琴南（意譯西洋小說）、辜鴻銘、王國維，以及南社諸人與溥儒、齊白石等人。

（二）屬於近四十年的

甲：有關學術思想，立意爲救亡圖強而努力的，便有：胡適、張君勱、顧頡剛、馬敘倫、馬寅初、馮友蘭、柳詒徵等人。

乙：有關純粹思想，亦足以影響學術思想界的，便有：謝無量（佛學文學）、湯用彤（佛學）、蔣維喬（佛學）等人。

此外，有關正派或反派的學術思想，也和以上所列舉的一樣。其中又有正中偏與偏中正之分，而且都能影響三十年前的時代思想的，還有許多人物，一時記憶不詳，礙難一一具列。至於介乎學術與政治之間，雖然名重當時，而如煙雲過眼、曇花一現的，又當別論。

至於有關自然科學的新知方面，除了詹天佑以外，其餘都無藉藉之名，亦少見其有創見的發明者，如沒有人即起編列史料，則恐此類「名湮沒不彰」，亦勢所難免。

丙：三民主義的學術思想：是以三民主義以次的體系學說而言，一概見於國民黨黨史的，自有專著，不在本題範圍之內。

丁：共產主義的學術思想：是指接受或譯述西方文化中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力足以影響三十年前的思想和社會。包括前期的左派文人的著作和思想。此輩中人，便有：陳獨秀、陳啓、馬哲民、侯外廬、陳望道、施存統、張聞天、羅隆基、陳禹、周作人、周樹人（魯迅）、沈雁冰、鬱達夫、李芾甘（巴金）、萬家寶（曹禺）等人。

戊：有關文學與小說的寫作，風行一時，亦足以影響人心的，便有：朱自清、徐志摩、舒舍予（老舍）、張恨水等人。我們簡略地追溯過去六、七十年來有關救亡圖強的學術思想與人物，雖然在時間上只有短短的幾十年，有如一瞬；專搞學術思想而有影響的人物，也只有幾十位，人數不太多，但是他們的思想，卻已影響了上一輩的青年約達六十年之久。雖然在今天的青年心目中，因爲學力的不足，思想的散漫，並不佔有太重要的地位，但仍然還有他們精神上的影響，只是在歷史的事實上，卻似成爲過去，正如清儒趙翼所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情形，我們可以由此而知在這六十年之間，這些著名學人的學術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如我們的現實歷史一樣，都爲國家民族的救亡圖強而努力，各自發揮他的一得之見，構成一家之言，成爲文化歷史的精神資料。

萬木無聲知雨來的思想界

根據以上所講這一世紀中，我們七十年來學術思想的大勢，便知我們的上一代，生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青年，爲國家、爲民族、爲世界人類，腦子裏裝滿了這許許多多古今中外的異同思想，已有不勝矛盾之感。而同時又遭遇到史無前例的抗日戰爭，在心理和感情上，又加上無比悲憤，和無比痛苦的負擔。我們如果拿文學的境界來做比喻，可以說三、四十年前的知識青年們，大有「江山起伏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的感慨。而我們現在這一代的安定，卻有「萬木無聲知雨來」的境況。

現在我們的教育，愈來愈普及，知識的範圍也愈來愈普遍，實非前三十年可比。但是我們青少年們的學術思想，以及「見義勇爲」、挺身而起「救亡圖強」的精神和心理，卻遠不及上一輩的老少年們。因爲我們模仿物質文明的進步，促使求安於現實生活的享受逸樂之中，已經心無旁騖。窮追工商業的發達，以爭取經濟的富裕，在寶貴而緊張的時間潮流中，更無餘力去好學深思。因此養成社會風氣，盲目地重視自然科學的技能，對於人文思想的研究，幾乎視爲是奢侈、浪費。大家卻沒有看到未來世界的局勢，由於自然科學畸形的發達而更發達，進步而更進步的後果，它將會促成人文文化的「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的悲慘局面。

我們要想努力爲國家、爲世界追求新的思想的前途，首先就必須要了解現代世界局勢的戰爭，歸根究底，它是一個文化思想的戰爭。無論是西方或東方；無論是工商業進步或落後的地區，總而言之，仍如過去歷史一樣，依然爲了物質的現實生活，與精神的出路而困擾。換言之，就是爲人類經濟生活的平均與分配問題，以及人們心理的安詳與精神的歸宿問題而煩惱。因此我們現代的知識青年，讀書求學，除了爲學習基本的謀生技能，以及爲救亡圖強以外，現在和未來，便有兩大課題，急需產生新的千秋人物來完成繳卷的：

一、是如何爲全人類着想，建立新的經濟哲學思想。

二、是如何溝通精神與物質文明的綜合科學的思想。

同時，更需要了解，這種屬於人文思想的事業，是一個人的千秋事業，需要好學深思，由博返約去努力。絕不是急功好利，只圖一時之快的工作。也許這與現實的環境有一大段很長的距離，但是「功名畢竟屬書生」。拿這句話來針對這種從事人文文化學術思想的千秋大業而言，應該可以令人深省。如果只圖目前個人的出路與個人現實生活的需要，歷史上有無數當前的榮耀，也都成爲過去了。以眼前的現實，換取永遠的現實；以個人的生命，換取歷史的生命。這在現代青少年的觀念中，實在需要有重新的估價。我們不能讓六十年後的學術思想史上，留下一頁真空的白紙，貽笑於後人。

# 六十年來教育的變和惑

---亦新亦舊的一代

教育乃國家命脈和民族精神之所繫。我們的教育，在本世紀六十年來，從舊式的傳統，幾經變革而到現在。但是我們還得承認我們現在的教育思想與教育制度，雖然形似進步，仍然存有太多的困擾與矛盾。因此促使青少年們在現行的教育方式之下，產生了許多心理的反抗與思想的迷惘。有關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從新舊教育的實際變相中，尋求前因和後果，才能知所先後，深思反省而莊敬自強起來；否則，又會本末倒置，變成一個「不知所云」的結論。

由舊式的「家塾」到新式的學校

距今五、六十年以前，我們的教育，實在不普及，雖然自宋代以後，各省地方便有公立和私立「書院」存在，但是那是高級學府，相當於現行教育制度中所包括的中學（初中和高中）到大學的性質。主持「書院」的老師又稱爲「山長」，他是一人包辦的責任式之導師制。學生的來源，是絕對的自由從師，並非政府命令的規定。教學的內容，也有爲專趕科場（考試功名）而研讀「制義」——考試用的八股文的時文，等於現在的補習班。也有爲研究經學而講論心性的理學，或者兼帶文章的講習。然而能夠讀得起「書院」的學生，都是已經學有底子，或者已有功名在身的人。而且雖然是家境清貧，但總能設法弄到聊足溫飽而專攻苦讀。至於一般自幼年開始，如何到「家塾」去發矇入學，以及在「家塾」讀書的情形，需要略作簡介，俾知變革中新舊教育的得失，有一比較。同時也爲使將來研究教育的青年同學們稍微知道一些舊式教育的實際資料。

家塾教育的回顧

我們的傳統，遵照《禮記》的精神，童子六歲入小學，每個人到了六歲以上，便應該開始讀書識字，但是在過去農業社會的鄉村或城市中，國民經濟與風俗習慣，並不能做到人人都在六歲的時候，便可讀書受教育。第一，並無公家設立的學校，全靠大家湊足人數和財力，專請一位老師設立一個「蒙館」——等於現在的小學和幼稚園的「家塾」，真不容易辦。第二，一般鄉村情形，並不都像孟子說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事實上，卻是「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老弱轉乎溝洫，壯者散而之四方」。這便是滿清末代的大體現象。所以農村子弟，至於比較生活安定的，也大都是「兒童未解供耕織，也旁桑陰學種瓜」。讀書、考功名、做官，那是某一些人專有的職業，一般人們，好像本來就不存非分之想似的。

如果有了適當的「家塾」，一個子弟開始進入學館去「啓蒙」求學時，那真如辦一件相當慎重的大事似的。當然那時只限於男孩而言，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少之又少，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事。稍能注重子弟入學的家庭，在開始上學的一天，便先要他跪拜了祖宗的靈位，揹着書包，由大人陪送他去入學。到了「學塾」裏，先要跪拜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聖像或神位以後，然後再拜老師。安好桌位，才由老師慢慢地開始教授讀書和寫字。距今三十年前，我們對於老師，都是尊稱爲「先生」，或者在先生之上，加上一個姓氏。至少，我是從來沒有聽到過稱教學的「先生」叫老師的。一般學生抑或學手工藝的學徒，都稱老師叫「師傅」。只有民間社會，對一般工匠叫「老司」或「老師」。我所知道在江南一帶，大致相同。現在時代的風氣變了，在這二、三十年來，叫「老師」做「先生」的，卻認爲是不禮貌。由此可知是非禮義的標準，完全是因時因地的人爲而定，哪裏會有一仍不變的絕對規範呢？

家塾中的讀書

當時在「家塾」中發矇的學生，讀的是什麼書呢？大致約分兩種情形：

如果是以讀書考功名的，一開始，就很可能是讀《論語》，其次《孟子》，其次《中庸》，其次《大學》。由六歲到九歲之間，關於以上所列的四書，必須要背誦得滾瓜爛熟，以備應考「童子試」的初步考試。至於《幼學瓊林》、《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也是應讀的課外讀物，而且都須要背誦熟練，以備不時之需。當時讀書注重「背誦」，所以便養成讀書人「朗誦」的工夫和本領，有腔有調，合板合拍，等於唱戲或唱歌一樣的有趣。至於書本，像《啓蒙》學生所用的二十篇《論語》等，雖然都是木板墨印，但是都有一篇一篇的散賣的薄本，即使撕爛了或墨塗壞了，還可以再買一篇回來。

如果只以讀書認字爲目的，一開始，便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增廣昔時賢文》等等，各隨所便，並不是規定一律。

因此，有些學生多的「家塾」，每天早上，老師各個分別的圈點教讀了每個不同的書本以後，不管你懂不懂得意義，便由學生們自己去唸讀「背誦」，之乎者也，鬨堂叫讀，不亦樂乎。從前有人描述「家塾」的散漫情形，便作過一首打油詩，記述當時的實況，如雲：

一陣烏鴉噪晚風。諸生齊放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百家姓》）。天地玄黃宇宙洪（《千字文》）。《三字經》完翻《鑑略》（《通監史略》）。《千家詩》畢念《神童》（《神童詩》）。其中有個聰明者，一日三行讀《大》（《大學》）《中》（《中庸》）。

至於吟詩作對，那是「發矇」兩三年後的必修功課。開始先學對對，初由一字一對，再慢慢地到達長篇長對。因此，李笠翁所著的《對韻》：「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芎。雷隱隱。霧濛濛。日下對天中。風高秋月白。雨霽晚霞紅。牛女二星河左右。參商兩曜鬥西東。十月邊塞，颯颯寒霜驚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漁翁。」等，便是當時學習韻對的範本。到了《四書》讀完，大約十幾歲的年齡，學會作詩，那是並不太難的事。至於是否能夠作得好詩，卻是另一問題。總之，當時把吟詩作對與讀書作文章，完全連在一起，因爲從童子試的「考童生」開始，作詩是必須的一手絕活，等於現在考試中的英文，非要你學會不可。我們當時在十二、三歲便會作詩，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後來我碰到很多位前清遺老，所謂「秀才」與「舉人」的老先生們，到老仍然作不出真有才氣的詩，那也是司空見慣的常事。這正如趙翼所說：「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一點不錯。

寫字的「啓蒙」

講到「啓蒙」時期的寫字，更爲有趣。起初開始練習寫字，便要「描紅」。那是在一張白紙上印好紅字，用毛筆蘸墨去填寫。一個六、七歲的小學生，連拿毛筆是怎樣的拿，都不清楚，馬上就要「描紅」寫字，真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於是老師和大人們，往往便爲你「把筆」練習（用自己的手握在學生的手上，幫他寫字），那時開始「描紅」的紙上，所寫的紅字並不太好，但是卻是具有傳統文化的歷史權威的一首詞句，從宋代開始，便一直爲「啓蒙」入學時期的小學生們所應用，它的內容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這首意義似通非通的詞句，將近千年以來，應用得非常廣泛。距今四十年前，我碰到一位學道術的人，他會畫符唸咒，大家都說他神通廣大，法術無邊。後來我和他接近以後，才知道他出賣的風雲雷雨，完全靠一個很有效驗的咒子。你說那是什麼咒呢？原來他翻覆所念的，便是這首《上大人》。也等於另有一派專門替人畫符唸咒治病的術士，他們口中唸唸有詞的，便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首一章，你說可笑不可笑。

學寫字，先「描紅」，還不錯。有的窮苦學生，連「描紅」的《上大人》也買不起，只用一塊木板，漆成黑白兩面，用毛筆蘸墨在白色的一面上學寫字。等到老師看不見時，便用一堆墨倒在白板上，用嘴吹它一口氣，再來用指頭東抹西畫一番，便會變出一幅很有趣的畫面，山水人物、蟲魚花鳥都有。所以我常常想到當時那些小同學的影像畫，真夠前進，也真夠「抽象」，如果拿到現在來，一定是最時髦的作品。但是我們當時在「家塾」裏的同學們，卻並不時髦，因爲大家書包裏，都帶着毛筆、墨、硯臺和書本，在「家塾」裏讀了一天的書，東畫西畫，每個人的手上、臉上、嘴上，都塗抹得一塌糊塗，都自勾成一個像京戲裏丑角的面孔。

塾師和家塾

講到「家塾」，我們顧名思義，一定都設在某一個人的家裏囉？其實，並不盡然，除了殷實的富戶人家，或者世代書香之後，可以有空房子，專門設立「家塾」，供子弟們讀書以外，大多數的農村社會，都做不到有這樣好的教育環境。所以多數的「家塾」，多半設立在某某宗祠的「祠堂」或寺廟裏。因爲這些地方，比較清靜寬廣，學生們還有活動的餘地，盪鞦韆、踢毽子、疊羅漢、打小小的羣架，那也是常有的事。但在偏僻地方的三家村裏的「家塾」，情形又當別論。在此，我要聲明，爲什麼一直要稱它作「家塾」，卻不用「私塾」的名稱呢？因爲「私塾」是在民國成立以後，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對於過去私家設立的「家塾」，依法稱它爲「私塾」。事實上，在六十年前後的「家塾」，並無所謂公立或私立的嚴格差別。

至於擔任「家塾」裏教書的老師，說來真有無限的感慨。同時，也可因此而爲古今中外從事教學的先生們同下一掬傷心而淒涼的淚水。大概我們都知道過去私家教學的風格和習慣，凡是講到家裏教書先生的代名詞，叫做「西席」。老師們稱呼主人的雅號，叫做「東主」或「東翁」。除了一般已經有了初步功名成就的子弟，再請一位有學問或有功名的「西席」先生來家專門教讀以外。其他一般「家塾」所請的老師，不是落第的書生，便是窮而無奈的酸丁。表面上雖然表示尊敬，實際上，並不受一般社會所重視。他們生活的刻苦，以及報酬待遇的菲薄，真是不堪想象。那時，並非以月薪計算報酬，只是以年節計算實物，或者加上當時極其少數的貨幣（銀兩或銀洋），一年辛苦所得，也僅得溫飽而已。至於以此養家活口，那就苦不堪言了。所謂「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貧無奈做先生」的感慨，都是這種情況中所產生的悲哀。可是話說回來，碰到有些「冬烘」迂腐的學究，實在也會使人覺得「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可厭。凡事總有正反不同的兩面道理，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大體說來。當時多數的教書先生們，一言以蔽之，都在「清苦」中度過他的一生。所以清代的名士鄭板橋（燮），在他沒有考取功名以前，也曾經做過教書先生，他便寫過一首足爲千秋後世同聲一嘆的名詩，如雲：

教讀原來是下流，傍人門戶過春秋。半飢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仇。而今幸作青雲客，遮卻當年一半羞。

又相傳光緒時，有李森廬者，以教讀爲業，某年歲除，不能歸，作詩寄其妻雲：「今年館事太清平，新舊生徒只數人。寄語賢妻休盼望，想錢還帳莫勞神。」「我命從來實可憐，一雙赤手硯爲田。今年恰似逢乾旱，只半收成莫怨天。」現在教書先生的情形，雖然沒有完全像這樣的慘痛，但是以「舌耕」爲務的人，比較一般從事有關工商職業的，在物質生活的享樂上，到底還有很大的差距。過去是「一席青氈」，罰坐在冷板凳上。現在是一張聘約，罰站在冷櫃檯。況且一校一系一派，無形中各自形成圈圈，清儒童二樹所謂：「左圈右圈圈不了，不知圈了有多少？而今跳出圈圈外，恐被圈圈圈到老。」古今中外，同此一例，這也正是人類思想和心理的一個重大問題。

# 七十年前八股文的思想與教育

---亦新亦舊的一代

講到中國六十年前讀書受教育的事，除了爲讀書做官而「考功名」以外，有人又把中國過去兩千多年來學術文化的範圍，歸納爲「記聞」、「詞章」、「義理」三大類。如果從這一觀念出發，我們也可以強調說：兩漢以來的「傳經之學」，大體上是屬於「記聞」之類；隋、唐的文章華麗，是屬於「詞章」之學；宋、明以還，特別偏重「義理」之學。雖然如此，但在六十年前的「家塾」教育中，無論「義理」、「詞章」，都談不上，充其量，只能說是教導「記誦」而已。有關人格養成的「德育」，也便在這種「記誦」之學的情形中潛移默化，種下了牢不可拔的種子。當然囉！這種「記誦」教育的方法，以現代教育眼光看來，完全是「注入式」的死讀死記的方法，毫無啓發才智的教育意義。甚之，是把人的頭腦填成「書呆子」式的笨辦法。但從事實來說，並不盡然。當時的時代情況和社會環境，並不如現在的繁華和複雜。所以讀書受教育方面，科類項目也當然不像現在那麼多。當時所「記誦」的，只是有關「詞章」、「義理」名著的簡篇，而且每天背誦的也不太多。聰明一點的，只要花上一、二小時的時間，就可以背誦出一篇文章。其餘的時間，多半於優遊自在中，任性之所樂，讀書、寫字、吟詩、作對，或者作有限度的嬉遊。雖然並無現代體育教育的設備，可是自由活動，或打拳練武，也被認爲正當之行爲，並不太過管束。當時嚴格執教「記誦」的作用，除了爲「考功名」時所必要以外，在舊教育的理論上，認爲它有一種「反芻」的妙用。因爲從童年腦力健全、思想純潔時開始注入這些經書詩文，雖然當時理解力不夠，但一到了中年，從人生行爲的日用上，和人事物理的經歷體驗上，便可發生如牛喫草的「反芻」作用，重新細嚼，自然而然便有營養補益的用處了。即如我們在這一代中，六、七十年來的老少年們，對國家、民族、社會有所貢獻的，也都是從這種教育方式開始，經過新舊教育的變革中所培養出來的人物。至於完全由新式教育所產生的後起之秀，對於將來歷史的交代，那是以後的事，目前還無法來下定論。

由家塾教育的啓蒙到書院

「家塾」的讀書受教育，爲時並不太久。聰明一點，大約讀了八、九年書以後，「四書」全熟了，應試的八股文也學會了，就可準備應付鄉試考「秀才」。考取了秀才再準備會試考「舉人」，這時已到了青年的時代了。但當時在二十多歲中，「舉人」，所謂少年騰達的，也並不太多。從「舉人」再進而考取「進士」的，大多數都是三、四十歲之間的事了。五、六十年以前，現代的教育制度建立以後，還有人把高等小學（相等於現行的國民小學）畢業的學生，當作「秀才」看待；中學生等於「舉人」；大學生等於「進士」。至於研究院中的博士，就把他比作「翰林院」中的翰林學士了。滿清末代，自戊戌維新前後，有些派到外國去學科學的學生回來，還特意爲他們設立了「同進士」出身的洋「進士」頭銜哩！

至於由「家塾」讀書開始，或者「十年窗下無人問」的努力自修之後，是不是一定要讀「書院」呢？那是另一問題，因爲當時的「書院」，雖然有些是公立的，但並無明文規定讀書必要進「書院」才能取得考試的資格。而且公設或私立的「書院」有的注重「經學」，有的屬於一般性的從師受讀，或者專爲進修時文「制藝」、學習八股文章而準備考試的，也各任自由。但是滿清末代的「書院」制度，已遠非宋代開始有「書院」時的舊有精神了。

舊式「八股文」

過去讀書受教育，大體簡單的情形，已如上述。我們從現代的觀點，迴轉來再瞭解一下被我們唾棄了六、七十年，同時也左右了中國文化五百多年來的「八股文」，它究竟是怎麼樣的呢？我們除了舉出一些實例以作說明之外，然後需要站在中國文學的立場，再進而研究一下舊「八股」與新的「科學八股」，它在教育制度和方法上的得失利弊了。但在此要鄭重聲明，這並未存在「復古」意識，更不是希望在國文教育中提倡舊「八股」文。在這裏只能說，提起專讀國文的大專同學和一般青少年們的注意，瞭解一下從前的青少年們所作「八股文」的文章技巧，和人格養成的思想教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以資反省檢討而已。

（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秦道然

（破題）聖人不輕於啓發，欲有所待而後施也。（承題）夫夫子固欲盡人而啓發之，而無如不憤不悱何也！欲求啓發者，亦知所省哉！（起講）且學之中，必有無可如何之一候焉。自學者不知，而教者雖有善導之方，往往隔而不入。夫至隔而不入，而始嘆善導之無益也；孰若默而息焉，以俟其無可如何之一候乎！（提句）夫學所謂無可如何者何也？（提比）學者於天下之理，未能盡喻諸心也。而視夫既喻者，又不能不欣慕之也，欣慕之而不得，則憤焉矣。學者於天下之理，未能盡達諸辭也。而視夫既達者，抑不能不遙企之也。遙企之無從，則悱焉矣。（中比）其人而果憤矣乎？將見彷徨於通塞之途，急求之，則已急也。緩求之，則又緩也。欲求諸此而尚恐其或在彼也。當是時，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方無如憤何！而教者則曰：是正其可啓之端，且有欲不啓而不能者也。其人而果悱矣乎？將見遲迴於疑信之交，約指焉而難定其真也。博求焉而不得其似也。已知其然而難知其所以然也。當是時，欲晻晻乎言之，又戛戛乎難之。方無如?乎！而教者則曰：是正其可發之機，且有欲不發而不能也。（後比）而無如其不憤也！本無求啓之誠，旋授之而旋棄之耳！且徒負求啓之名，面折之而面承之耳！非特隱誘無由，即顯示亦無由也，安所施吾啓乎！夫聰明不憤不生，精神不憤不振。吾非不欲啓，而無如不憤何也！不然，吾豈樂於不啓者乎！而無如其不悱也！本無求發之誠，相視不相謀耳。且徒負求發之名，相告不相入耳。非特微言無益，即繁稱亦無益也。安所庸吾發乎！夫意見不悱不化，辯論不悱不親。吾非不欲發，而無如不悱何也。不然，吾豈樂於不發者乎？（結比）且不憤而啓，是終無由憤也。若因不啓而憤，亦事之未可知者也。學者日望吾之啓而自思之，憤乎未也？不悱而發，是終無由悱也。若因不發而悱，亦事之未可料者也。不悱而發，是終無由悱也，若因不發而悱，亦事之未可料者也。學者日望吾之發而自思之，悱乎未也。（結句）憤勿但咎其不啓，不發爲也。

本文作者秦道然，年代、籍貫，難以考證。這是他少年時代的作品，是從清代八股文的彙編《初學度鍼》中摘錄出來。所謂「八股」，便是「破題」、「承題」、「起講」、「提比」等的八個方式。如果瞭解了本文全篇的思想，與現在教育學的原理和教育哲學完全吻合，則不能說只是無病呻吟的考試文字而已。以下所錄的，便是閱者的總評。如說：

此題之理，在欲學者勉於憤悱，以爲受啓發之地。此題之情，在反言以激之；故全神都在四不字，從憤悱轉啓發，正是題理，從不憤不悱轉到不啓不發，正是題情。又從不啓不發，轉到可以使其憤悱，正是題神。神者，兼情理而得之者也。至其就題兩扇，劈分八股，如連環鎖子，骨節相生。不用單句轉接，局法最爲高老。中股後接起，皆有藕斷絲連之妙。每股煞腳，搖曳多姿。股中詮發實義，字字透闢細切。無一字一句，不可效法。允爲初學津樑、發矇妙藥。如諸葛八陣圖，知入而不知出。餘線批已細細指明，萬勿粗心閱過，以爲平平無奇也。文所以明道也，代聖賢立言，而不得其意之所存，炳炳烺烺徒然耳。顧生千百載後，欲道千百載以上人之意，已難，況聖賢微妙之言乎！況初握管而效爲之者乎！故言文於初學最難言也。初學作文，最患將題含糊誦去，不能逐字洗刷。才高者，辜負才情，不顧題理。質鈍者，縛殺筆底，不透題情。是二人者，其失不同，而爲無當於文則一也。夫文之爲道，題而已矣。一題有一題之理，一題有一題之情，得理與情，而思過半矣。顧其端，全在從題字中，層層搜剔而出。反正閉合，輕重抑揚，使其來路至精也，去路極清也。前後倒亂，非題理也。步驟逾越，非題情也。只此一訣，神而明之，知者不易學，愚者不難爲。可以探千百載以上人之意焉，可以代聖賢立言焉，可以明通焉。安得謂初學作文，可不自此始哉！

（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八比正格　 向日貞

節能有守者，臣職克盡矣。夫人臣非才爲難，而節爲難也。臨之而不可奪，殆克守其節者歟！且夫事未至而談節義，在在可以爲忠臣。事既過而論堅貞，人人可以爲志士。然矜言氣節之人，未必真能氣節者，何也？曰：以其非臨事也。蓋臣品之邪正，居恆未可深知，獨危急困頓之時，一生之賢奸莫不分其梗概。學術之真僞，平昔未可遽辨，獨艱難紛集之際，畢生之忠佞，莫不定其權衡。嗟乎！孰是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乎？朝廷養士數百載，豈無責報之一日。及勢至凌夷，而漫無足恃者，功名之士多，節烈之士少也。若人秉忠貞以爲懷，故刃可蹈，鼎可甘，獨此百折不回之意，必不可改。此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者，蓋自匡居坐論時而已決矣。寧於委贄爲臣也而忍負之。吾人讀書數十年，豈無自靖之一念。及時至顛危，而頓易其操者，自家之念重，愛國之念輕也。若人本精白以自將，故家可亡，身可戮，獨此靖共自獻之心，必不可回。此不爲威屈，不爲勢阻者，蓋自草茅誦讀而已定矣。寧於登朝致主也而忍忘之。幸而邦家徐定，則正色以立朝，而上可告無咎於君父，下可告無過於蒼生。即特立之孤忠，自足樹一代人臣之表。不幸而帝命難留，則從容以就義，而精誠可表於天地，志節可昭於日星。即一己之捐驅，亦足酬數世尊賢之報。持此志也，希賢希聖，已爲天壤之全人。勿二勿三，庶幾名教之正士。謂之君子，誰曰不然！

本文是一篇「八股」小品，但它對於人格的養成教育，以及人品和氣節的思想，也並沒有腐敗到那裏去啊！現在再看當時閱讀本文者的評語。如：

「字挾風霜，詞奔雷電，他日立朝，風節於此窺一斑——左筆臣」

「忠貞如鐵石，文信國公之《正氣歌》也——魯木齊」

（三）存慈則忠 單句　 李課雲

以忠課忠，忠固不待於使矣。蓋孝慈即上之忠也。上能如此，民之忠顧待使哉。且上欲民之相見以心，上固善窺民之性情也，而不知民早已窺上之性情。上能爲人子，民自戴之如父。上能爲人父，民自依之如子。此上與下之以性情相見者也，而謂民之忠顧待於使哉。今夫民之不忠者有故矣，非不知元后之猶父母也。然上欲民之視猶父母，曷不念己之尚有父母乎？而胡爲天性之多薄也。非不聞樂只之歌父母也。然上欲民之感同父母，亦曾問己之果能爲父母乎？而胡爲懷保之無聞也。是不能孝也，不能慈也，而第以忠責民乎哉！且夫世亦有能孝而不能慈者，而有說矣。謂取吾儕之衣，以衣其所親。取吾儕之食，以食其所親，是偏私之甚也。而茲則能孝而復能慈也如是，世更有能慈而不能孝者，而民尤有譏矣。謂不能親其所親，何能親其所疏。不能厚其所厚，何能厚其所薄。是無本之施也，而茲則能慈而先能孝也如是，是則無所期於民，而民之寤寐自動也。天下惟是情之容拂耳，上自篤乎義所不容辭。一寢膳之節，而閭巷播爲美談。一撫手之恩，而婦孺感而歌泣。直不啻家人父子之情以相屬也，而誰復自匿其情歟。是則無所迫於民，而民之感通自捷也。天下惟是理之不容誣耳。上自操乎物所不得遁，文告有時違所不忍違者，孝子長吏有時負所不忍負者，慈親更曉於尊君親上之理，不容誣也。而誰復顯悖乎理歟！孝慈則忠，此上與下以性情相見者也，使云乎哉。

評語：

若順從孝慈講到忠字，文勢便平，又局亦不緊。講下倒從不忠跌出孝慈，緊而能醒。詮孝慈處，俱從民心目中看出，則忠字既有根，而所以能忠之故，不煩言而解。凡屬倒綱題，及感應題，皆作如是觀。——次青

我們讀了這些「八股」文以後，便可發現歷史有今古的差別，文章體裁的作法，也有時代的不同。但是青少年們的思想和心理，並沒有因爲歷史時代的不同就有太大的差距啊！只有經過不同的教育方式的薰陶，各自發展成不同的意識形態而已。例如本文對於忠孝養成的觀念，便指出須由「慈愛的教育」作根本，才能培養出忠孝的氣節，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定理。

# 新舊教育的變革

---亦新亦舊的一代

上文講到過去中國的讀書受教育，和考選人才的辦法，以「四書」、「五經」作爲標準，是由宋儒理學興盛之後，自王安石的首倡開始。至於用「八股文」作考試取士的定式，是由明初開其先例。廢止科舉和「八股文」改以「策論」作考選的標準，則自戊戌政變以前，由康有爲、楊深秀的上書力言其弊，而得光緒的同意實施，下詔正式廢止，才結束了歷史上以「八股文」考試的舊帳。但完全停止科舉考試的制度，興辦近代學校教育，則是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以後的事。

從中國教育思想的演變史來講，廢科舉、辦學校並非自光緒末年纔開始。如果要了解這一代六、七十年來教育的演變，以及今後教育的趨向，追溯遠因，應該要從鴉片戰爭以後，太平天國軍興和滿清中興的時期開始探尋，才能找出它的前因後果。換言之，近代中國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開始舉辦學校教育，其初是受實用科學的技術所影響，和軍事上的需要而開此風氣之先。廢「八股」、廢「科舉」，在滿清末代而言，是受到時勢的逼迫，倉卒應變的事。並非如日本明治維新一樣，變則全盤通變，有計劃地變得乾淨利落。

自鴉片戰爭以後，滿清政府迫於洋務的需要，從鹹豐十年（一八六○年）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開始，到了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因總理衙門的請求，爲了翻譯外國語文和熟悉洋務的需要，於京師（北京）設立「同文館」。但是當時「同文館」招收生徒，指定專用正途的科甲人員。除了學習外國語文以外，第二年，又增設學習西洋的天文、算學。可是當時朝野的保守派，對於「同文館」的設置，力持反對的阻力也相當的大。

到了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開始派遣知縣斌椿率領官生赴歐洲各國遊歷。那時所謂的官生，大都從「同文館」出身。在這個時期，由左宗棠發動船政之議，由沈葆楨負責辦理造船工作，有關造船的技術職業教育，已經在半洋半舊的方式下開始了。

再到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張之洞奏議仿照德國制度，設立陸軍及鐵路學堂。二十三年，張之洞又奏設武備學堂。一直到戊戌政變那年，纔開始設立經濟特科，又設立京師大學堂，又詔改各省書院爲學校。不過那時所謂的經濟特科，並非現在狹義的經濟學（Economics），那時所稱的經濟，是舊觀唸的經綸濟世的通才之學。同年五月，又詔廢「八股文」，改「科舉」的考試文章爲「策論」，跟着又詔各省府廳州縣設立學校。再到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才正式頒佈學堂章程。

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再詔停「科舉」，再舉經濟特科，設立學部。三十二年（一九○六年），宣佈教育宗旨。

我們簡略地瞭解了從鹹豐十年（一八六○年）開始，中國接觸了西方文化，逐漸改變固有的教育制度。到現在，已經有了一百年上下的歷史。時代的推移迭相更改，歷史的變革頻仍。由此而看東西文化的交流，以及新舊教育制度的改革演變，對於國家民族的興衰得失，便會產生無限的感慨。

我們現在以「溫故知新」的態度，先把滿清末期（光緒時代）有關變革教育制度的大要史料，重新翻閱一遍，然後再來討論這一代教育與現代青少年的思想和心理問題的關鍵所在，便可「觀今鑑古」而求出它得失利弊的前因後果。

附錄資料

光緒十三年開始，由總理衙門奏定出洋旅遊歷人員章程十四條，是繼同治以後派遣出洋留學考察，輸入西方文化的實施辦法。如雲：

一、每年經費四萬餘兩，以十員或二十員爲額。二、考試人才，以長於記載、敘事有條理者入選。三、量官階高下，酌給薪水。四、準開川資，準帶僕役。五、遊歷年限。六、預支薪水。七、船價車價報銷。八、遊歷地方川資。九、遊歷各地詳細記載。十、各國語言文字科學，審擇學習。十一、遊歷回華，應自明心得及著述。十二、由使臣領事保護照料。十三、各員先後具報啓程。十四、父母老病不願出洋者，準呈明免行。

張之洞初在兩廣總督任內，設立陸師學堂。到了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奏陳練兵改用洋操，設江南自強新軍外，又在十二月，奏設陸軍學堂及鐵路學堂。奏謂：

「自強新軍開辦情形，業已陳奏在案。德國陸軍人員無一不由學堂出身，今欲仿照德制，練成勁旅，非廣設學堂，實力教練，不足以造就將才。光緒十二年間，天津地方，曾設立武備學堂。即臣在兩廣總督任內，亦曾設立陸師學堂，雖學生額數有限，而此次創練新軍，營哨各官，取之兩處學堂出身之人，究視未學者領會較易，長進甚速，是學堂之益，確有明證。查江南省城原設有水師學堂，今於儀鳳門和會街地方，創建陸軍學堂，講舍住屋操場，一例備具。學生以一百五十人爲額，爲馬步炮隊，及工程臺炮各門，約以二年爲期，二年後再令專習炮法一年。三年期滿，分別甲乙，是爲畢業。又鐵路一項，學有專門，與陸軍尤相關係。從前北洋亦經設有鐵路學堂，但人數不多，殊不敷用。今擬另延洋教習三人，招集學生九十人，別爲鐵路專門，附入陸軍學堂，以資通貫。其款項籌撥方法，陸軍學堂開辦四萬數千兩，在籌防局動款撥用。至常年經費四萬餘兩，又鐵路學堂經費二萬數千兩，即在山海關新認加解每年四萬兩，鎮江關新認加解每年七千兩項內動支，更勸募商捐以定之。

疏入報可。

這就是我們在上面所說，中國歷史上教育的改制，開始仿照西方文化的教育制度興辦學校，是爲了實用技術和軍事上所需要的史料之一。

跟着而來的，便是光緒二十二年，始設官書局，任命孫家鼐管理大臣，積極接受西方文化洗禮的事：

先是光緒初，日割琉球，法割安南，英割緬甸，列強競爭，外患日迫。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舊政之不良，潛思改革者。一八八八年，英美宣教士及領事等，創辦廣學會於上海，有志之士，相與譯新書，講新學，排外自大之氣爲之一變。及甲午戰起，粵人康有爲等，復繼廣學會設強學會於上海，尚書孫家鼐、鄂督張之洞等，均贊助之。於是京師官紳，相與設強學書局翻譯新書，講求時務。嗣經御史楊崇伊，奏請封禁。至是御史胡孚宸復奏請將強學書局，改歸官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因奏請改設強學書局爲官書局。

奉旨允准，並特派孫家鼐爲管理大臣。

同年七月，又由工部尚書孫家鼐奏請開辦京師大學堂。先是大學士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以勵人材，京師宜建立大學堂等語。朝命飭下管理官書局大臣孫家鼐，察度情形，妥籌辦理。至是孫家鼐奏陳六事：

一、宗旨宜先定：以中學爲主，西學爲輔，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二、學堂宜建造：講堂學舍，必爽愷宜人。儀器圖書，須庋藏合度。

三、學問宜分科：擬分立十科：甲、天學，算學附焉。乙，地學，礦學附焉。丙、道學，各教源流附焉。丁、政學，西國政治及律例附焉。戊、文學，各國語言文字附焉。己、武學，水師附焉。庚、農學，種植水利附焉。辛、工學，製造格政各學附焉。壬、商學，輪船鐵路電報附焉。癸、醫學，地產植物各化學附焉。

四、教習宜訪求：中國教習，應取品行純正，學問淵深；外國教習，須深通西學，兼識華文，方無扦格。

五、生徒宜慎選：年以十五歲爲度，以中學西學賅通者爲上，中學通而略通西學者次之，西文通而粗通中學者又次之，分爲三班。

六、出身宜推廣：參酌中西，特闢三途。

甲、立科：仿前鄉會試立算學、時務等科之例，諮送與考。

乙、派差：如應試不中式，量其所長，諮總署派往使館充當翻譯，或分佈南北洋海陸軍船政制造各局幫辦一切。

丙、分教：泰西有師範學堂者，專學爲師，學生如不應舉爲官，即考驗後任爲教習。至經費一層，應請飛飭南北洋大臣，無論何款，按月各撥銀五千兩，解交戶部，作爲京師大學堂專款。

疏入從之。

到了光緒二十三年五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又奏設武備學堂。奏謂：

外洋武備學堂分爲三等，小學堂教弁目，中學堂教武官，大學堂教統領。學術淺深難易，爲此爲差。今我國如救時計，雖不能遽設大學堂，而教武官之學堂似不可緩，今擬專儲將領之材，選文武舉貢生員及文武候補員弁。官紳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體強健者，考取入學堂肄業。其功課章程，令洋教習酌議，課程餘暇，即令其誦讀四書，披覽諸史兵略，以固中學根柢，茲於湖北省城東偏黃土坡地方，購地建造學堂，派員妥定課程，以期有實效而無流弊。

得旨允行。

光緒二十四年，也就是有名的戊戌政變那一年正月，詔設經濟特科，正式設立京師大學堂，改各省書院爲學校。

先是貴州學政嚴修，奏請開議專科，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禮部議奏，允先行特科，次行歲舉。特科約以六事，曰：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撫學政各舉所知，諮送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奏請試以策論，名爲經濟特科。歲舉則每屆鄉試年分，由各省學政調取各學堂書院高等生，送鄉試分場專考。

令高等學堂畢業者入焉，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爲宗旨。計分八科，曰：經學科、政治科、文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

詔各省府廳州縣，將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以省學爲高等學校，郡城爲中等，州縣爲小學，並祠廟不在祀典者，一律改爲學堂。

五月，詔廢「八股文」，「科舉」改試「策論」：

經義試士，始於宋王安石，至明初乃定爲八股文體式。尊其體曰代孔孟立言，嚴其格曰清真雅正，禁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不得言秦漢以後之事。於是士人皆束書不觀，爭事帖括，至有通籍高第，而不知漢祖唐宗爲何物者。康有爲及御史楊深秀，會於本年三月，上書請廢八股，爲許應烺所駁，不行。四月初，梁啓超復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書格不得達。至是康有爲、張元濟因召見，皆力陳其害，康至謂遼臺之割，二百兆之價，琉球、安南、緬甸之棄，輪船、鐵路、礦務、商務之不興，以及民之貧，國之弱，皆由八股害之。帝喟然曰：西人皆曰爲有用之學，我民獨曰爲無用之學。康即請曰：皇上知其無用，能廢之乎？帝曰：可也。康退，告宋伯魯，使抗疏再言之。疏既上，帝立命軍機大臣批准，剛毅謂此乃祖制，不可輕廢，請下部議。帝曰：部臣據舊例以議新政，惟有駁之而已，吾意已決，何議爲？詔遂下。

略如雲：

我朝沿宋明舊制，以四書文取士，康熙年間曾停止八股，考試策論，未久旋復舊制。一時文運昌明，儒生稽古窮經，類能推究本原，闡明義理。制科所得，實不乏通經致用之才，乃近來風尚日漓，文體日蔽，試場獻藝，大都循題敷衍，於經義罕有發明，而淺陋空疏者，每獲濫竽充選。若不因時通變，何以勵實學而拔真才。著自下科爲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

同年五月又詔各省府廳州縣設立學校。詔謂：

前諭入京師大學堂肄業者，必由中小學遞升。惟各省中小學，尚未一律開辦，著各督撫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詳查，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等級科目，應以省會之大書院高等學堂，郡縣以次遞降。所有小學中學應讀之書，仍遵前諭，由官書局編譯中外各書，頒發遵行。至於民間祠廟，有不在祀典者，即由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爲學堂。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詔各省州縣改設三級制學堂：

自七月下旬，詔各省籌建武備學堂，停止捐納實官後，至是覆命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已而又命各省選派學生出洋肄業。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間，頒佈學堂章程，再詔停「科舉」：

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定章程以鼓勵之。凡由學堂畢業考取合格者，給予貢生、舉人、進士等名稱。又特設管學大臣以專其責，此二十七年事也。二十八年頒定學制，命各省選擇學生，派往西洋各國講求專門之學。其後學制，遞經改訂，規模漸具，至是命由張之洞會同管學大臣，將學堂章程悉心釐訂，議定進呈。

凡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附設通儒院，六種章程各一冊。又外國蒙養院，一名幼稚園，茲參酌其意，訂爲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各一冊。另就原設師範館章程參考訂定初級師範學堂、優級師範學堂、任用教師等三種章程各一冊。又農工商實業，另擬有初等農商實業學堂、附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及藝術學堂各章程。中等農工商實業學堂。高等農工商實業學堂、實業教育講習所、實業學堂通則，五種章程各一冊。此外管理法編爲各學堂管理通則一冊，又總括設教宗旨，爲學務綱要一冊。

當時稱爲賅備，並擬遞減科舉辦法，疏入，命次第推行，並改任孫家鼐爲學務大臣。

光緒三十一年，又詔停科舉：

自二十七年七月詔廢八股之後，科舉仍每歲舉行，至是因日俄之戰，全國風動，直隸總督袁世凱等遂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廷議從之，遂下諭。略言：三代以前選士皆由學校，而得人極盛，實我國興賢育才之隆軌。即東西洋各國富強之效，亦無不本於學堂，方今時局多難，儲纔爲急，朝廷以近日科舉每習空文，屢降明詔，準將鄉會試中額，分三科遞減。茲據該督等奏稱科舉不停，民間相率觀望，欲推廣學堂，必先停科舉等語，所陳不謂無見。著即自丙午科爲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又言：學堂本古學校之制，其獎勵出身，又與科舉無異雲。自是科舉遂廢，學堂日興，其留學歐美者所在興起，全國風氣爲之一變。

到了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宣示教育宗旨。詔曰：

考各國學制，大別有二：曰專門。曰普通。而普通尤爲各國所注重，普通雲者，不在造就少數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數之國民。今因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明以距異說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又宜箴砭以圖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著將欽定教育宗旨，頒示天下，懸之京外學堂。

看了以上的歷史資料，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在時代潮流的趨勢中，要想真正融會古今中外而建立一個新的教育思想和制度，絕非單憑淺見的眼光而只圖一時的快意和躁進所能成其事。同時，看了這些史料以後，也可瞭解我們現在有關文化教育等問題，仍然還是這個世紀中的老問題，只因時代意識的不同，表現的形式兩樣而已。

# 值得反省的代差與教育

---亦新亦舊的一代

前面費了不少的時間，反覆講述了近代一個世紀以來文化和教育在歷史上演變的陳跡，其目的，爲了使我們現代的青少年們，瞭解有關這一世紀的思想和心理問題的來因去果，而後才能真正深入其中心，探討其得失，也才知道如何自強自發地擔負起這一代應負的責任，以及如何建立今後文化思想的方向。現在要講的，將是銜接我們這一代切身的問題。但是其中還有不少的因素，牽涉廣泛，無法一一剖析，只是略說端倪，以資啓發，希望有志之士自尋答案而確立自身的作業。

由於前面的講述，我們至少知道過去有關東西文化、語文的交流工作，以及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演變情形，已經有了百年前後的歷史，換言之，橫亙在我們面前的種種問題，例如：東西文化思想的交流、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等等，仍然逗留在將近百年以來的老問題上，到目前爲止，並無特別翻新之處。同時也由此可知重新整建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絕不是但憑一時的意氣，可以「立竿見影」，一蹴而就，僥倖而得的。並且也由此可知其中根本就沒有什麼「代差」、「代溝」等的存在。現在青少年們所夢想以赴，憤慨以求的，也是上一代所希求的目的；現在青少年們的感受，也正是上一代慷慨悲歌的情形。只是時代環境的不同，彼此面對的景象各別而已。規規矩矩來說，上一代的老少年們，由於年齡隨時代的消失，意志隨歲月的凋逝，精神隨體力的衰歇，把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願望，寄託在下一輩後起之秀的身上。因此，從表面看來，老少兩代的思想與作風，在形式上縱有差異，但在實際上，卻正如接力賽，互相銜接，上下兩代哪裏真有一道鴻溝的間隔呢！如果真有「代差」、「代溝」的存在，人類的歷史一定會有絕無僅有或一段真空的現象出現。那麼，歷史事實與歷史哲學的本身，都成爲廢話而不通了！事實上，歷史的演變也正是銜接性接力的變異，絕無一個無因而來的可能。因此，歷史哲學仍然具有它值得研究探尋的價值。

文化史上的一筆「呆帳」

現在我們舊話重提，再從滿清末代廢除科舉取士與改革教育制度談起，由鹹豐時代的學習西洋文學，出洋考察，成立「同文館」，翻譯西書，以及到了光緒初年廢除各省州縣的「書院」制度，成立「學堂」，和正式設立「北京大學堂」的一連串的事實開始，將近一百年來的文化輸入，和「東才西學」的成績，它在歷史上究竟有些什麼交替？而且一般正式從「西學東來」的前輩學人們，他們爲我們的國家民族又究竟作了哪些實際的貢獻？當然囉！除了從事有關應用科學而默默無聞的建樹者，值得我們予以相當的崇敬以外，其餘的，實在不敢期期奉承。此所以我們在這一時代中，不及東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進步之故。固然，我們也不能隨隨便便就將這個重任，冒然地加付在他們的頭上，況且其中還有許多阻力的因素，絕非驟然可以消除的；例如歷史文化舊包袱的拖累，以及新舊思想一時難以融通的差異，因此纔有上一代勞而無功的結果。但從「春秋責備賢者」的意義來看，卻也不能輕易地推掉中國文化人的責任啊！

先從小學教育的課本說起

講到這一世紀教育上的沿革，我們必須要從教育的宗旨和內容說起。同時更需要從基本教育——中小學的教育說起。關於過去童稚開始接受教育的情形，我們已略如前面所講，雖然並無明文規定它的宗旨，大體上都是以人格的養成爲教育徹始徹終的精神。至於上下二千年來教育的內容，都以「四書」、「五經」爲教材的主要中心。除此之外，雖然另有如《三字經》、《千字文》等一類的書，也只能算是輔助性的讀物。自從西風東漸促使教育改制以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觀念，以「經」、「書」爲主的一貫教育，始終還是一仍未變。儘管有人表示反對。但過去數十年來的確是如此。後來由改制而注意到小學教育的課本，根本撇開舊套，從教習兒童的識字教育開始，但還是走的《禮記》文化的老路線，採用「小學」、「訓詁」的精神，配合西方文化的看圖認字的教學方法，因此而有了「人、手、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等初級小學課本的出現。從此而再演變，便又改的課本，作爲小學「小貓三隻四隻」、「貓兒叫，狗兒跳」一類低年級的讀物。再往後的一再改變，便到了現在的「開學了！開學了」、「老師早，老師好」的課本了。可惜我手邊資料不夠，如果資料齊全的話，就可以把這幾十年來所有課本內容的改革，作有系統的研究，那麼一定會發現許多道理和足資反省、檢討的地方。如果有人拿這資料作一篇《二十世紀中國中小學教育課本的改革和文化思想之演變關係》的論文，保證一定可以拿到一個學位。

當時有關這些課本的改革問題，都是經過慎重的研究和考慮，尤其須要根據國家教育政策和「教育學」、「兒童教育心理」等等學理的依據，並無隨便亂來的嫌疑。至於人格養成的教育，則只歸公民課本去負責（舊式的公民，叫作修身）。大家都是身歷其境，都有受過這一教育方式的實際經驗，不必再作詳說。尤其像我們列入上一代的老少年們，親自有過新舊不同的教育經驗者，對此看得更爲清楚。必然承認新時代的教育內容和方法，對於開啓國民知識和普及教育的效果，的確迥非前代可比。但是知識並非就是「學問」，人格養成和國家民族文化精神的栽接，並非有了知識就能成功的。尤其對於兒童教育來說，問題更爲嚴重。因爲我們現在所採用的教育方法，爲了配合當前時代的需要，大體上都是傳授知識和技能，並沒有真正考慮到國家民族「承先啓後」的百年大計。舊式的教育，雖然也沒有明文確定是爲這一目的而教育，但幾千年來的一貫精神，實在是與此目的相契合的。

現在爲了面對當前時代的需要而傳授知識和技能，那麼，所有教育措施，就只看時代的趨向、社會的需要而決定教育的方向。因此，就無法以教育思想來開闢時代而領導新時代了。尤其爲了「語」、「文」合一而採用的課本，對於知識的傳授和傳播，收到眼前的功效確實不少。但是距離中國文化的本位，就愈來愈遠了。我們所謂的中國文化的寶庫，都在上下五千年的古典書籍裏，但是古書都用文言寫成的。我眼見現代的青少年們，雖然愛好中國文化，有心要想研究中國文化，基本上就讀不通古書，打不開這個上下五千年寶庫的鎖鑰，因此只有望洋興嘆，左顧右盼的盡是一片茫然了。

以考試爲學問的流弊

並且最不可解的，我們現行的小學課本，與中學、大學並非都能銜接。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拚命教兒童們背誦現行課本上的許多大可不必要的知識，來準備月考和期考。因此弄得有心「望子成龍」的家庭，比較上進的子弟，「三更燈火五更雞」背書作功課，比起科舉時代的考功名、背「八股」，更加嚴重。當時爲了考功名，背「經」、「書」，背了以後，一輩子受用不盡而學無止境。只要問一問，我們現代六、七十歲以上有所建樹的老少年們，請他們平心靜氣地談一談，哪一個的學問知識不是從這種舊教育方式中打下基礎。可是現在我們花費了無價可比的下一代童年時代的時間和精力來背課本，弄得頭腦呆板，眼睛近視，背熟了以後，除了應付一級一級的考試以外，便等於毫無用處。一考上了中學，小學讀的書就等於白費。考上高中，初中的書是白讀了。考上大學，中小學的書等於無用。大學畢業以後，踏進各階層社會來做事，無論如何專門，也會感覺到所學與所用，完全毫不相干。除非還要爲一輩子的考試再接再厲，那才還有些用處。因而，正常情況下，或者在大學畢業以後，才需要正式開始重新讀書求學。

有一次和一位學師範教育的同學談天，偶然講到這些問題，我問他說：「我們現在教育的真正價值在哪裏？」他嘆了一口氣，笑着對我說：「爲了考試」。由小學考中學，中學考大學，考研究所，考出國，考種種和種種的考。考過了一生，然後方有資格稱「顯考」和「皇考」。這真是一個語重心長的幽默。考試是中國文化特有的創作制度，法良意美，素來爲外人稱道讚譽的。誰知到了現在，一考之弊至於如此，因此而形成現在青少年們的思想與心理潛在的抗拒意識，也是相當嚴重的因素之一，的確不能掉以輕心而疏忽置之的。如果以時代觀點，從西方文化的教育制度來講，無論歐、美各國的小學教育，其課本與作業，也有考試，但輕鬆而活潑，收效的現象也絕不像我們的情形。至少目前美僑在我們這裏的教育，也可以值得借鏡而窺見其一斑的。

新式與舊制小學的差距

其次，講到有關幾十年前小學教育制度的內容和現在的情形，更會使人引起教育史上的滄桑之慨！如果一定說現在的老少兩代存有「代溝」或「代差」的話，所受教育制度內容的影響，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過去的小學，由舊式到新時代，制度還未十分完備。小學教育，便有「初級小學」與「高等小學」之分。如果再向前推，又有舊制的「高等學堂」之別了。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由清末以來的教育改制資料，便可知舊制的「高等學堂」，它的性質相當於現在的完全中學。再進一步，便是舊制所稱的「大學堂」了。至於綜合舊制的「初級小學」和「高等小學」來講，它的性質，等於現在的完全小學。但在幾十年前的小學，由初級到高級，不但對於西方文化的英文、算學等基本教育，已經列爲必修而有相當的程度，而對於中國文化的傳統教授，大體上還是因襲舊式的精神，保持傳統的讀書風氣。因此倒退回去幾十年來講，那個時代一個畢業於「高等小學」的優秀學生，他的知識程度、學問修養和見解，比起現在一個畢業於完全中學的學生，實在高明得多。如所周知，在這個時代幾十年來很多對國家社會有建樹的人物，無論在黨政、軍事或文化教育、工商各界出人頭地的，他的學識基礎的深度，都是由於舊制小學和依照舊式讀書的教育成果。其實，這是我們這一代老少年們大家心照不宣的老實話，我相信他們大家也都有同感，只是不肯出之於口而已。

我們現在社會安定、經濟進步的一代，國家花了經費，普及了國民教育，何以在完整的國民教育制度下，反不如其初也？而且反因教育的普及，促使青少年思想與心理上的彷徨，這又是什麼原因？實在值得深思反省。老實說，這幾十年來，如果只靠普通學校教育的方法，恐怕中國文化的精神，早已淪陷無遺了。當然，我所知不及的地方，或許很多，但是，如果這一代中，真正親自接受過新舊教育與普通學校教育和軍事學校教育的，或者對我所說會予首肯的。

# 教育與文化的中空

---亦新亦舊的一代

這一兩年來，有些從大學和研究所畢業的同學，進入社會工作以後，深切地感覺到中國文化以及中文修養方面，太過貧乏，甚之，因此而影響對西方文化的認識，也愈來愈膚淺。希望我們讀過舊式「書院」的老少年們，根據真正「書院」的精神，參酌西方研究院的長處，試辦一個可供讀書講學的地方。此事看來很好辦，但事實上，有許多的困難無法解決，同時也是一件喫力不討好的工作。而且最主要的，我還是振作不起疏懶慣了的個性，平常徒託空言，不肯積極地見之於行事之間。所以一再因循，得過且過。

最近，許多大學畢業的同學，碰到初進大學的同學，向他們討教求學的方向，以及開始研究中國文化的方法。因爲這些青年考進了大學之門以後，纔開始覺悟到必須「反求諸己」——研究中國文化的精要。但因爲由小學到中學的十多年時間，浪費了青春的精力和智力，死背了許多無用的知識，對於中國文化，所有的是一片非常可怕的「空白」。現在進入大學，比較有些自由讀書研究的機會和時間，但又不知如何入手，如何找出一條簡捷易曉的捷徑，以及如何迅速地彌補過去的「空白」。

新進的同學們發覺了問題，前期的同學們對此也同樣不知所措，誰也不能昧着良心盲目地指人一條暗路，單靠「讀經」就行嗎？誰又不會「讀經」呢？凡是多認識些中國字的，都說自己會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甚之，諸子百家之學，都可一目瞭然，無所不通。目今林林總總的學子，以及負責教育的，誰又不是博古通今，目空一切的呢！而且講授人文思想的，提到中國文化，除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外，便是「我」。然後便氣「蓋」萬夫地褒貶諸方，肆意謾罵。提到西方文化，除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以外，在中國，無論自己的洋文真的通與不通，除「我」以外，還有誰呢！結果呢？砍過程咬金式的三斧頭以外，再要「扣其兩端」，便是「空空如也」猶如聖人了。如今滔滔滾滾者大半如此。因而青年們，彷徨更彷徨，唾棄更唾棄，你說怎麼辦？

還有一位某大學的同學對我說：「我們學校的新決定，要把某一科的思想史，改作一年級的必修課。請問：你對此有無意見？」我說：「放在哪一年都可以，我無意見。不過，爲什麼有了這種動議？」他說：「因爲要大家先對歷史有了認識，纔好選擇自己的志趣，應該專攻那些學問。」我說：「如果照這樣說來，大家在中學階段都沒有讀過歷史嗎？如果在中學裏已經讀過歷史，爲什麼到了大學一年級還要再瞭解一次歷史呢？倘使本來已經知道歷史，只是不知道歷史上的學術思想史而已，那麼，茲事體大，就非大學一年級的程度所能瞭解。照現在大學生的程度，恐怕至少要三年級才能開始研究。」總之，對於這個問題的本身，並不足以重視，目前教育的現況，都是似是而非，只要學校當局的「老闆」們，隨心所欲而不逾外行人規定，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但是由中學到大學的一段「中空」，又是誰該負其責咎呢？

再說中小學教育的「代差」

本世紀的六十年中，我們的國家一直在憂患中度過多難的歲月。距今三十年前，我們還未實施國民義務教育以前，無論小學、中學、大學，都是在舊制中蛻變改進，並未確定一個爲國家百年大計，除舊更新的準確路線。雖然各省縣照例有縣立高等小學和省立中學的建立，但較爲僻遠的地方，仍未普遍地設立。因各地的知識分子，秉承中國固有文化思想的讀書人，抱着讀書救國的傳統精神，起而私人興學的，大有人在。但是，三、四十年前的小學或中學，無論是公立或私辦，大多都在不今不古、半中半西的文化思想之回漩中，教育青少年們。人文思想方面，正是西方文化思想開始輸入的階段；自然科學方面，也只是初步移殖新知，培養後進。除了東南和沿海一帶，比較容易接受西方文化之外，教會的勢力也隨着百年來的苦心經營，而伸入教育範圍，此時已興辦新式學校，努力介紹西方文化，積極傳授洋文。至於其他公私立中小學的學風，仍然還是停留在以中學爲主，西學爲用的階段。有些雖然不是完全以中國文化爲主，至少也是偏重在東方文化方面。倘使只從中國文化的立場來說，三、四十年前受過中、小學教育的人，對於中國固有文化，正處在「褪色」的階段，還沒有像這二十多年來，由褪色而變爲「真空」。這種現象，只要深切體會我們現代中國人對於中國文化吸收的程度，以二十年做一階段，從六十年前受教育，與四十年前受教育，以及最近二十年來受教育的人相比，就可很明顯地看出差異。如果說現代中國文化真有「代溝」的話，那麼文化思想上的「代差」就是非常明顯的事實，大可不必諱疾忌醫而不謀自救之道。至於目前二十歲左右的大專同學，乃至再往前看看，還正在受小學教育的小朋友們，因傳播事業和時代文明的發展，新的「代差」，又在更新的孕育中成長。爲「國家百年大計」、爲「人類文明前途」，親身目睹這些歷史文化演變的現象，使人對於「成己成人」的千秋事業，不禁四顧彷徨，畢竟如何才能向歷史任務作一交代呢？

六十年來演進中的大專教育

由以上的大要，瞭解了六十年來中、小學教育的概況，再回顧一下本世紀中我們的大專教育，更有「概乎言之」之況了！我們在前幾次講述中，對於清末民初教育制度變革的情形，已經約略提到它在歷史上演變的大要。從一般性的大專教育來講，大學方面，由京師大學堂改制成民國以來的北京大學之後，在北方還有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等的建立。以後各省也分別設立了大學，例如雲南、四川、山西、浙江大學等。此外，各地也有繼起的私辦大學，後來又有國立的各個大學。其他在東南沿海直接或間接由教會辦的和私人創辦的大學，在輸入西方文化和傳授洋文方面，素來便有一路領先、特別優秀的卓越聲望。至於職業性的學院，除了醫學、法政與交通等，要算師範學堂最爲流行，因爲當時我們國家在政治、立法和建立新時代的教育方面，正在需要人才。此外，有關礦冶、蠶桑、紡織方面，也有少數的專校。但是，一切都還在建設性的新創過程，教育方法雖然很認真，制度還未完全確立，或多或少，總在不今不古、半古半西的成長階段。特別是屬於革命性的教育方面，又與一般教育分途。

由舊式教育轉向新式教育

面對我們現在的青少年們，大概描述了這幾十年來教育的趨勢，雖然籠統講了中、小學和大專的情形，但是絕不能拿諸位同學現在在此地受教育的經歷，來看過去五、六十年或三、四十年的情況。否則，便會使我們要講的主題——二十世紀青少年的思想與心理問題——完全脫節而毫不相干。我們花費了很長的時間，敘述現代史上教育演變的情形，正是爲了層層剖剝有關現代青少年思想與心理問題的因果關係。也許大家瞭解了這些事實以後，由果推因，便會知道自己是如何成長壯茁在這個安定幸福的社會中，同時也可由此而體會到「憂患興邦，逸樂亡身」的道理。

幾十年前，我們讀書求學可沒有像諸位現在那麼容易。現在政府實行義務教育，並有獎勵求學等政策的規定，又加社會安定、國民經濟平穩、交通方便，所以由小學、中學，一直讀到大專和研究所，都是一帆風順，平步青雲。可是前一輩的老少年們，就與現代青少年們大大的不同了。尤其像我們這些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不老不少的老朋友們，講到讀書求學的故事，真有不勝今昔之滄桑感慨。

幾十年前，像我們這些來自鄉村的老少年，先在家裏接受了舊式讀經書的「家塾」教育，既不是像現在青少年爲求職業、求學歷、求出路而接受教育；更不是爲了「科舉」、考「八股」以博取功名。我們從小先要接受舊式教育的動機，那是傳統歷史文化上舊觀唸的習慣所驅使，同時也是受了舊觀唸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識所影響。因爲當時在新舊社會形態的變革時期，許多鄉下人真還弄不清國家教育政策的方向。除非有些在通都大邑的人，得其風氣之先，才真是爲了讀書救國，爲了學問而學問地接受教育。現在反省起來，說句老實話，我們當時的讀書受教育，有意無意，或多或少，都是因襲三千年來的舊觀念，不外乎由「光耀門楣」、「讀書作官」的動機而來。當然仍有少數傑出之士屬於例外，不能一概而論。這種觀念，也正如現在大家潛在意識的觀念一樣，是爲了求學歷，拿文憑，好找職業，好謀出路。只是時代不同，觀唸的名稱改變，實質上，還是「換湯不換藥」，在根本的心理意識上，完全相同。

新舊讀書方法

我們當時舊式讀書受教育的方法，是「讀古文，背經史，作文章，講義理」，那是一貫的作業。那種「搖頭擺尾去心火」的讀書姿態，以及朗朗上口的讀書聲，也正如現在大家默默地看書，死死地記問題，牢牢地背公式一樣，都有無比的煩躁，同時也有樂在其中的滋味。不過，以我個人的體驗，那種方式的讀書，樂在其中的味道，確比現在唸書的方式好多了。而且一勞永逸，由兒童時代背誦的「經」、「史」和中國文化等基本的典籍以後，一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當年搖頭擺尾裝進去，經過咀嚼融化以後，現在只要帶上一支粉筆，就可搖頭擺尾地上講堂吐出來。所以現在對於中國文化的基本精要，並不太過外行，更不會有「空白」之感，這不得不歸功於當年的父母師長，保守地硬性要我們如此讀書。

「家塾」讀書受「經」的遺風當然存在不了好久，時代的潮流到底很自然地打開了風氣，馬上就需要轉進「學堂」（當時俗語稱呼新式的學校叫「洋學堂」）去上學。但是，就以「高等小學」（等於現在的國民小學）來說，一個縣裏也沒有兩三個，有些地方隔一兩縣，纔有箇中學。雖然路途只隔十多里或二、三十里，可是要一個生長在保守性農村的子弟，基本上是先受舊式教育讀書的小孩子，背上一肩行李和書箱，離開家園而進入「學堂」的大門，過着團體受教育的生活，其中況味，比起現在出國去讀書，還要難過。如果由高等小學畢了業，有能力、有志趣，要再上進去讀中學，那種氣氛就像專制時代進省考「舉人」一般嚴重。三、四十年以前，在守舊、保守的農村社會裏，一個鄉村沒有幾個中學生。當時，他們便等於是「洋舉人」，風頭之健，足以博得人們的刮目相待，或「側目以視」，至於偏僻地方，一個縣裏能有幾十個中學生，已是了不起的事。再能進讀大學的，真是寥寥無幾了。但是那時一個高等小學畢業生的學養程度，比起現在中學畢業的，還高得多。一箇中學生，比起現在大學畢業的，也要勝出一籌。如果大家不說假話，當代多少知名之士，在各界有所成就的中年以上人物，很多都是在這種不新不舊的中、小學教育環境中成長自立起來的。尤其站在中國文化方面來講，的確是如此，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因爲時代的不同，從小學開始，對於中國固有文化，已經打了較好的基礎，這是不必諱言的事實。這就是我們的國家，在幾十年前，由農業社會轉進工商業社會，因教育形式的不同，而使得這半個世紀中的心理和思想上，產生許多新舊的差異。

爲什麼當時讀到中學的人那樣少呢？這就涉及了當時政治、經濟、交通、教育等等許多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也都是現代教育上的專題。現在追溯從前，只從經濟方面來講，當年的農業社會，較爲僻遠的地方，能夠使一個子弟讀完高等小學，在學費的負擔上，已經非常喫力，如果要使一個子弟讀完中學，在學費、路費（交通費）、住宿、膳費等的負擔，如非「中人之生產」的家庭，實在很難負擔得起。除了通都大埠以外，一般農村社會，除了要子弟讀書作官來光耀門楣，否則，教育對他們而言，真是一件過於奢侈的事了。倘使再要上進去讀大學，就等於滿清時代的上京考「進士」一樣的嚴重。因此那時候一個大學生，除了少數真正毫無出息的世家公子，或富家紈袴子弟以外，只要能夠進入大學讀書的，學識才能的程度，就遠非今日的大專同學可比了。當然，大學生們也許會盲目地責怪上一代的老少年們對於國家歷史上的貢獻。事實上，如果真能深切地研究、瞭解了我們國家在這半個世紀中，遭遇「內憂外患」的種種經過，便會體諒上一代的老少年們，是如何地運用不今不古、半古半西的學問知識，極其艱辛地撐持了這「六十年來家國，八千里地山河」的歷史局面。在艱危變亂中，誠然不免忙中有錯，何況世界上最難瞭解、最難判斷的便是「人」和「事」。

因此對於這個問題，很可以引用兩句古話來說：「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才流都向考中磨

在這二十多年來，教育的發達和普及，遠非從前可比。但是無論教師或家長，都感覺到教育水準的低落，一代甚於一代，而遠不及從前。當然，其中原因複雜，不能只苛求於學校的教育，例如社會風氣與社會教育的關係，家庭教育與家長思想的關係，整個教育精神與教育制度的關係。在在處處，都是整體連鎖性的因素。不過，單以中學的教育而言，問題就頗爲嚴重。歷年來爲衆望所歸的幾個著名小學或中學，尤其是某些「女中」，爲了爭取「校譽」（以升學率的高低而定校譽的聲望），大半時間，在教「考」。除了背考試題以外，就不知道什麼叫教育了。而且功課的繁重，根本沒有時間多讀課外的書。我與學生及在中學裏當教師的同學們談話，他們或她們在夜裏作夢的時候，經常都還夢見「趕考」——被考或考人。除「考」以外，簡直不知什麼是學問。舊式考試考「思想」，現在考試考「記誦」。《禮記》有言：「記誦之學，不足爲人師。」可是現在能記誦而善於考試的學生，家庭與學校，都認爲是好學生。稍加活潑而稍富於才能與思想的，反而考得不好。而社會、家庭與學校，根本就拋棄誘導天才等的教育原理，很輕易地認爲是壞學生——太保或太妹。所以這些不「太」而也被汏的青少年們，率性就抗拒到底，一路地汏下去了。家長期望於現在好學校的心理是如此，所謂好學校的校風恰也合於家長和社會的要求，你能說是有錯嗎？其誰之過歟！其誰之過歟！

# 尊 師 重 道

---亦新亦舊的一代

「尊師重道」，是人類文明的共通德性，無論中外都是一樣，只有禮儀形式上的不同，並無精神上的差別。但在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師道」的尊嚴，「尊師重道」的精神和禮儀上的風氣，儼然已與「君道」互相對峙，構成「政」、「教」互助的特質。只要讀過歷史（不是現在學校裏的歷史課本），懂得中國文化史的人，都是瞭然於心，不待細說的。即使沒有讀過書，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在文化傳統的薰染中，也都知道「尊師」的重要。尤其在過去的民間社會，不讀書，不進學校，自由從師學習百工技藝爲專業的人，終其一生而「尊師重道」的精神和行爲，比起讀過書，受過教育的人，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習「武」的人，對於「尊師」，更加重視。但在二十世紀的這個時代中，數十年間，師之不尊，道之不行，其所由來者久矣。因此政府與社會，苦心復興中國文化，強調「尊師重道」的行誼，每逢一年一度的「教師節」，特別提倡「敬師」的運動，實在是煞費苦心。

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隳墮才須復興，頹廢才須提倡。正因爲中國文化的優良精神，經過幾十年來的蛻變、沒落，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弊病，所以才須復興和提倡。即如「尊師重道」一事來說，也正因爲感慨於「師道」的淪夷，因此才重新號召。老子所謂「六親不和有孝慈」，也便是這個道理的反映。可是多少年來，無論在教育界、在社會間，「尊師重道」的風氣，一經提倡和號召，便已確實改進了嗎？事實並不如此。相反地，如果深入觀察，反而看到現代師生之間的彼此排擠、傾軋、嫉恨、輕視，甚之互相謾罵，處處皆是。由此可知一種優良的禮儀風氣，絕非制度或規定所能養成。它的基本根柢，仍然有賴於教育和學風的改正，以及整個社會風氣和全民思想的培植。

中國傳統文化的師道

現在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歷史文化上有關「師道」的情形，使大家在觀念上，能夠「溫故而知新」，可以得到懲前毖後的準確方向。在我們的傳統歷史上，師道的尊嚴，自三代開始，就與「君」、「親」並行。所謂「作之君，作之親。」同時也便要「作之師」的。

自東周以後，有孔子的精神和人格的感召，「萬世師表」的典範，和「尊師重道」的觀念，便與「君道」分途而截然獨立。但與「親」道仍然是互相呼應。秦、漢以後的「傳經」和重視師承的風氣，雖然漸已趨向狹小而發生流弊，但這種優良傳統精神的存在，依然有其特殊的價值。

魏、晉南北朝之間，師道漸趨隳墮，但因新興佛教重視師承的作風，以及政治體制上確立了王者尊師的禮儀。「師道」爲尊的精神，又走向一個新的境界。

到了中唐以後，韓愈寫了一篇《師說》與《原道》，爲「尊師重道」和重視師儒的風氣，又添了一番新的景象。由於儒、佛兩家學風的影響，到了宋代，理學興起，撮取《禮記》和「叢林制度」的精神，新的「尊師重道」的面目，便從此確立。

如果肯讀一下「四朝（宋、元、明、清）學案」和「五種遺規」等書，資料具在，在此不必多說，因此自明、清以後，各階層社會重視「師道」的觀念，普遍流行。過去許多家庭的中堂，供奉了一個宗教式的牌位，上寫「天、地、君、親、師」五個大字，也便由此而興。所謂「一日從師，終身爲父。」乃至尊重「一字之師」的美德，也便爲大家所樂道。民間社會和宗教上「師父」的稱呼，以及帝王們在朝廷上對「師傅」的恭敬，也由此而成爲當然的風俗。

可是，所說的這些故實，還只是歷史上的精神形式。事實上，自宋、明以後，「師道」的尊嚴，並非只是對學生們的要求。實際上，是師生互相尊重的禮儀。固然「一日從師，終身爲父。」是對學生們的教誡。但是老師對於受業的學生，親情愛護，以及對他的學術思想乃至行爲上，都須負起畢生的責任。學生對於老師，固然視之如父，但是老師對於學生，在中國禮儀的傳統習慣上，向來都很謙抑，猶如兄弟的相處。所以古來稱學生爲「弟子」，就有弟兄的意義。老師寫信給學生，除了「賢契」等文謅謅的稱呼以外，有時多以「仁弟」或「老弟」相稱。老師自己的具名之上，不是加上「友生」，便是「愚兄」，表示互相的尊重。

即使學生中了「狀元」，作了「宰相」，而在鄉的教師，始終是青氈一席，沒有博得功名，終老於白屋，一旦「狀元」或「宰相」的學生，衣錦回鄉，仍然還是執禮甚恭，猶如在學之日。

由此影響所及，從前官場的儀注，對於門生故吏之間的感情，也如師生一樣。便是由於這種學風而來。

三十年前，我的一位老同學朱鐸民老先生，出任於某省廳長以後，偶然回鄉，馬上趕到老師墳上去拜奠一番，還爲老師的家屬購買了幾畝田地，以供祭掃，因此大家交口稱譽，傳爲美談，認爲他是學生的模範。現在他已年逾八十，我們有時談到新知舊學時，真有無限的感慨。

當然！我說的這些，也許諸位同學認爲是站在師長一面而言，並沒有說出中國文化史上師生彼此負責的事實。現在爲了節省時間，只舉出宋、明以來歷史上兩三個故事，便可代表了這個觀念。

至於在學理上，所有文化史的實際資料，足可作一長篇論文的充實內容，但需要諸位自己去讀書尋找，讓我賣個關子，以免大家太偷懶，養成依賴性。第一個故事：就是宋代忠臣文天祥被陷在元朝的時候，他的學生怕他受不了威脅利誘，特別作了一篇祭文，連帶祭品偷偷地送給他。他看了一笑，帶信告訴學生們放心，他絕不會不忠而投降。第二個故事：我們都知道明代的忠臣方孝孺，不肯爲明成祖的篡位寫詔書，惹得成祖要殺他十族。古代最重的刑戮是滅九族，明成祖對方孝孺的滅十族，便是加上一個師族。這豈不是表示中國文化「師道」的尊嚴，和師生之間彼此負責任的事實嗎？第三個故事：便是清代的年羹堯，相傳他的秉賦非常惡劣，後來是靠一位明師教導出來而「文成武就」的。後來，他對請來教導子女的「西席」老師，也就特別恭敬、重視，優待異常。但是他在老師教書的地方，卻貼了一付對聯：「不敬師尊，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這付對子，雖然很粗鄙，但也正是對教育和師生之間的互相責任上，下了一個嚴謹的忠告。

現行三級學校的敬師

有關過去的風氣，暫時講到這裏爲止。最近二十多年來，我們所看到「尊師重道」的精神和風氣，只有在國民小學的學生們，還可以保存這些氣息。一開始進入中學，就漸漸地淡了，到了大學，就只有一些影子了，甚之，連影子也看不見了。至於一般的社會和家庭，有時提到老師一詞，等於代表了譏笑和諷刺的笑料名辭。在小學生們的純潔心靈中，大體說來，對於好的老師的尊敬，真有神聖莊嚴之感。看到老師就要敬禮，同時又一半膽怯、一半含羞親切地喊一聲老師。可是一到初中，學生的年齡長大了，老師的尊嚴也走樣了——當然這與現行教育的學校制度是有密切的關係。於是對於「尊師」的態度，比起在小學時代，已經大大地打了折扣。再到了高中時代，比起初中，又減少到一半以上。如果一考進了大學，學生與師長之間，就幾同陌路之人。甚之，離開課堂以外，在任何地方碰見了師長，還肯向老師翹翹下巴（不是點頭），舉舉手打個招呼，老師們應該有「受寵若驚」之感。倘使親切地喊一聲「老師」，真會使你感覺到感激涕零，不勝感動呢！大學畢業以後，在別處遇見了老師，還能禮貌地招呼一聲，那會使你覺得其人可以「德配堯舜，道貫先賢」了呢！這種情形，是現代中國人和教育界心照不宣、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們由此可知，在現行教育制度的學風之下，教育程度愈高，知識愈豐富的，尊師重道的精神也愈減少。甚之，低到於零。唯有在軍事學校的教育方面，大體上還能保留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和袍澤情深的情感。

講到這裏，使我想起了有關「敬師」的一個滑稽事實，稍作報告，希望有心復興文化和有心整頓教育風氣的人，多從正反雙方注意研究。但我要聲明，這個事實的存在，應該已有三、四年的歷史了，因爲在三、四年前，我的家裏，還有三級學校的學生，所以看得比較清楚，現在我家已經只有大專學生的經驗，恐怕時過境遷，也許是已落伍了。況且我又不喜歡多方接觸，更不肯深入社會去作資料調查，只好據實報告一番而已。

大家都知道，我們過去幾十年前「尊師」的風氣，最注重的是一年三節，端陽、中秋和過年的時節，一定要備禮物，如無禮物也要去向老師拜年、拜節。現在時代變了，當然須要革除舊習。但在這十多年來，每逢「教師節」的時候，凡在國民小學裏的學生，一定由家長會發給一個紅包帶回家，上面註明是「敬師金」。雖然說這種作法產生的流弊也太多了，但在我個人的觀感，倒可引用孔子的一句話來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當我的孩子們帶回了「敬師金」的紅色時，我問要裝多少錢？這就產生了兩個不同的問題了。第一，因此可以看出一個級任教師的好壞。第二，因此可以看出孩子們的心理、秉賦的個性。當時孩子們的回答說：「起碼的規定需要十元，但是我們的老師太好，而且我們總要比同學們多一點，纔有面子。」於是我就故意先與他們討價還價地漸漸加上去。最後才告訴他們「尊師重道」的道理，寧可自己節省一點，對於「敬師金」應該比較從豐爲是。相反的，也有孩子們說：「我的可以少一點，不必那麼多。因爲『敬師金』是由老師們集中起來分的，好壞的老師都一樣，每個人分不到多少錢。並且我的老師有補習（當時小學的老師另有補習的風氣），一個月可以收入六、七千元，或多到八、九千元左右。家裏的用具比我們的寒舍好多了。爸！你爲什麼要教大學，還不如去教小學多好呢！」這番話，使我聽呆了。第一個的感覺，就是這一代的教育怎麼辦？他們的小小心靈上，已經感覺到只有「錢」和「物質」的重要，難怪人心愈來愈要趨向現實。當時除了多方講解，善爲教導以外，同時又得到一個機會去拜訪那位老師。我先請教他「貴姓？」他說：「我貴姓×。」跟着再請教他「府上哪裏？」他說：「我府上××」！因此等等，我只有鞠躬如也，唯唯告退！這個孩子的學業，後來就蒙受損失很大。過了幾年，聽說他又混到了某大學畢業，現在又全家出國去了。真是不勝感慨。

孩子們讀到了中學以後，到了「教師節」時，有關「敬師金」的事，就一年比一年地淡薄下去，據說在繳學費時，已經加進去了（當然很有限）。讀到了高中，好像是「雲淡風輕近午天」，大有煙消雲散之概。一到了大學，不要說根本沒有這回事，就連起碼的禮貌也沒有影子了，那只有「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的境界了。如果碰到一個真正清寒的大學教授，當他「兒啼於前，妻號於室」的時候，那真會使人回憶起古人的「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貧無奈做先生」的苦澀滋味。

當然！這還只站在一面的觀點來講做老師的苦經。如果另從學生和家長一面來講，據我所知，當時有些小學生帶回了「敬師金」的紅包回家時，根本不敢拿出來跟父母家人去說，小小的心靈上，只有偷偷地在哭泣。因爲他們的家境實在太貧寒，每天要十元錢買菜都不可得，哪裏能夠拿得出「敬師金」呢！可是，有的學校，有的老師，看到學生不交付「敬師金」，就另眼相看，甚之，不堪其苦。你說，這又怎麼辦呢？後來教育當局，也許知道了這個弊病，好像下令稍稍改變了這個辦法。但是，持平之道，畢竟太難做到，究竟「敬師」或「不敬師」要如何做纔好，利弊也各有千秋，誰能做到真正得其「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呢？

誰能遣此的大專學風

好了，閒話少說。現在我們迴轉來檢討一下大專學校的教授、老師們何以會受如此的冷落，這也許與現行的教育制度和學風有絕對的關係。理由和理論太多，一時講不完，最方便而最好的辦法，也可引用一兩個故事來說明事實。第一個故事是在滿清末年稗官野史上的記載，當年張之洞在湖北開始創辦洋學堂的時候，聘請了好多老師宿儒來當「教習」（等於現在的教授）。張之洞第一次對「教習」們講話，其中便有語重心長的兩句笑話，他的意思是說：今天請到的「教習」老師們，都是「袞袞諸公」，希望大家能夠盡心盡力地教好學生。如果不能教好學生，便有負初心，那麼，只好是「諸公滾滾」了！由於這個故事，使我們聯想到舊式社會的「書院」或「家塾」裏請一西席老師的時候，無論家長或代表學生和家長的是什麼地位，都須不厭其煩地親自依禮去請老師。因爲這種禮貌是表示他代表學生們來請老師，不是給恩賞飯喫。所以像張之洞請來的「袞袞諸公」，也便在這種方式之下挽請到的。如果使他一片苦心失瞭望，那當然只有「諸公滾滾」了！

可是這種「尊師重道」的風氣，現在變得沒有影子，不管公立的大專學校或私立的大專學校，只要能夠聘請你當一位老師，不但是天大的面子，而且對你真有恩同再造的衣食父母之概。如果你不聽話，當然就「諸公滾滾」了！所以當一紙聘書，交付郵局寄到你家裏來的時候，應該猶如接捧古代皇帝的詔書一樣，喜從天降。身爲學校當局的負責人，還有誰肯保持中國文化的禮儀，公然地爲學生親自作代表或派學校的大員，執禮甚恭地送聘書呢？尤其有一類私立的某些專校，由一、二個略識之無的老闆們唯利是圖地創辦起來，請老師是當作賞飯喫，那種躊躇滿志、睥睨一切的神氣，實在可使書生們不寒而慄。有的同學們出去任教，碰到這種情形回來和我談起。我說：老弟們，學問的養成，氣節最要緊。做工、當小販的職業，與你的學問並無關係。甚之，「多能鄙事」，更可接近孔聖的心傳！何必一定要做教師呢？何況事實上，一校、一院、一系都畫滿了圈圈，如果夤緣不到，不能得到學校老闆的青睞，縱然「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照樣是投閒置散，無法上得講臺。加以社會安定，一切上軌道，有制度，論資歷和年資的限制，又正好作爲阻擋的藉口。稍有才具的人，不免多有些意氣，於是，討厭意氣而不欣賞氣節，便從此打入了冷宮。或者你教學教得太好，碰到老闆們不高興，同事的妒忌，就明褒暗貶地從此不給你開課。由於這些道理，就引出我的第二個故事。這個故事，還只有兩、三年的歷史，是我親身所經歷的。有一天下大雨，我與某某名經濟學者（因未徵求同意，必須保留姓名），一起候車上課，大家已經半身雨水，不堪其苦了。我說：「唉！現在真是工商業的時代了，能夠講禮儀，『尊重師道』的，也只有在軍事學校方面，還能保持禮貌。他們接教授，有專車，迎送都到家門，始終禮遇不衰。除此以外，其餘不足觀也已。」這位學者聽了以後，便對我說：「老兄，說你不懂經濟，一點不錯。你要知道，現在的學校制度，哪裏是工商業的行爲？其實都是官氣。你應該知道，工商業的要點是『顧客至上』，學生固然是顧客，當老師的也是顧客啊！誰叫你不去辦個學校，也請我這個顧客上去講講課呢！」

家庭與社會的尊師

除了因爲學校的制度而形成「師道」淪夷的因素以外，社會和家庭教育方面，也逐漸地喪失了傳統文化的精神，並不真正重視「師道」。因此與學校制度互爲因果，便使五千年來的禮儀之風，幾乎不絕如縷，這也便是最大的原因。過去的「尊師」，因爲由於某一個人的「傳道、授業、解惑」之關係，所以對於傳授精神生命學問的老師，終身視之如父。現在是以「母校」爲標榜，一切的榮譽，歸之於學校，教師們只是學校中的一分子。縱然有好的老師，一切榮譽，也只有歸之於學校，與個人無涉。而且工商業影響整個時代，老師們按月領薪水、拿鐘點費，等同工商業的行爲，所謂上課也者，也便是出賣知識而已。品行和人格的教導，當然由訓導處去負責，何必多事。教室和講臺上的蛛絲塵漬，自有總務處來管理，不必勞心。教師們沒有固定的休息室，沒有固定的茶水供應，那是活該，又有誰來管你？下了課，趕快要去趕交通車，學生要想在課外請教，實在沒有時間，也沒有地方——辦公室。交通車脫了班，自掏腰包劃不來，這個月的生活預算怎麼辦？至於負責「德育」的訓導，以及具有「內相」之才的總務，是否真能做到與負責「智育」的教務互爲一體，那也只有天曉得。其實，辦「總務」和管「訓導」的，根本各自爲政，誰也沒有做到，誰也沒有責任。因此有許多學生們一離開校門，「怨聲載道，有口皆悲」，更影響了家庭和社會對於學校的輕視。學店觀念和只要有學歷的思想，便普遍流行，誰還管你老師的好不好呢！結果弄得對於個人「尊師重道」的風氣淪喪殆盡，對於學校的情感和信賴，也只是若存若亡而已。講到家庭教育，又使我聯想起幾個學生在外面當「家教」的情形。綜合他們回來談話的結果，便會使人想到現在的家庭教育需要重整，更有重於學校的隱憂。舊式的社會，「家教」便是教師，師嚴而從道尊。現在的請「家教」，是由於社會的風氣，和有些家長們盲從升學主義的促使。大致說來，可以把他分爲三類。第一類：家長們也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不過都是現代人，學問思想，像我們一樣，大多都在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夾縫中。望子成龍心切，更有崇拜自然科學的時髦感，自己不管子女的天才和本質如何，只是要求老師努力向這一方向去教導孩子，有時候自己還順便扮演一下旁聽學生兼督學，往往弄得「家教」老師喫不消地知難而退。第二類：家長們，尤其是主婦們，上了牌桌就六親不認，孩子們學業的好壞——不是學業，只管考試，一切責之於「家教」的老師。學生們考不好，老師便是冤家。學生們考得好，就認爲「這個傢伙」還不錯。第三類：慘了！學時髦，請「家教」，根本就不知道爲什麼？「家教」的老師教完了，還憑特殊的身份，剋扣報酬。有一次，一位女同學當「家教」，碰上了這樁事。這位女同學小人氣大，並不管他的家長是什麼職位和身份，準備到他辦公室去要。雙方是否都有錯，很難說。但的確有一、二人還有要不到的呢！我們試想，「家道」如此，「師道」如此，中國文化怎麼辦？

師道的自尊

講了半天「尊師重道」的閒話，看來好像都是學校、社會、家庭的不對，老師們都是絕對的對似的。其實，人靠平地才站起來，同時也正因爲有了平地才使人跌倒的！現在教育的進步和教育的普遍，比較三十年前，大有天淵之別。但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又加上正在一個「古今中外」的回漩中求復興，求建設。所以忘記了舊的人格修養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是「學問」；新的學識和技能的教育是「知識」。因此觀唸的分野，混淆不清，所以教育的思想和規定就亂了章法。同時人文學科的重要和科學新知識的重要，更沒有完全分別確定其尊崇的地位，因此教育上的科目和課程，一味亂排，輕重倒置。又加上教育的來源不同，傾倒歐洲派和美國派的學人意見互相沖突，因此更使中國文化徒具口號，並無實質的內義可循。這還是對於教育前提的犖犖大者而言。其中的前因後果，各個存有許多關鍵，一時言之不盡。至於從事教育事業的老師人才，捫心自問，是否真爲教育而教育，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多少年來，自有專門培養教育師資的學校和學系，但是有關培養師資的「教育之教育」的問題也還不少。而且最大的原因，從事教育的已經有明文規定成爲公教人員，因此作教師的是否都具有一片赤心爲國家、爲民族教育子弟而任教，或者僅爲個人生活的需要而謀求任教爲職業的，更須大加反省。

中國文化過去的明訓是「學而優則仕」。但是過去的學而優不仕，而專爲教師的真也不少。現在呢？一切受西方文化表層的影響，「學而優則商，商而不優則仕，仕而不優則教學」的，實在是一個罪過的思想。我也親自聽人說過，「有什麼關係，謀不到好職業，去教教書總可以吧！」你想，他有沒有學問不要說，但以此存心而從事教育，其後果不問可知矣。而且教育界的老師，原來如此，又怎樣能夠使人尊敬他爲清高或高尚的職業呢！此外，無論在大小學教師之中，有的教科學的，是幾十年前陳年的知識，絲毫不圖長進。有新書，有新知，便藏起來，不讓學生們知道，有的教文、法的，把圖書館裏好的參考書，借回家後，有去無回，束之高閣。上課堂，大罵天下人、天下事一番，錯的都是別人，不是自己。自我標榜學貫中西，才無今古，餘子碌碌，都是混蛋，可惜你們與人們不懂而已。罵完了，已經去了三分之一的上課時間，然後查問一番，略講一節，訓誡幾句，使學生們爲了學分而忍氣吞聲地鞠躬如也，敢怒而不敢言。比較好一點的，寫黑板，宣讀一下自己的著作，上課、下課，如此而已。也許是時代的病態，形成了人們多多少少都有些肝火太旺，或者是心理變態的毛病。但是以此而言教育，那就要值得我們好好地反省深思了！如果罵人的教育，需要開課，這倒是很好的榜樣。否則，夫子的「溫、良、恭、儉、讓」，以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教育態度，必須要努力去學習做到纔好。非常抱歉，我講這番話的動機，絕對不存有任何其他意見。只是蒿目時艱，爲了國家民族培養後一代青年們着想，所以偶而發出傷時的感慨。希望大家能夠真誠坦率地在「孔聖」面前由衷地懺悔改進。禪學裏有一句話說：「要說話亦錯，不說話亦錯。」現在想來，這也算是我的口過。知我罪我，那就無法計及了。

# 武俠小說與社會心理教育

---亦新亦舊的一代

從文化的立場來說，學術思想爲整個文化的中心。文學是文化的骨幹。而包括在文學範圍內的小說，又是人文思想和文學境界互相結合的前趨。如果從小說的立場來看歷史，全部人類歷史，就是一部大小說。歷史上的人名和地名，都是真的，但有許多事實，大多數已經走了樣，甚之，完全變質。而小說中人名和地名，大多數是假託的，可是那些故事的內容，卻幾乎都是真的。只不過再經文人的手筆，加以渲染剪裁而已。只有幻想小說，完全是虛無縹緲的無稽之談。但是幻想也是人們心理行爲的呈現，而反映出一個時代、或某一地區、某一環境中的人們思想和情緒。而且它對於社會思想的向背，和心理思想的正反，都有絕對的影響。儘管有些自命爲正人君子的讀書人，反對看小說，甚或嫉之如仇，但他的思想和情緒，在不知不覺中早已受到小說的影響。因爲小說會自然地變成戲劇或民俗故事，往往在無形中影響了各階層的心理。

中國小說發展史的思想背景

中國小說史發展的淵源相當久遠。由上古的「神話」而至於班固著《漢書·藝文志》的觀念，已經正式建立了它在文化史上的份量。雖然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裏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到了六朝，神怪小說大興，正好反映出漢末魏、晉、南北朝幾百年來的思想，是「玄學」和宗教性的神奇傳說相互結合的時代。到了唐代，「傳奇」小說大行，由天人之間的玄祕神奇而變爲人物的傳奇，提高了人的價值與功能，顯示唐人文化的質樸之外，而且充滿禪與道的氣息。宋代的小說承接唐人的「傳奇」而變爲「志怪」，反映兩宋歷史社會的不安定，只好作無可奈何的寄託。但因此而形成了元、明以後「話本」與「歷史演義」的先聲。如明代羅貫中以講史爲題材的名著《三國演義》、《殘唐五代史演傳》等。還有以描寫社會現狀，與社會人物的心理爲題材的名著，如施耐庵的《水滸傳》。又以神怪妖魔爲背景的《四遊記》、《八仙傳》、《西遊記》等，都風行一時，成爲傳世之作。這也表現出明代思想的不穩定和逃避現實的狀況。到了清代，「言情」小說與「諷刺」小說興起。前者如《紅樓夢》等。後者如《儒林外史》以及清末民初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等。大致都代表了異族統治下思想和心理的假託與發泄。此外，有關喫喝玩樂的狎邪小說，如《花月痕》、《青樓夢》等，則開啓了民國初年鴛鴦蝴蝶派的「哀情」小說，如《玉梨魂》、《雪鴻淚史》、《芸蘭日記》，乃至如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等的風格。這都是反映時代社會的病態，顯示悲涼愴痛的情調。總之，清代文學，承接唐、宋、元、明之後，在小說方面，形成多方的流派，而且較爲細膩。這些有關中國過去小說發展史的大要，並不涉及近代和現代小說史的種種，只是藉此略述小說所代表歷史文化的時代背景與社會心理的演變概要。而本文要講的只是着重有關「武俠」小說發展史的前因和後果。

武俠在歷史文化中的份量

中國「武俠」，正式見於傳記的，是從司馬遷所著的《史記·遊俠列傳》開始。但是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中，首先引用韓非子的話：「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從法家的觀點看來，「二者皆譏」。也就是說，韓非對於儒與俠兩種人，都有譏評而極不同意。但是單以俠義的精神和俠義道的史實來看，所謂俠義的作風，實淵源於儒墨兩家思想的互相結合，尤其偏重於墨家的精神，而俠義道發展的事實，卻上承戰國時代的六國養士，下接隋、唐的選舉制度，與明、清以後的特殊社會的形式。

但司馬遷最初所稱的「遊俠」，並非純粹以個人的尚武見長。以個人的武技與俠義合併而成爲後世的「武俠」，應當說是《史記》中「刺客列傳」的作風與「遊俠」精神互相結合的事蹟。唐、宋以後，由於禪與道的影響，中國文化的發展，處處進入藝術的境界，而不再是秦、漢時代的情形。所以對於文學的造詣境界，便稱之謂「文藝」。對於武功技擊造詣的境界，便稱之謂「武藝」。明、清以後，文有文狀元，武也有武狀元、武進士、武舉人、武秀才等科第。而且民間迷信科學，甚至有認爲文狀元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武藝超羣的武狀元，或古代武功高強的大將，也就是武曲星下凡。於是，宋明以來的「歷史演義」小說，充滿了這種觀念，而普遍灌輸，影響到各階層的社會。

俠義小說的興起

純粹以個人爲主角，描寫他的武技出神入化，而且有「技而進乎道矣」的造詣。而他們的行爲，在個人方面，類似隱士，對國家、社會或幫助正人君子的事業，卻滿懷俠義，或爲鋤奸懲惡，或爲濟弱扶危，甚之，劫富濟貧，也在所不惜。這是從唐人的傳奇小說開始，例如《崑崙奴》、《空空兒》、《聶隱娘》等故事，便是後世武俠小說的先聲。到了清朝中葉以後，俠義小說糅合了忠君愛國的忠義之氣，把鋤奸懲惡、除暴安良和劫富濟貧等社會不平的心理混合爲一，於是便有文康的《兒女英雄傳》、石玉昆的《三俠五義》、俞樾的《七俠五義》，以及《小五義》、《續小五義》、《正續小五義全傳》。同時又有《施公案》、《彭公案》、《七劍十三俠》等等，相繼勃然興起。但書中描述人物的邪和正以及人情事故的是和非，個人人品行爲的善和惡，都是涇渭分明，一目瞭然。就如我們兒時看戲，看到紅臉出場，就知道是關公一樣的好人。看到白臉，就會想到和曹操一樣的壞人。總之，它的終結，不外是注意正邪善惡的果報。一面藉此而宣泄人人胸中所有的不平之氣，一面也以此而敦正人心，並宣揚傳統的「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的信念。至於描寫武功方面，由《兒女英雄傳》的真刀真槍和拳來腳往的演變，到了《七劍十三俠》，便變爲白光一道，飛劍取人首級於百里之外的境界。看了真使人有神乎其技之感，歎爲觀止。但也顯見小說家筆底的「武藝」，隨着歷史時代的發展，逐漸進入玄妙而神奇的想象意境。倘使從另一角度來看，剛正好反映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東方「止戈爲武」，與西方的「尚武好鬥」的風氣，都從原始技擊和刀兵的運用，而進入神奇的要求。西方文化以物質文明爲本，所以便發展爲槍炮機械。中國文化是以人文本位和個人的精神爲基礎，所以便把技擊進入以氣馭劍，或心劍合一的幻想境界。清末「義和拳」的誤國事件，雖然說是清朝宮室上下無知所造成，然而平時深植人心的劍仙俠客與《施公案》、《彭公案》等的小說故事，實在也是造成這種錯誤的重大原因之一。只不過士大夫者流的知識分子，諱不自知而已。

抗戰期間的武俠小說

精良的藝術是太平盛世以及安定社會中的產品。而宗教、哲學、小說，大體說來，都是歷史變亂，社會不安定中的結晶。自民國初年到抗戰期間，武俠小說隨着印刷的發達，風起雲湧。閱讀武俠小說的風氣，也正如西方人閱讀偵探小說和科學幻想小說一樣的普遍。初期影響最大的，便是向愷然（筆名「平江不肖生」）所著的《江湖奇俠傳》。書中的「武俠」宗師「金羅漢」和「柳遲」，以及主要事件的「火燒紅蓮寺」的故事，不但膾炙人口，而且幾乎成爲家喻戶曉的事蹟。因此拍成電影，而大受觀衆的歡迎。甚之，有許多小學生閱讀了《江湖奇俠傳》就離家出走，入山學道，尋訪明師，鬧出許多啼笑皆非的笑話。跟着而來的，便有李壽民（筆名「還珠樓主」），所著的長篇《蜀山劍俠傳》（又名《峨嵋劍俠傳》）、《青城十九俠》、《兵書峽》等劍俠小說，都暢銷全國而充斥書攤。至於出租武俠小說的行業，也因此應運而興，賺得大好生意。還珠樓主的小說，又長又玄，幾乎沒有一部完工的著作，但卻永遠吸引著讀者的心理。他以曾經學過道家方術的知識，和他遊歷過許多名山大川的見聞，以及多識蟲魚鳥獸人物等的經驗，並脫胎於《神仙傳》與《山海經》的幻想，配合他文白相間的筆調，實在使當時的青年人讀之，即醉心於心靈幻想的雄奇之境，而逃避了現實的苦悶。他如許多學者大師們，也樂此不疲而藉資消遣。就如大家所謂當時的哲學家胡適之先中，據說也是還珠樓主的忠實讀者之一（是否屬實已無法考證）。但著者以後下落不明，據說他客居上海寫小說時，墮落到終日躺在鴉片煙鋪上吞雲吐霧，挖空心思構想情節，而口授助手來筆錄。後來我碰到有些傳授道家方術的人，居然說出自得明師真傳「離合神光」的道法，實在令人啞然失笑而瞠目不知所對。因爲這些法術的名稱，實出於還珠樓主小說中的杜撰臆造，結果竟公然有人信以爲真，豈非不可思議。其次，比較不太過於以神奇相號召，而以中國少林、武當的武術技擊加以渲染的，則有曾經學過國術的鄭證因所著的《鷹爪王》等，卻屬於較爲合理的武俠小說。而鄭證因也是多產的武俠小說作家，大受國術界的欣賞。其他還有些後起之秀的武俠小說作家，記憶不全，姑不詳說。受到這些武俠小說的影響，抗日戰爭期間，川康一帶，公然有人號稱結合劍仙俠客的地方團隊，願意參加抗戰。這種愛國熱情的忠義之氣，實在值得敬佩，但是他們的見解和常識，卻仍停留在「義和拳」時代，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近年武俠小說的演變

抗戰勝利以後，武俠小說逐漸開始轉變方向，其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已成過去，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鄭證因的《鷹爪王》的風靡，也漸見減色。介於劍仙俠客之間的故事，和完全不適閤中國技擊的功夫，而只憑臆測構想的作品，漸漸抬頭。同時，有人以李自成、張獻忠等爲對象，影射中共的奪權行爲，而寫成武俠小說。因此在臺灣，出租武俠小說的書攤行業，就憑這些小說，使得在風雨飄搖、流離顛沛的人們，得以宣泄胸中的滿腔塊壘。當此之時，有一位多年從事文化事業，出版經驗豐富的書俠，他從出版事業的立場而言出版，認爲這些武俠小說都將成爲過去，於是出資請人寫作武俠小說，如《南明俠隱》、《年羹堯新傳》等，便由此陸續發行。自此以後，寫作武俠小說的作家，和從事武俠小說的出版商，以及出租武俠小說的大小書店，便如雨後春筍，應運而興。由此解決了許多人的全家生活問題，同時也因此使一股醉心武俠小說的迷風，吹遍了各階層社會，乃至家庭主婦、大中小學等學生的腦子裏。看武俠小說的風氣，如此之盛，主要的原因，由於時代與社會心理愈加苦悶的時候，「怪、力、亂、神」的小說，也愈受人歡迎。何況一般愛情小說、社會小說，千篇一律，更無傑出的作品出現，早已使人厭於閱讀。

閱讀武俠小說的風氣

但這一、二十年來，國內海外（包括香港方面）武俠小說的寫作與出版，隨便一本便算一卷，精粗好壞，據我所知道和我所看過的，也不下幾千本乃至萬卷之多。因此我常說笑話：「如果說讀書破萬卷的話，單以武俠小說而言，我早已超過此限。」此中並無學問，而且亂說亂蓋的多如牛毛，但在精研正式書本與深思學問之餘，藉此換換頭腦，休息心靈，遮遮老眼，的確還很有趣。後來發現與我有此同好者，還有許多學者教授、出國留學的學生，和若干自命「才高於頂，眼大如箕」的文人名士。至於一般青年學生，以及勞工朋友們，不但人手一本，而且裝滿兩個褲袋，都是全般武俠。有一天，我經過城中公園，看到前任警官學校的校長。獨自一人坐在樹下看書。我心想，他真用功勤讀，大概又在研究《四書》或《論語》吧！爲了不忍心打斷他的讀書境界，所以不好招呼，只輕輕地從背後繞過一看，原來也在聚精會神地看武俠小說。這一時代，中國人之所以喜歡看武俠小說，就相當於美國政壇的重要人物，藉着閱讀偵探小說或科學幻想小說以調劑心神。東西雙方的這種情況，也可以說都是時代的心理病態。然而俠風所至，還不止此，多少年來，任何大小報紙刊物，如果去掉武俠小說與描寫黑社會的小說，則幾乎可以使報紙刊物的發行數字直線下降。這股十里刀風，實在有使人不寒而慄之感。

武俠小說寫作的泛濫

但是武俠小說的寫作題材，經過二十年來的挖掘，的確都成陳腔濫調，而更無上品出現。偷襲《蜀山劍俠》、《江湖奇俠》、《鷹爪王》的內容，寫光了。繼而外搭包情，配合西洋偵探小說與科學觀唸的用毒和解毒，以及易容化裝，利用物理作用等幻想也寫完了。於是跟着而來的，便是好勇鬥狠，幫派復仇，一言不合就拔劍而起，流血五步，在所不惜。或睚眥必報，毫無情理。這種滿懷個人恩怨，或即將心理變態的病態武俠，寫成主角，無形中給予青年以極壞的小說教育，關係極大。至於其中不通地理，不明地方風俗，不知歷史時代的生活方式的寫作，實在不勝枚舉。於是華山的絕頂險處，可以騎馬，而把崇山峻嶺的地方，卻描寫成爲大湖深澤。這些不經之談，自然都不在話下了。除此以外，還有亂講佛、道兩家的氣煉脈之術，同時又把東洋日本武士道的抽刀拔劍的手法，和東洋日本式的打鬥拳腳，變成國術的招式。真正中國武功的技擊，反而毫無所知。甚至把瑜珈術引用到武功裏去，雖然別有精彩之處，但認爲這些便是中國的正宗技擊武術，那就更爲可笑了。目前武俠電影流行，所有舞弄刀槍劍棒的武術技擊，一半以上都是東洋日本的武士道手法，在行家眼中看來，回顧一下我們國術界的情形，真有啼笑皆非之感慨！可是這一流的電影不但大受男女老幼的歡迎，而且多少學者教授們，也都醉心欣賞，而大爲擊節讚揚。這不僅是中國文化中「武藝」的悲哀，而且還應該說是中國文化真正衰落的一劫。但是，這些現象，也正表示出人心的沉悶，時代的哀愁，大家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藉此一消胸中塊壘，並不在於中國「武藝」文化的真假和是非了。

武俠與社會教育

武俠小說在今日國內的風氣，概如上述。而我們負責文化者不但完全外行，甚至也無法領導。幾年以前，一位有關人士曾和我說，應想出一個對此稍加限制的良策纔好。因爲這種風氣，在無形中，給予社會青年一種極壞的教育。我說：「天下事往往存在着許多矛盾。」教堂的對面開設了「綠燈戶」，最高學府的門前，有人大兜看黃色小電影的生意。一面防範管制「太保」、「阿飛」的好勇鬥狠。一面大量開放粗著濫作的小說，以及電視上極力播演殺人不眨眼的西方牛仔，以及笨拙萬分的摔角鏡頭。誰又願意正本清源從事社會教育。何況「智、勇、辯、力」四者，絕非限制所能生效。只有疏導，纔是辦法。譬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如果認爲武俠小說影響了青少年的行爲，何以不培植寫作武俠小說的名家們，爲後一代着想，而灌輸一些真正的中國文化，如人倫道德、俠義忠勇等精神和事實。同時再好好研究一下中國文化的「武德」以及真正中國的南北派和其他名家的技擊的「武術」呢？禁止之弊，甚於防範。疏導之功，利於無形。小說之功，過於教育。人謀之臧，可以造成良好的風氣。好的武俠小說，對於培養國家民族正氣的效果，也同樣有不可思議的力量。雖說未必盡然，卻未必不是當前文化的急務。

# 老文學和新文藝

---亦新亦舊的一代

近來司法界提倡新風氣，改用語體文書，一切訴訟文件和法官們的判決書，都要儘量採用語體。這實在是司法上賢明而便民的改革，是值得喝采的。但因此有些人錯以爲這是現代六十年來第二次的白話運動。大學裏中文系有新文藝思潮和國文教授方法上的爭辯，便引起一些學習中文和關心中國文化同學們的彷徨迷惘，莫衷一是地羣相徵詢意見。

公文語體化的歷史淵源

關於前一問題，我認爲中國三千年來的文化史上，有關政府文書的文章自有文獻可徵的，大多數都是用語體來書寫的。我國文化史上第一部的政治史文獻，當然是以《尚書》爲首。我們現在來讀《尚書》，一般人都認爲它是古文。這種所謂古文的觀念，應該是對時代距離先後所下的定義。事實上，《尚書》裏收集當時歷史上的文告或記載史事的資料，大多數都是當時的語體文。即如《周易》一書的卦爻詞句，大多數也是當時的語體。秦、漢以後，有關政府法令的文辭，從許多方面來看，多數也是當時的語體。當然不能只以西漢時代賈誼的《過秦論》，或東漢末期諸葛亮的先後《出師表》作標準。即使就把《過秦論》和先後《出師表》來作規格，我覺得其中的文辭語句，有許多地方，仍然是採用當時的語體。我們現在叫它是古文，這個「古」字，應該說只是對於歷史時代的劃分，並非就是亙古不變的定義。在魏、晉以後，文學的風氣瀰漫，因此經歷南北朝三、四百年來的公文辭章，的確偏重於駢儷的文學化了，比起漢代，更缺乏普及性。所以到了初唐，由唐高祖李淵開始，便下命令改革公文，不許有太過駢儷的文學辭藻而妨害事實的敘述。後來唐代的文風復古，不但是初唐政治上開其風氣之先，事實上也是文運興替的必然趨勢。韓愈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復古運動，並非如我們現代人心目中的復古，實際上，正是恢復當時讀書人——知識分子的文學語體化。當然，在這裏須要注意，古代的教育並不普及，所以能夠以寫作文辭來表達意識思想的，仍然只屬於少數讀書人的事。宋、元、明、清以來，不但在公文上多數是採用語體化，即使如「四朝學案」中的儒家講學的記載，也都是採用語體。所謂「語錄」的風氣，便由中唐的禪宗和宋初的理學家們所開始。並且翻開歷史上歷代奏議一類的文章，有關政令和事務性的敘述，幾乎都用語體來表達，從來沒有人認爲那些缺乏文學格調的「奏議」，沒有歷史性的價值。只有在清朝中葉之後，由於少數幾位深於文學修養的人做了地方官，遇到有些「官司」上的判詞，便以文學的風趣，大玩其花樣，如袁枚、鄭板橋等人的幾件判詞。可是此風一長，到了後來紹興師爺的手裏，便積習成規，在刀筆之間，大玩其有筆如刀、精細雕蟲的筆墨花樣。於是《樊山判牘》一類的文章，便成金科玉律了。不過，這種風氣在滿清中興的時代，已經稍有變革了。民國以來，公文的改革，在有形或無形中，也有過幾個階段，現在在司法上又正式提出採用語體，雖然說是革新，如果在中國文化精神的立場而言，應該說這正合於中國文化固有精神的復興運動。

白話文和中國文化的命運

由於前面所講的歷史事實，推演開來，說到後一問題，無論在文學上或文化上，所謂的新文藝運動，我認爲大可不必操心，此事不運而動，一代自有一代的必然趨勢和結果。例如前面講過在秦、漢時期的文學和文章，雖然在三千年以後的現在，好像一仍未變。而事實上，秦文、漢文，已大有不同之處，拿它和春秋戰國時代比較，有迥然不同的特點。唐代和宋代的文學文章不同；明、清和近代的文學文章更不同。從文藝上來看，漢代的「辭賦」，唐代的「詩」，宋代的「詞」，元代的「曲」，明代的「小說」，清代的「聯語」等等，任何一個時代，都自然而然地有其新文藝運動的特色。至於在某一時代，因爲某一人的提倡使文風不變，乃至使文運改變了方向，其實是他在那個時間、空間恰好當時當位，便很幸運地成爲推動這個波瀾的焦點。事實上，這種風氣，到了某一時期，即使不由某一人的推動，它在事前或當時，也早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風氣，勢在必變而事在當變了。例如唐代的韓愈，現代的胡適，也都是適逢其會的人物。老一輩的朋友中，有人大罵胡適、深惡痛絕其提倡白話文，認爲他是千古罪人。事實上，平心而論當「五四運動」的先後時期，即使胡適不提倡白話文，也必然會有人要出來提倡的。就是沒有某一個人出來提倡，白話文的替代古文，也會自然不運而動的。胡適先生卻在當時自我標榜了龔定盦「但開風氣不爲師」的一句話，真是適得風雲際會，相當地「幸致」而已。

「五四運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史上，功過很難說。只就提倡白話文的運動來講，對於六十年來的現代，功過也無法衡量。至少，因爲白話文的提倡，中國的教育因此而更容易普及，一般國民的知識水準因此而提高。但是五千年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卻因此有被攔腰截斷的危機。我們追溯六十年前，所謂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的遺產，都蘊藏在古典的書籍中。這些古典書籍，都用古文寫作的。後來的青年，從白話教育入手的，對於古籍中的古文，沒有基本的修養，不但自己不會寫作那些文章，根本就看不懂這些古籍，因此而奢談中國文化，問題當然就不簡單了。於是，有些愛護中國文化之士，以衛道者的精神，極力提倡讀古書，寫古文，憧憬着舊日的讀書方法和舊式的讀書趣味。但是歷史猶如東流的逝水，一去總不回頭，雖然這些衛道者其心可敬，其志可嘉，到底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反而招來許多無謂的困惑。曾經有一位青年同學對我說：「歷史已經走向電腦時代，有人可以專用注音符號替代文字來表達語言和意識思想，居然還有人要復古提倡古文，真是不可思議。打字機的功用愈來愈發達，居然有人還要拚命地提倡寫毛筆字，真是不可想像。」當時我聽了也有啼笑皆非之感，便說：「原子能的威力可以消滅人類於無形，居然還有許多人要求做人，豈非更是匪夷所思嗎？世事都在對立矛盾中交織成爲人文文化的歷史，老弟臺既不必過於憤慨老前輩的憂傷，老朋友們也大可不必爲後一輩嘆息。」

新文藝運動中白話的古文

其次，我們都知道白話文的新文藝運動，已經推行了五、六十年，它的效果已如前所說，但是它的價值須另當別論了。當時大家需要推行白話文，大半的原因，是受到西方文化東來的影響。六十年前，鑑於西方各國的富強康樂和堅甲利兵的威勢，於是暈頭轉向西方去學習科學的方法和民主的制度，窮根究底，認爲他們教育與知識的普及，是靠着語言和文字一體的作用，同時回顧我們當時的民智閉塞，風氣不開，也正坐此病，所以便提倡了白話。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社會，語言總會跟着時代而變更的。甚之，語音也有因時代而變革的。依中國文化的習慣來說，三十年算作一世。語言往往經過三十年的一代而有所變動。因此西方各國的文字和語言合一的學風，便在語言和文學歷代變革中產生了重大的問題。我們細心研究，便可看出西方各國的文化書籍，過了一、二百年的文章，大多數就非專家看不懂了。

同樣的，我們古代的白話文章，如元、明之間用白話文所寫的小說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以及清代的《紅樓夢》等等的書，它在現代青少年看來，完全是白話中的古文了。其次，我們只要拿出五、六十年前的報章雜誌來對照一下，當時人所寫的語體文、白話文，也早已生硬地成爲現代的古文了。一代白話文大師胡適先生的早期作品，何嘗能夠外於此例？反過來說，我們再看一看現代青少年們的白話文，甚之，二十多歲剛從大專畢業去當教師的，親自研究一下更下一代的白話文，如不拍案驚奇，搖頭嘆息，那才真是奇怪呢。至於現代汗牛充棟新文藝的著作中，夾雜「意識流」和「存在主義」的文學作品，有的超越冥想，比禪的文字更難懂，那也是司空見慣的常事。總之，舊的被推翻了，新的文藝毫無基礎，剷平了五千年來的基石，想憑空摸索去建立空中樓閣，實在需要仔細思量，慎重考慮。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呢？

古文的勞苦功高

中華民族的文字結構，我們是值得自豪的。用中國文字所構成的古文學，也是值得自誇的。我們姑且不從「六書」和「訓詁」等來說中國的文字和文章的價值，首先應當瞭解我們祖先的文化精神，在任何方面，都是「寓繁於簡」的，上古的文字，大多以象形開始，同時又需要以最簡單的動作，把它雕刻在獸骨或竹簡上面，因此更需要言簡而含義多方，以便於書刻。由於這種文化精神隨着時代的擴展，便構成了我們所謂的古文體裁。更明白一點地說，由於這種古文體裁的文學，便使文字和語言完全分開。同時也使文學詞章超然獨立在時間、空間之外，因此，保留了五千年的文化思想。先人與後世的意識，完全不受時代環境的變革而有所阻礙難通。換言之，依照過去舊式教授文字文學的方法，只要真能教，真能懂的，不過花費青少年時代一、二年的時間，便學會了這種寫作文章而統率各種語意的作法，然後終生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當然，這種教學方法，勢必要包括小學的「六書」和「訓詁」等的方法。如果硬要把「訓詁」和小學「六書」視爲畢生學無止境的課題，或者像現在一樣，到了大學或研究所博士班裏纔開始研究，那就很難說了。至少，純粹從舊式教育來講，這並不完全是在浪費青年寶貴的光陰。瞭解了這個道理，我們便可知道中國五千年來文化遺產的古典書籍，數目並不太多。中國字典包括的字數也不多。而且自古以來的學者，如果不作文字學的專家，真能認識了二、三千個字，便足夠應用發揮而有餘了。懂了中國文字的運用以後，就可瞭解古文的一、二個字便包括多方的意思。如用現代的用語來解釋，或許要用十多個字才能說得清楚。例如我最近答應翻譯《周易》一書爲白話文，當我着手工作以後，才後悔自尋苦惱。因爲我看《周易》卦爻的詞句，本來都是語體，非常明白，若要把它翻譯成現代話，那可真夠麻煩了，有時候一字要變成好幾個字的句子，而且還要加以解釋，即使如此，也可能還不夠明白。由此聯想到現代出版的書籍，幾乎有蓋古之多，好像真是知識的爆發似的，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說只是文化退化的貧乏現象而已。

更上層樓的負擔

可是話說回來，再進一步的新文藝運動是必須的嗎？我倒認爲是極須的，不過，不能弄錯方向就是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溫故知新」，如何整理五千年文化的遺產，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英而融會貫通，併發揚光大。只以文學來說，我們到目前爲止，就沒有辦法創作一種文體，足以概括古今而永垂式範的。老實說，所有專心一致搞新文藝運動的，大體上都和我們一樣，不是博古通今之士，甚之，連傳統文化遺產的邊緣都還未摸着。只知隨着時代的潮流，漂流在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文化邊緣，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已。再新的新文藝，必須是真正切合中國文化的新文藝，那恐怕不是目前所搞的新文藝運動所能負的艱鉅大任。

當我在說這些觀點的時候，恰好看到十月一日《聯合報》第三版上登載了一篇專訪，報道國內數學界的學者專家們，正發起一項「科學中文化」的運動，他們已開始用中文寫數學的教科書，期以十年有成，達到「科學在中國文化中生根」的目的。看了以後，情不自禁地對他們肅然起敬。這一作爲，才真是中華民族、中國文化的重要工作。我們鬧了幾十年的「科學」，到今天才開始中文化，比起日本雖然已遲了幾十年，但到底是我們學術教育界的一大覺醒。迎頭趕上，也許勝過別人。但我希望其他如醫學、天文、物理等等學科，應該也會如「風行草偃」，慢慢地跟蹤而起。可是其中最困難的前奏，恐怕還是再新的新文藝運動吧！

# 人性與人慾

---亦新亦舊的一代

儒家學說中的人性善惡觀

什麼是人性？原始的人性，究竟是善的，或是惡的？人慾是否就是罪惡？這都是中西哲學上的大問題，也是人類思想史上幾千年的懸案。

中國哲學史上關於人性善惡的爭論，已經二千餘年，初由孟子特別提出的「性善」說，連帶批判告子論「性無善惡」的觀念，稍後又有荀子的「性惡」說，與性善的觀念恰恰相反，於是便成爲思想界爭辯的論據。再後，由於佛學的傳入中國，談心說性，便成爲哲學辯論的中心。宋、明的儒者——理學家們，內在接受佛家、道家的思想，於是人性的善惡問題，也就成爲理學論據的要義。大體說來，理學家們，大多都是秉承孟子的性善說，認爲「人之初，性本善。」人之所以爲惡，都是後天的習性所養成；後天的習性和人慾又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要反省克念，去盡人慾，使天理流行，才能恢復人性本來善良的面目。

孟子與告子的論辯

孟子提出「性善」論據的重點，認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便是人性本自良善的有力證明。而且肯定地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他所指出人性中本自具有「惻隱、善惡、恭敬、是非」之心，做爲證明，是有相當的理由。但以水就下，肯定形容人性的本善，確實有所商榷的餘地。

同時，孟子提出告子等對於人性「無善無不善」的批判，使我們知道告子等學說的大概。如說：「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至於告子論據的重點，他認爲「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告子的理論，是否正確，暫且擱置。但以孟子所提出告子的這些話看來，它與現代流行西方文化中的機械心理學，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且更有趣的，告子一時大意，不懂論辯的理則（現代人所慣稱的邏輯思考的方法），當時被孟子的縱橫才氣蓋住了，當場喫蹩。如說：「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現在我們讀了這節書，非常明顯的，發生兩個重要的問題：（一）告子所說「生之謂性。」定義不太詳盡。因爲古代語文過於簡化的關係，或者說，可惜告子不懂「因明」的法則，語焉不詳，所以並未表明自己真正的主旨；是指有了生命活動能力的便叫做性呢？或是說性是與生命同時俱來的呢？（二）孟子善於辯論的方法，他抓住了告子這個弱點，就說：既然「生之謂性。」那麼，等於白與白是一樣的囉？告子說：是。孟子跟着這一句「是」的答案，就說：那麼，白羽的白，就等於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等於白玉的白嗎？告子又答：是的。孟子因此便說：那麼，狗的性，就等於牛的性；牛的性，就等於人的性囉？孟子這一論辯，相似於「因明」（印度古代論理學的名稱）引用比喻的方法，以此難倒了告子。其實，平心靜氣地說，孟子所用的比喻，幾乎是有「引喻失義」的嫌疑。告子一時懵懂，無理可申，只好就此喫蹩，至於本來的人性是善是惡？畢竟還是懸案未決。

荀子的性惡說

到了論爭末期，荀子直截了當地提出性惡的論據，恰恰與孟子的觀念，成爲強烈的對照；但要注意孟子與荀子，都是歷來公認爲戰國時代的大儒，只是儒家的分號，並非別處的雜貨店。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嚷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根據荀子這一節理論，它與西方文化中的唯物思想、經驗學派、機械論者似乎都有相同的觀點。但在此，只是指荀子對於性惡說這一觀念而言，並非以偏概全，認爲荀子的整體思想，都是如此。如要研究荀子通盤思想與學術，必須熟讀《荀子》全書方可，切勿因噎廢食，顧此失彼。

揚雄的善惡混雜說

再後，到了漢代，揚雄便提出人性的善惡混雜的觀念，如說：「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也與？」揚雄這一觀念，上半節等於是告子思想的變相。下半節引出氣和人性善惡的關係，又是孟子思想「志者，氣之帥也」的觀念。這真是道道地地的善惡混說，好像很有道理，嚴格推究起來，到底言無所宗。

王陽明的見地

等次以下，歷漢末、魏、晉、南北朝，而到唐、宋，理學之儒，崛然興起，號稱上接孔、孟的心法，下開百代的宗師們，或以性即是理，理即是性；或以理與氣的二元而論性，闡說心性的玄微，愈說愈有性格，也愈使人迷離。再進展而到明代，有了王陽明的學說，對於性的問題，倒下了明確的定義，有名的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但是，問題解決了沒有？不但沒有真正解決了問題，而且陽明先生四句教的本身，卻又產生了矛盾，他縱有晚年定論來補充，仍然有欠透徹。陽明先生既然肯定了性的體是無善無惡的，善惡只因意動而分，這便是第一重矛盾。試想這個能動的意，是否是由體上起用？如果意是由體上起用的，那麼，體中本來就應含藏有善惡的功能，何以說體是無善無惡的呢？如果說：意不是由體上起用，那麼，這意又從何而來？而且它與無善無惡之體對立，豈非是二元對立嗎？同時，能知善知惡的這一知，又是否便是體上的良知呢？這又是第二重矛盾。如果是的，確見這個「知體」或「體知」，本來就含藏有善惡的功能，何以說：體無善無惡呢？?且有了一個意，又有了一個知，都是體上起用的功能，究竟是三元一體——「一氣化三清」，或是三元對立的呢？至於「爲善去惡是格物」，那是行爲倫理的道德修養原則，自然無可疑議。

我們大致瞭解了以上所舉出中國哲學史上，有關儒家對於人性善惡論的一些重要資料，關於人性究竟是善是惡的爭端，已經約略明瞭了大概，如果肯下好學深思的工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便應當知道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了。西方的學者，或傾心於西方文化的學者，認爲中國沒有真正的哲學，也可以在這些問題上看出了端倪。

界說不清的癥結

其實說了半天中國哲學史上人性善惡觀爭辯的要旨，其中最大的關鍵，就是界說不清，大家只從建立行爲道德的要點上爭論人性本善本惡的定見，並沒有先把行爲道德的問題，暫且擱置一邊，先行嚴格探尋所謂人性的本身，它究竟是什麼？而且更重要的界說關鍵在於：大家所說的人性，是先天——形而上——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性？（它是否存在？又是這一問題中的問題。）或者是指有了生命以後的人性？應當先下一個研究討論的範圍，纔好對此問題有進一層探討的線索。總之，上自孟夫子開始，下至明、清以還的理學大儒，他們所討論人性善惡之說，都是以有了生命之後的人性行爲作基準，而由此推測到先天——形而上的人性本體論，界說混淆不清，弄得一頭霧水，因此論說紛紜，便成爲衆盲摸象，各執一端的流弊了。如果以有了生命以後的人性來說善惡，孟子、告子、荀子、揚雄，乃至王陽明諸家的說法，都有理由，可以成立。但可惜的是，這都是與遺傳學、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等有關的問題，至於和真正哲學的本體論，則了無牽涉。以之而言行爲心理學則可；如果就以此而論形而上學，還大有一段距離，實在需要細加審思探尋。

希臘哲學對人性的知見

提起西方文化，科學在現代的地位，具有決定性左右一切學術的權威。但到目前爲止，無論科學如何的發達，所有代表西方文化的歐美文明，仍然還沒有跳出宗教和哲學的範圍，尤其是希臘哲學和「新舊約」的教義。

講到希臘哲學，當然不能不追溯蘇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蘇氏的生平，正如中國的聖人孔子所說樣——「述而不作」。要想研究他的思想學說，必須要從他的高足弟子柏拉圖（Plato）的《對話錄》中尋找他的線索。蘇氏雖未明確講述人性本來的善惡問題，但在《對話錄》中可看出他早期論述的部分思想，似亦主張「人性本善」，如「普羅太哥拉斯」（Protago-ras）篇中的記錄，蘇氏認爲「道德與智慧初無差別，而邪惡系由無知而來。」「正義、節制、勇敢等……無有不同於知識者。」這應當是西方思想史上首次出現的「知德合」的見解。其次《對話錄》「曼諾」（Meno）篇中，主要說明「知識由於記憶而來」。由此可見蘇氏認爲人性本自具有善的真知灼見，本來的真知應該爲善，人之所以爲惡者，由於沒有知識，致使判斷錯誤。這也便是西方哲學重視知識即道德之善行的主要源流。

至於柏拉圖的思想，對於人性的理論，雖有理、情、欲三分的論說，而且認爲理性即爲人性，它是靈魂中不朽不變的體質，情與欲，則可朽可壞(見《對話錄》「菲多」(phaedo)篇及「國家」（State）篇)。由此可見柏氏仍然繼承其師蘇格拉底的學說，認爲人之理性本來是善的。

到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手裏，擴充其師柏拉圖的人性靈魂的三分說：「植物靈魂」司營養，「動物靈魂」司情慾，「人類靈魂」司理性。道德，即爲協調這三者，使它逐次達於至善之目的。如何在行爲上確實使三者達到理想的境界，則有賴於知德與行德——實踐之德的結合。總之，以理性控馭情、欲，爲德行的究竟。而理之馭情，又須賴經驗與事實上的抉擇，以及習慣的養成。亞氏雖不明白涉及人性本來的善惡問題，但他認爲凡物之善，其目的在求實現的特性。人之善，不僅在於動植物的二種靈魂，尤其重要的，在於理性特質的實現。由引可知亞氏，亦認爲「人性本善」，其至善者，乃由於習慣而來。這便是亞氏的思想，着重於經驗論的色彩，使善惡兩種極端尖銳地對立，爲之緩和而成爲有中性化的作用。所以有人批評，認爲他所謂經驗事實的抉擇，還不及後世西方倫理學中「自由意志」的最高境界，這又屬於另一問題，不必節外生枝去討論它。

西方宗教文化的人性問題

此外，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文化中，如果不從宗教的經典「新舊約」開始研究，根本無法探討西方文化的淵源所自。《新約》姑且不論，在《舊約》的「創世紀」中，誰也知道神(耶和華)創造了天地以後，又按照他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人。但是，夏娃、亞當偷嚐了「伊甸園」中的禁果，如果人性本善，又如何會爲不善?雖然它沒有提出人性本善本惡的專題，但由「創世紀」中敘述「伊甸園」的番旖旎風光，便已看出人性本善的主旨；如果人性不是本善的，即使修善作義人，也無法返還到原路，鑽進窄門，走回上帝的天堂了!由此看來，便可爲它下結論：「可憐禁果偷嘗後，情慾由來最害人。」對嗎?講到這裏爲止，人性究竟是善是惡的問題，還沒來得及作結論，更沒有提出中國文化中道家與佛家有關人性問題的要義，便又引出人慾或性慾是否是惡與罪的問題來了!

有人認爲欲非惡

有關人慾的問題，我的同鄉黃美煌先生，曾經寫了一篇《欲非惡》的文章，又不恥下問地當面和我討論。現在說句道歉的老實話，我真是既忙且懶，曾經託人要找這篇文章，但他始終未替我找來，所以直沒有拜讀這篇大文，當時更無辭以對。現在講到人性和人慾的問題，同時又扯到希臘哲學柏拉圖理、情、欲三分的說法，不得不臨時轉向，先把中國儒家學說有關情和欲的觀念，稍加解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引用中國文化，本來便是自己的家產，也用不着分家得太清楚。但如正式引用到學術上去，總要留心點纔是。我們常會聽人說孔子說的「食、色，性也」這句話。其實，錯了，這句話，是告子所說，而在《孟子》書上記述出來的，孔子並沒有說過這句話。只在《禮記》的《禮運》篇中，孔子曾經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可惡的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孔子與告子的話，語句雖有不同，但同樣的，都是承認飲食與男女的色慾，都是人慾或人心的大端。而且要特別注意的是：告子在這句話裏所謂的「性」，並非代表他自己所說人性猶杞柳、猶湍水的本性，實在是代表原始人慾本能的屬性。不信，可去仔細研讀原文便知。那麼，孔子、孟子、告子，他們認爲人之大欲，究竟是不是惡的呢?這可實在不易隨便論斷。在上文引用孔子的學說，夫子已經說過：「人藏其心，實在不可能從外表去測度它，因爲美惡皆在人心之中，不能夠從外表的態度上看的出來，如果想要貫的探求它的究竟，除了禮的作用，那裏能夠呢!」同時，在《禮運》篇中，孔子又把人之大欲，歸到人的「七情」之內，所謂七情，便是「喜、怒、哀、樂、愛、惡、欲。」因此便產生後世的儒家，有了性和情的理念。自漢懦董仲舒以次，姑且不一一列舉，最爲明顯的，到了唐代李翱著《復性書》時，便確切地提出「性」、「情」的說法。至於欲的觀念，約略而不重要。而「欲」，是否就是罪，且待下文研討。

人慾與天理說

此外，更有趣的是于思所著的《中庸》裏，除了只提到「喜、怒、哀、樂」以外，從來沒有提出他祖父孔子的「七情」，故無怪考據學家們，對於這幾本書的著作，懷疑到有問題了。考據的事，不是我們要講的範圍，暫且不管。因有孔子、孟子、告子提出的「人性」與「性」和「情」、「欲」等觀念，到了宋儒的理學家手裏，因襲了佛學的觀念，採用《中庸》的「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主旨，於是強調去人慾，存天理。「人慾淨盡，天理流行」的說法，便普遍傳習，成爲宋儒儒學的中心思想。其實，以此而言道德的修養，則爲不二法門；如以此而言形而上道的人性本體論，則當再加商榷。但這些思想學說，卻與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何其不謀而合，多麼相近。同時，我更懷疑康德的學說，某些地方，有受宋儒思想影響的可能，所以我曾經建議位專攻康德之學的學者，留意這個問題。(本文有關學說，不詳引原文，希望青年同學們，能夠由此拋磚引玉，啓發慧思，肯去研讀原典。)

儒道兩家共通的觀念

自從宋、明的儒者——理學家們，提出了「天理」與「人慾」的問題，爲中國文化的倫理哲學，與行爲哲學方面，奠定了個名辭簡捷易曉，而內容充實的普遍道德意識——便是後世盡人皆知的做人和做事要憑「天理良心」的觀念。但也很明顯的，認爲「人慾」的作用，多半是屬於罪惡的面，所以去「人慾」存「天理」，便是理學的基本學問。理學家們既然自認是上接孔、盂的心法，我們對此又不得不再追溯到先秦之際足以代表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看看他們對於「天理」與「人慾」的看法。

上文曾經扼要提引到孔子對於「情」和「欲」的觀念。如果再要深入點提引這些資料，便需要尋找經過孔子所整理的古籍文獻，例如《禮記》中的《樂記》，曾有記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曲禮》說：「欲不可從。」都很明顯地說出「人慾」的動向，而認爲它是可怕的，是不可放縱的。至於孔子本人曾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並非直接認爲「人慾」便是「人性」本有的正當行爲。而只是說明人之所以爲人，便自然而然地會有飲食和男女等基本的「人慾」，所以他又說：「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由於「人性」有這些基本的「情」和「欲」，可能趨向於自害害人，甚至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必須要注重人文的教化，於是制禮以防患未然，作樂以調整性情。「三禮」的精神即由此而訂定，《春秋》的大義，也由此而建立，爲求還於「天性」之初的禮、樂之教，也由此而出發。

至於老子，除了着重於闡揚傳統文化的道(體)和德(用)以外，並未確切提到「人性」和「人慾」的問題。除非把他所說的「道」字，強行拉到「人性」和「天性」的範圍來講，但總不免有點牽強的嫌疑，但是老子卻提到「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的觀念。在他簡短的五千文中，只要有了這觀念，便可瞭解他所認爲的「人慾」，也不是個好東西。至少，它是「犯意」的先驅，受到所「見」的教唆而成爲罪亂的主犯。所以他便提出「少私寡慾」，作爲修養的方法和目的。此外，只有《易經》的《系傳》裏，提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兩句，便成爲後來懦道兩家的共通原理。因此，由先秦而至現在，儒、道兩家對於「人性」和「人慾」的概念，大體都是「同出而異名」地在應用了。

大乘佛學的原始人性本淨論

中國文化思想中「天性」和「人慾」的問題，在傳統的微茫混淆中，歷經秦、漢、魏、晉到了隋、唐之際，因有大乘佛學思想的加入，便廓然大放光明，截然確立形而上(先天)的「性理」本元，與形而下(後天)的「人慾」界限，建立個理論完整、體系井然的思想。但我在這裏所說的大乘佛學也便籠統地包括了禪、密、天台、華嚴、唯識、三論、成實宗等的宗綱。但取其要義，變更它的名相而言，並非概約大乘佛學的整體思想。

大乘佛學思想認爲原始的人性，本來便是光明清靜，含容萬象萬類，極其圓滿，而與宇宙萬有共同體。當它在光明清靜的元始之初，既非有善，亦非有惡，所謂善惡，都是人爲後天的觀點，不足以言先天的元始「本性」。如果勉強以善惡來論，應該稱之爲「至善」的，或「純淨」的，方差可比擬。但極其圓滿的光明清淨的本然之性，由於明極而忽然緣起無明陰影，由此動則易亂，於是便生起天地宇宙與人類萬象了。從此由於無明的污染人性，愈動愈亂，愈亂愈動，因而迷失它本來的清淨圓明，堅固地執著「我執」與「愛慾」，於是便形成分爲段落的死生生死，而構成人世間永無休止的分段生命現象。基於此，所有大小乘佛學的基本精神，都是要求「人性」的自覺，破除由執爲小我的後天「我執」，而返還到先天無餘大我的自性清淨。努力修正由「我執」、「愛慾」所起的種種錯誤心理和行爲，滌除由惑亂心理所構成人世間的煩惱苦果。

佛學所有的經論即由此基點出發，因此它薄視物質形器世間的所有，發出衆生同體之慈以及無任何條件之悲心，呼召衆生超越形質，返還形而上的光明清淨，歸到非善無惡的圓滿自性之境界。例如著名而普遍流傳的《法華經》、《楞嚴經》、《楞伽經》等，均以此爲中心。又如《大涅槃經》以「常」(永恆)、「樂」、「我」(無小我的自性本元)、「淨」等四象說明白性的圓明清淨。而唯識法相的經典，則以剖析爲「愛慾」所污染的心、意、識的陰暗面，指證出元始光明真淨的本來。至於《華嚴經》卻以宇宙萬象本爲體，融會形而上道與形而下的物質世間，指證自性的體用互通，而達於光明清淨的圓極。《般若經》等，便是直指智慧的自覺，而超證於形而上道的捷徑。而禪宗心法的證悟，也就是證此事，悟此理。

隋唐以後佛學與儒道的互注

中國文化思想因爲隋唐之際，有了大小乘佛學思想的加入，於是魏晉以來《易經》、《老子》、《莊子》的三玄之學，更加發揮它精義的深度。唐、宋以後《易經》的理、象、數之學所突出的「太極」涵三、陰陽互變的哲理，也由此而充盈。至於曾子所著《大學》的明德致用，于思所著《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等觀念，也由此而益增光彩。因此宋儒襲取佛道兩家的思想，而代之以儒學爲中心，存「天理」去「人慾」的修養方法，也由此創格。而我們也由此得以瞭解孔、盂之說，認清歷來諸儒對於先後天的「人性」與「人慾」之司的界限，而瞭解原來頗多混淆之處，以及並未劃清界說的弊病。

欲非惡與惡之前驅

綜此以觀，原有與生命俱來的「欲」的問題，它究竟是惡或非惡呢?我們可以說：「欲」並非全是惡的。但「欲」很可能爲惡的前驅，那是毫無疑問的。佛說狹義的「愛慾」爲生死業力的根本，也就是教人認清「愛慾」，實爲自私所生的過患，而須防患於未然。《曲禮》所謂「欲不可從」，也正同此意。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中的一幕，何嘗又非此意。

至於再把「欲」歸納到男女之間狹義的「愛慾」範圍，而且認爲「欲」就是罪惡，那是宗教性絕對道德的觀念。宋明理學家也襲用了這嚴肅的面，例如朱熹所說「世人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就是由這嚴肅人格的觀點而出發的。

至若《論語》中記載孔子所說的：「子欲仁，斯仁至矣。」那是以「欲」作爲動詞的說法，也可以說：這是廣義的「欲」，所以佛「欲」度盡衆生，使之離苦得樂，此「欲」已經化除「私慾」與「愛慾」而成爲偉大的願力。人們若能滌盪「私慾」、「愛慾」的胸襟，不被物慾所拘累，而善於變化「物慾」，爲人類建立個莊嚴、美善的世界，則與釋迦慈悲度世的願力，孔子所謂「子欲仁，斯仁至矣。」的仁欲，並無二致。所以有人說：「欲非惡」。我想，應作如是觀。